

第十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7-8 December 2013

會議手冊

Program and Abstracts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香港語言學學會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目 錄

Table of Contents

一、 日程表	Program	1
二、 詹伯慧教授開幕詞	Prof. Zhan Bohui's speech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三、 專題演講提要	Abstracts of keynote speeches	
1. 張洪年教授	早期粵語語料中殘留的語法現象	10
2. 張群顯教授	Ripples riding on waves: Cantonese tone-melody match mechanism illustrated	11
3. 麥 耘教授	對古全濁音今讀的方言劃分效度的反思	12
4. 鄒嘉彥教授	Cantones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QIE's (quadra-syllabic idiomatic expressions)	16
四、 傑出學生論文獎 參賽論文	Papers competing for the LSHK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udent Paper	
1. 陳世安	談談現代粵語陽入對轉中的音義關係	17
2. 劉蘊怡	A study of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ropertie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lu3</i>	30
3. 沈瑞清	從短長到高低：廣府片粵語入聲的聲學性質及演化路徑	44
五、 與會論文提要	Abstracts of conference papers	
1. 陳健榮	對外粵語教學與粵語語言學的互動：以量詞的語法限制為例	57
2. 陳冠健	嘆詞之「極邊緣結構」的提出	58
3. 鄒陳惠儀	近年香港「潮語」研究綜述	60
4. 陳才佳	賀州地名用字的語言學考察	61
5. 陳雅莉、白杰	粵語聽力水平測試標準評核之制定	63
6. 鄭紹基	The aspectual function of the adverbial modifier <i>ging6</i> (勁) in colloquial Hong Kong Cantonese	64
7. 鄭兆邦	粵語「咋、啫」的焦點功能及其框式結構	65
8. 馮淑儀	四個競爭性音變：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聲調合併現象的啟示	66
9. 濱田武志	在粵語、桂南平話方言史中存在的兩種介音	67
10. 何雨殷	粵語述賓式離合詞的特點與漢語動後限制	68
11. 侯興泉、吳南開	關於粵方言異體字的整理問題	70
12. 飯田真紀	粵語句末助詞 <i>ge2</i> 的語義功能及功能擴張現象	71
13. 鄭耀基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an existential expression in news reporting	72
14. 郭必之	粵語方言小稱變音的類型	73
15. 黎奕葆	香港粵語雙音節後附狀貌詞的音韻特色	74

16. 黎燕儀、李寶倫	The semantics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lei4</i> in Cantonese	75
17. 林茵茵	從老中青的差異看廣州方言詞類的演變情況	77
18. 林慧思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by deaf children in Hong Kong	78
19. 李行德、李嘉欣	<i>Ge3</i> -inser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 view from <i>de</i> -insertion in Mandarin	80
20. 羅奇偉	粵語「畀」字被動句的結構特點試探	82
21. 羅言發	中山話兩百年來的語音發展	84
22. 片岡新	Metaphorical extensions of the localizer “- <i>cyu3</i> (處)” as reflected in the 19th century Cantonese narrative data	85
23. 片岡新、李燕萍	第一本粵語羅馬字聖經 (1867) 所採用的拼音方案	86
24. 司徒沛嶠	Classification of Yue and Pinghua: A lexicostatistical approach	87
25. 鄧思穎	粵語語氣詞「啲」的嵌套地位	88
26. 翁礪鋒	吳川 (梅菴) 話與蒼梧 (大坡) 話的元音韻尾消失現象比較	89
27. 黃卓琳	粵語謂詞性語氣詞「喺啦」的句法分析	90
28. 黃阡薇、李輝	粵語及普通話量詞通用分類體系初探	92
29. 黃炳蔚、李深紅、 左靄雲	香港粵語親屬稱謂的變調規律	93
30. 黃得森	試論廣州話 <i>a</i> ¹¹ 系列疑問語氣詞之語源	94
31. 矢放昭文	《英語集全》與《英華分韻撮要》	95
32. 顏耀良	粵語句末語氣助詞「定喇」芻議	96
33. 嚴至誠	懷集上坊與下坊話聲調重探	97
34. 吉川雅之	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個莞寶片方言	99
35. 尤 盛	廣州話韻腹 [e] 的兩個來源	100
36. 張 凌	Utterance-final intonation and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101
37. 張慶文、林華勇	廉江粵語的重疊短語	102
38. 鍾 奇	粵閩方言的類形聲字	104
39. 周佳凡、劉鎮發	深圳坪山占米話概述	105
40. 周肖兒	Translation for the Stage	106
六、 與會者電郵地址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email addresses	107
七、 香港科技大學會場示意圖	Map of HKUST and location of conference venue	109

7 December 2013 (Saturday) 2013年12月7日(星期六)

8:30 – 9:00		Registration 註冊	(LT G 演講廳外)
9:00 – 9:30		Opening Ceremony 開幕式	(LT G 演講廳)
9:30 – 10:20		Keynote Speech #1 專題演講一	(LT G 演講廳)
	主持	姚玉敏	
	講者	Prof. Cheung, H. N. Samuel 張洪年	早期粵語語料中殘留的語法現象
10:20 – 10:40		<i>Tea Break</i> 茶歇	
		Session 1 第1場 (Rm 1504 教室)	Session 2 第2場 (Rm 1505 教室)
	主持	姚玉敏	孫景濤
	講者	陳健榮	陳才佳
	題目	對外粵語教學與粵語語言學的互動：以量詞的語法限制為例	賀州地名用字的語言學考察
	講者	Chen, Yali 陳雅莉 and Pai, Raymond 白杰	侯興泉、吳南開
10:40 – 12:40	題目	Developing standardized proficiency tests for assessment of Cantonese listening proficiency	關於粵方言異體字的整理問題
	講者	黃旰薇、李輝	鍾奇
	題目	粵語及普通話量詞通用分類體系初探	粵閩方言的類形聲字
	講者		
	題目		
12:40 – 14:00		<i>Lunch</i> 午餐 (LG1 餐廳；請用餐券)	
			Session 3 第3場 (LT G 演講廳)
			張欽良
			Iida, Maki 飯田真紀
			粵語句末助詞 ge2 的語義功能及功能擴張現象
			鄧思穎
			粵語語氣詞「啱」的嵌套地位
			顏耀良
			粵語句末語氣助詞「定喇」芻議
			黃卓琳
			粵語謂詞性語氣詞「啱啦」的句法分析

Keynote Speech #2 專題演講二 (LTG 演講廳)	
14:00 – 14:50	<p>張敏 Prof. Cheung, Kwan Hin 張群顯</p> <p>Session 4 第4場 (Rm 1504 教室)</p> <p>張敏 Szeto, Pui Yiu Classification of Yue and Pinghua: A lexicostatistical approach 周佳凡、劉鎮發 深圳坪山占米話概述</p> <p>Zhou, Xiaoe 周肖兒 Translation for the stage—A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i>King Lear</i> and its Cantonese translation</p> <p>Tea Break 茶歇</p>
14:50 – 16:20	<p>Session 5 第5場 (Rm 1505 教室)</p> <p>蘭蓀 馮淑儀 四個競爭性音變：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聲調合併現象的啟示 嚴至誠 懷集上坊與下坊話聲調重探</p> <p>Zhang, Ling 張凌 Utterance-final intonation and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p>
16:20 – 16:40	<p>Session 6 第6場 (LTG 演講廳) (學生論文獎競賽專場)</p> <p>郭必之 陳世安 談談現代粵語陽入對轉中的音義關係</p> <p>Lau, Cindy W. Y. 劉蘊怡 A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lu3</i> 沈瑞清 從短長到高低：廣府片粵語入聲的聲學性質及演化路徑</p>
16:40 – 18:40	<p>Session 7 第7場 (Rm 1504 教室)</p> <p>鄧思穎 Cheng, Ken S. K. 鄭紹基 The aspectual function of the adverbial modifier <i>ging6</i> (勁) in colloquial Hong Kong Cantonese 鄭兆邦 粵語「咗、啫」的焦點功能及其框式結構</p> <p>Kucong, Joaquim I. K. 鄺耀基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an existential expression in news reporting Lai, Nikko Y. Y. 黎燕儀 and Lee, Peppina P. L. 李寶倫 The semantics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lei4</i> in Cantonese</p> <p>Session 8 第8場 (Rm 1505 教室)</p> <p>錢志安 Kataoka, Shin 片岡新 and 李燕萍 第一本粵語羅馬字聖經 (1867) 所採用的拼音方案：Lepsius 方案 羅言發 中山話兩百年來的語音發展</p> <p>Yahanashi, Akifumi 矢放昭文 《英語集全》與《英華分韻撮要》</p> <p>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個莞寶片方言——通過德文資料試探其詞彙特徵</p>
19:00 – 21:00	<p>Dinner (Chinese Restaurant, G/F) 晚宴 (南北小廚中菜廳)</p>

8 December 2013 (Sunday) 2013年12月8日(星期日)

8:30 – 9:00	Registration 註冊 (LT G 演講廳外)	
	Keynote Speech #3 專題演講三 (LT G 演講廳)	
9:00 – 9:50	孫景濤 Prof. MAI, Yun 麥耘	對古全濁音今讀的方言劃分效度的反思——從平話與粵方言的關係說起
9:50 – 10:10	<i>Tea Break</i> 茶歇	
	Session 9 第9場 (Rm 1504 教室)	Session 10 第10場 (Rm 1505 教室)
	張洪年	麥耘
	Kataoka, Shin 片岡新	Hamada, Takeshi 濱田武志
	Metaphorical extensions of the localizer “-cyu3 (處)” as reflected in the 19th century Cantonese narrative data	在粵語、桂南平話方言史中存在的兩種介音
10:10 – 12:10	Lee, Thomas H. T. 李行德 and Lei, Margaret K. Y. 李嘉欣	郭必之
	<i>Ge3</i> -inser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 view from <i>de</i> -insertion in Mandarin	粵語方言小稱變音的類型
	羅奇偉	翁礪鋒
	粵語「界」字被動句的結構特點試探	吳川(梅菪)話與蒼梧(大坡)話的元音韻尾消失現象比較
	張慶文、林華勇	尤盛
	廉江粵語的重疊短語	廣州話韻腹 [e] 的兩個來源
12:10 – 14:00	<i>Lunch</i> 午餐 (LG1 餐廳; 請使用餐券)	

		Session 12 第 12 場 (Rm 1504 教室)	Session 13 第 13 場 (Rm 1505 教室) (香港語言學會「粵拼」及其他粵語拼音系統專場, 約 15:20 開始集體討論)
主持	孫景濤		蘭蓀
講者	陳冠健		張群顯
題目	嘆詞之「極邊緣結構」的提出		蔚為大觀的粵拼網上資源
講者	何雨殷		周晶晶
題目	粵語述賓式離合詞的特點與漢語動後限制		粵語教學的拼音系統選擇——兼論如何克服用粵拼教聲調的困難
講者	Lam, Scholastica W. S. 林慧思		錢志安
題目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by deaf children in Hong Kong		香港語言學會粵語拼音詞表的編纂工作
講者	黃得森		Bauer, Robert 包睿舜
題目	試論廣州話 a ¹¹ 系列疑問語氣詞之語源——從上古漢語之疑問語氣詞談起		Some possible ways forward for Jyutping
	<i>Tea Break</i> 茶歇		
	Keynote Speech #4 專題演講四		(LT G 演講廳)
主持	孫景濤		
講者	Prof. T'sou, Benjamin K. Y. 鄒嘉彥		Cantones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QIE's (quadra-syllabic idiomatic expressions) 從粵語反思「四字格慣用語」
	Closing Ceremony 閉幕式		(LT G 演講廳)
14:00 – 16:00			
16:00 – 16:20			
16:20 – 17:10			
17:10			

繼往開來，不斷開拓，不斷前進！
——第十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開幕詞

詹伯慧

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

各位同道朋友：

南國冬暖，花紅草綠，我們一眾粵語學人以文會友，又聚集到香港科大來，共慶粵語研究取得的新成就，共享豐盛的學術大餐了。大會召集人孫景濤教授要我來致開幕詞，大概是因為我是這次盛會中年事較高的一位吧！我不敢倚老賣老，但我倒真是咱們這個會缺席次數最少的一個。打從 1987 年首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拉開帷幕以來，除了前年在紅磡理工舉行的第十六屆外，我是每會必到的。第十六屆那次由於會期和另一個重要會議完全重疊，我無法分身，不得已才寫了一個書面發言稿請張群顯博士替我在會上宣讀。

我們的粵語研討會現在開到第十八屆來了，真可以用“不簡單”來形容！在所有漢語方言學科的學術會議中，還沒有哪一個方言能夠連續不斷地在二十來年中舉行十八次規模盛大的學術研討會。這說明我們的粵語研究是多麼的充滿活力！多麼的經久不衰！當年舉行第一屆研討會時，大家都說萬事起頭難，期望著有了第一次，從此可以持續不斷地把這一國際性的粵方言研討會開下去，以達到定期檢閱研究成果，及時交流心得體會的目的。果然不負眾望，在粵語研究這塊肥沃的園地上，我們大家齊心協力，深耕細作，年復一年地開花結果，如今終於迎來了濟濟一堂，喜迎第十八屆盛會開幕的歡樂時刻。現在，請允許我作為粵語園地上一名“老園丁”，簡略回顧一下我們的粵語研討會將近三十年來走過的歷程，並就今後前進的路向略抒管見：

一 這次盛會是第十八屆。離首屆研討會的時間是 26 年。沒有記錯的話，在我的記憶中，這十八屆會議在香港舉行過第 1、4、7、10、13、16 和這次的 18 屆等 7 屆，在廣東舉行過第 2、5、8、12、17 等 5 屆，在澳門舉行過第 3、6、9、15 等 4 屆，在廣西舉行過第 11、14 等 2 屆。這十八屆按照原先兩年一屆計算，開到十八屆應該用上 36 年，之所以能夠在 26 年間就開到 18 屆，關鍵在於第 10 屆回到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時，廣西的粵語同道來到會上，強烈要求第 11 屆會議移師廣西首府南寧舉行，而在南寧舉行第 11 屆會議期間，香港的同道又提出香港此前舉行過的 5 屆會議，是由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城市大學主辦的，現在香港光是政府注資的大學就有八所，這些大學越來越重視科研的開展和學術交流，大家都希望能有機會主辦粵方言的研討會。為適應形勢的發展，滿足香港同道的願望，經

協商我們又對粵語研討會舉行的周期和輪值程序進行了調整，從第十一屆以後，改為每年一屆，輪流在港、粵、澳、桂舉行，並且明確每隔一年由香港方面主辦一次，輪值的次序調整為“港——粵——港——澳——港——桂”的格局。會議周期的加密和輪值次序的調整反映出粵語研究的持續發展和不斷深化，是近三十年來粵語研究突飛猛進的明顯標志。想當初首輪“港——粵——澳”輪值過後，再輪回香港時，到底有沒有哪間大學願意接會就頗費腦筋，沒料到現在竟發展到香港各大學都樂於承辦粵語盛會，還擔心按照原先兩年一屆由港——粵——澳三地輪流主辦的程序，香港八所大學，真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機會接過主辦盛會的接力棒呢！經過調整以後，原先爭取不到機會“接棒”的大學，如今很快就會有辦會的機會了。從擔心沒人接會到紛紛爭取“接棒”，不正是粵語事業飛躍發展的生動寫照嗎！事實上，我們在這方面一直是走在全國各大方言的前面，並對其他方言的研究有影響的。打從 1987 年粵語首開以一個大方言為主題舉辦研討會的先例以後，漢語其它大方言就聞風而動，陸續跟上，終於形成今天各大方言都有了定期舉行研討會的格局，這無疑大大加快了全國漢語方言研究的步伐。近三十年間粵語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擴展，研究水準不斷提升，研究成果不斷增長的歷程，確實稱得上是碩果累累，成績斐然。這跟我們長期堅持定期不間斷地舉行粵方言研討會，是不無關係的。在這裏，我還想特別一提的，就是如今我們不但能夠連續不斷定期舉行研討會，在此期間，我們還在香港大學建立起粵方言研究的網站，又在以粵語為社會通用語的澳門建立起粵方言研究的學會，並由這個學會主辦起定期出版的專業刊物《粵語研究》來。從今年起，澳門粵方言學會還組織起主題較集中、規模較小的“粵語論壇”來，計劃每年一次，作為我們這個大型研討會的補充。這樣一來，我們每年都有一大一小的兩個粵語研討會，真可謂錦上添花！每年兩期的《粵語研究》迄今已經出刊到十四期，深受學術界的矚目。不言而喻，一個學會，一份期刊，為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臺，在粵語研究的蓬勃發展中，該發揮著多麼重要的作用！面對粵語研究如此繁榮發達的大好形勢，像我這樣有幸親歷其境的老頭兒，寧不欣喜萬分！當年參與首屆粵語盛會的張洪年教授、余靄芹教授、張日昇教授、鄒嘉彥教授、單周堯教授、徐雲揚教授……等一大批同道，想必也同樣會欣喜萬分。可惜有幾位活躍在首屆研討會上的前輩學者，像高華年教授、黃家教教授、黃伯榮教授、李新魁教授，還有演藝界的黃霑先生等，都已不幸先後作古，無緣和我們一起檢閱新成果，歡慶新豐收了！我們深深懷念他們，他們的業績將永遠載入粵語研究的史冊！長江後浪推前浪，幸喜我們的隊伍新秀輩出，後繼有人。此刻看到會上許多朝氣蓬勃的新鮮面孔，我們完全有信心能夠持續保有粵語研究興旺發達的局面。我們的事業一定會在繼往開來中不斷獲得新的進展，不斷登上新的臺階。

二 回顧過去，為的是展望未來。以往的輝煌不能是事業的終結，只能是繼續發展的良好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更要百倍努力，以更上一層樓的姿態來創造新的輝煌。在此請允許我提幾點粗淺的看法：

1 首先，面對粵語研究繁花似錦，不斷開拓，不斷升溫的大好形勢，我們對粵語的認識也應該有所發展，有所提高。要從語言資源的高度來認識粵語在漢語諸方言中的重要性和突出地位。把語言看作珍貴資源，而不僅僅看作是一種交際工具，這一觀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就我國豐富的語言資源來說，不僅全社會通用的民族共同語是資源，遍布全國各地的地方方言同樣也是資源。特別是像粵語這樣在海內外廣為使用，社會影響很大的強勢方言，更應該被視為重要的語言資源。既然是資源，就要在調查資源、開發資源、保護資源、使用資源等方面都有所策劃，有所研究，有所實踐。在這一新的理念下，粵語研究的思路自然會更加開闊，研究的內容也必然會更加豐富。

2 語言研究的主要任務是為語言的應用服務。支撐語言研究的主要動力也是語言的應用。缺乏應用價值的語言，很難激發人們的研究熱情。古往今來，研究語言的學者總是格外關注所研究語言的應用情況，古代編修韻書以“正音”的宗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大力開展語言規範化的工作，漢語方言的調查也常常是圍繞著“推普”和漢語規範化的需要來開展的。粵語既是粵語地區的交際工具，又是嶺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粵語的社會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粵語的研究更應該在服務於應用方面多下功夫。此刻回眸幾十年來粵語研究走過的歷程，盤點我們的研究成果時，我們會發現：在粵語本體的研究方面，例如深入調查粵語語音、詞匯、語法現象，揭示粵語各式各樣的語言特點，對粵語的發展作共時和歷時的探討等等，已經發表的著述很多，堪稱碩果累累；可是，深入討論粵語在各個方面應用情況的著述，相對就比較少了。我們認為，今後的粵語研究，有必要多多面對粵語應用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粵語在社會應用中常見的問題。我們粵語專業人士更要多加關注，多加研究，著力解決。

3 當前在粵語的應用中，有哪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研究，認真解決的呢？

① 記錄地域文化、承載地域文化、弘揚地域文化是發揮地方方言作用的重要一環。粵語地區積澱著豐富的廣府文化，都離不開粵語這一載體。粵語在記錄、承載、反映廣府文化中如何發揮作用？各種不同內容的廣府文化跟它的載體之間關係如何？彼此間如何密切配合，相得益彰？這裏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拿粵曲粵劇來說，其載體無疑是粵語，粵語音韻和粵曲的關係如何？粵語音韻的研究如何為粵曲的創作服務，使之達致最佳的藝術效果？這方面的課題，據我所知，我們的同道是有人染指過的。類似粵語與粵曲粵劇掛鉤這樣的研究課題不少，研究的天地相當廣闊。是值得我們多多關注的

② 在“兩文三語”的框架下。香港的粵語研究如何面對這一社會語言生活的重大變化？要研究在貫徹這一政策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三語中有普通話，普通話在社會語言生活

中跟粵語的關係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兩文三語”中，粵語依然會是香港社會最通用的交際工具，而隨著學習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普通話日漸普及也是大勢所趨。一方面，粵語的研究必須著力於幫助說慣粵語的人學好普通話；另一方面，進入香港還不會說粵語的人，也需要粵語的研究提供學習粵語的幫助。粵語的研究應該在兩語的相互學習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近期有教師提倡用普通話上中小學的語文課，理由是選進中小學語文課本中的課文大都是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現代典範白話文，用粵語教學不如用普通話教學效果好。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提出種種理由，論證母語（粵語）教學的優越性，用粵語教語文課仍是最佳選擇。在這一爭議中，作為粵語專業人士，就該本著粵語研究為粵語應用服務的精神來介入，通過調查研究、比較得失等來進行討論，發表意見。還有，在“兩文”的層面，“中文”指的是什麼，並無明確界定。是標準的白話文嗎？所謂“港式中文”算不算？粵語口語入文的現象相當普遍，又應該如何看待？香港學生筆下往往因粵語口語的干擾而造成語文習作中出現形形式式的差錯，該如何引導改正？這類語文教學中出現的問題，都有必要進行認真的剖析，以求合理的解決。

③ 粵語的正音和粵方言字的使用，有必要通過深入細緻的研究，進行一定的規範。編寫粵語正音字典，厘定通用粵方言字表等都是有助於粵語社會應用的事。值得大力提倡。拿粵語的正音來說，由於它直接影響到中小學語文課的教學，某些字的讀音出現分歧，學生和老師無所適從，自然不能聽之任之。不但老師、學生關注，社會各界、凡是跟粵語的應用有關係的人士，如為數眾多的傳媒、影視界人士，也都十分關切。這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粵語學術問題，也是一個突出的粵語應用問題，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就有賴於我們粵語學者的切磋研究了。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們粵、港、澳三地的粵語專業人士，就曾經組織起一個粵語的審音委員會，以“既要考慮粵音與古代音韻（主要是《廣韻》系統）之間的繼承關係；更要考慮當今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讀音”的原則，從現實的讀音出發，在強調“從今從衆”的理念下，經過多年的切磋討論，為每一個讀音有分歧的字擬定了正音，並在此基礎上編撰了《廣州話正音字典》在 2002 年正式出版。這項歷時前後十載的正音工程，在香港似乎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與此同時，本地另一些由標明“從切”的學者編寫的粵語“正讀”字典，却在全港大為暢銷，對香港粵語的教學和社會應用影響很大。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對粵語的正音問題議論紛紛，沸沸揚揚，儼然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這就說明在正音問題上，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空間。期待我們粵語學界能本著粵語研究為粵語應用服務的精神，多加關注，多加研究。粵語的方言用字問題，也是粵語應用中一個引人矚目的問題。眾所周知，粵語中有許多獨特的方言詞，體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粵語區用來記錄這些方言詞的方言字，據統計常見的少說也有兩三百個。這些方言字形形色色，有的同一個方言詞用了幾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表示“現在”的粵語詞就有幾種不同的寫法，到底應該寫作“而家”，還是“依家”、“宜家”、“伊家”呢？一個讀

成 ham,表示蓋得嚴密,不透風意思的粵方言詞,和另一個讀成 kam,作動詞“蓋”用的粵方言詞,同樣寫成方言字“𠵼”。這類方言用字的混亂現象,要不要有所規範?如何進行規範?這類方言用字問題,我們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關注

④ 粵語教材的編寫,也是一個粵語應用中的重要問題。隨著粵語的學習在海內外越來越受到重視,為各種不同需要的對象編寫出能夠突出粵語特點,反映粵語實際情況,體現粵語研究成果,並能夠與時俱進的優質教材,為粵語的教學工作提供服務,無疑應是粵語學者責無旁貸的任務。說實在,時下坊間雖然充斥各種粵語課本教材,其中不少是粗製濫造之作,質量大成問題。要改變這種局面,就有賴於各位粵語研究有成的專業人士了。我們要在此呼籲:大家都來關心粵語的教學工作,都來著力編寫學術性與應用性俱佳的粵語教材。

以上拉拉雜雜,略抒管見,請各位多多指教。

2013年12月7日 於香港科技大學

早期粵語語料中殘留的語法現象

張洪年

加州大學柏克萊 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語言的歷時發展，一般多致力在語言中新的現象，分析新舊交替之間變化的年代和軌跡。至於舊有的用法本身有什麼特質，來源究竟本自什麼，一般不太深究。有一些老舊的用語說法，今日不復流行，許多人都等閒拋開，就算是見諸文字記載，也往往輕易翻過。殊不知，淘沙覓金，一些看來陌生的用詞，正因為他有異尋常，細究起來，可能正是躲藏在“今日尋常”背後的舊時面貌。語言演變本來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老舊用語，很可能就是變化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的如實寫照。等到有一天新舊替換以後，我們只聽新語，不聞舊說。舊日變化，也就淹沒無聞。對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來說，任何材料的消失，都是最可惜的事。對一個研究語言發展演變的學者來說，能找到任何一點舊材料，從中發現些許變化的蛛絲馬跡，最是興奮不過的事。我從十九世紀以來的粵語語料、一共選用二十六種，挖取一些例句，排比梳理，試著說明早期粵語語法變化一些現象。第一個現象是“至”字的用法，第二個現象是“莫”字的用法。這兩種用法，乍看之下，並沒有什麼特別。但是翻檢兩百年的材料之後，我們這才發現個中變化，至為繁複，緊扣著粵語發展的總體趨勢，實在莫能等閒視之。

Ripples riding on waves: Cantonese tone-melody match mechanism illustrated

Cheung Kwan H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ao (1930, 廣西搖歌記音) demonstrated how an utterance can be melod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ntonese lexical tone of the words. Afterwards the intriguing question of tone-preservation in Cantonese songs and the mechanism of tone-melody match behind it were not picked up until the 1980s, when Cantonese opera established itself in the Hong Kong academia and Cantopops conquered the Chinese race world-wide. The speaker has been tackling this topic from the 1990s onwards. He believes that by now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Cantonese tone-melody match have been answered. The following major steps of recogni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quest:

1. What really matter in Cantonese tone-melody match are the 4 tone categories, with tones 1 and 2 conflated and tones 3 and 5 conflated, hence the name “melody-tones” or “m-tones”.
2. The 4 m-tones form a series of pitch heights that bears some resemblance with a musical scale, hence the name “pseudo-scale” and the names of heights “sharp”, “high”, “low” and “deep”.
3. Given the above, the research question remains “How are the 4 m-tones in the pseudo-scale (like ripples) matched to a much larger variety of notes in a song, with a range in the region of a 13th (like wav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within-scale order of pitch heights?”
4. The two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lexical tones elasticity and transposability are the keys to the above question.

Realizing (4) above is one thing, devising and making use of expository designs and conventions to explicitly formulate how elasticity and transposability work together in the tone-melody match mechanism is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such designs and conventions, it is more specifically posited that:

- a) The Lyrics of a song is separated into m-tone groups.
- b) Group boundaries are where transposing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one range widening/compression) occurs.
- c) Within a group, a default matching relation holds between an m-tone and a musical note, with principled variation permitted by virtue of tone elasticity.

While lexical tone identification is often uncontroversial, there are cases of indeterminacy, when tone identification is supplemented with or overruled by other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g. systematic gaps, accidental gaps, syntax, semantics, the lexicon, etc. So such indeterminacies and considerations need to be identified as well.

The Cantopop classic soeng6hoi2-taan1 (上海灘, The Bund) will be used for illustration.

对古全浊音今读的方言划分效度的反思 ——从平话与粤方言的关系说起

麦 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方言的划分需要一些标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语言学家们就注意到，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中的读音可以作为一项划分标准。

丁邦新（1982）提出划分汉语七大方言的6条标准，古全浊音声母的读法排在最重要的第一条。

近年来，桂湘粤平话土话研究掀起热潮，其方言归属是重要的议题。李连进（2000）认为平话应独立为一个大方言区，且一向归属粤方言的勾漏片方言也应划归平话，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古全浊音声母的今读——清化后的塞音、塞擦音读不送气。

丁邦新（1996）针对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对平话仅用古全浊音今读不送气一个条件能否加以说明表示疑问。麦耘（2010）指出除了古全浊音今读不同，粤方言与桂南平话在其他方面都一致或接近，所以桂南平话能独立于粤方言的说法尚有待证明。

李小凡（2012）支持李连进，并进一步提出：只用古全浊声母今读这一条标准，不但可以划分平话与粤方言，而且足以划分汉语各个大方言。

在平话研究中，一般是把平话（包括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与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放在一起考虑的。据覃远雄（2007），古全浊音塞音、塞擦音清化后在平话和土话中有4种表现：(1)不送气；(2)送气；(3)並、定不送气，其他送气；(4)按声调不同分读送气和不送气。其中读不送气的包括桂南平话的全部和桂北平话、湘南土话各一部，确实占平话、土话的大部分。

按照李连进和李小凡的意见，桂南平话和勾漏片方言再加上桂北平话和湘南土话各一部，就构成了“平话”这个大方言。

我们看看材料。下面将属于桂南平话的南宁平话韵母系统列于下（据覃远雄等1997），并用摄注上主要的中古来源（入声韵与阳声韵平行，注略）。

i 止開	u 遇一	y 遇三	a 假二		e 假三	o 果一	ø 果三,“而爾”
	ui 蟹一三合,止舌齒合		ai 蟹一二開	əi 蟹四,止喉牙合			
iu 效三四			au 效一二	əu 流	eu 效二三四部分		
im 鹹三四			am 鹹一二	əm 深	em 鹹三四部分		
in 山三四開	un 山臻一合	yn 山三四合	an 山一二	ən 臻	en 山二三四開部分	on 山合部分	
ieŋ 宕三開,梗二			aŋ 宕一開三合,江	əŋ 曾一,梗二文	eŋ 曾梗三四	oŋ 宕一合三唇	øŋ 通ŋ“吳五”
ip			ap	əp	ep		
it	ut	yt	at	ət	et	ot	
iək			ak	ək	ek	ok	øk

熟悉粤方言的学者一看就会感到这与粤方言的韵母系统很相像，与中古音对应很整齐。各地桂南平话基本上都是这种韵母格局，内部非常一致。

下面是桂北贺州八步鹅塘“八都话”的韵母系统（麦耘2008）。与中古音对应较杂乱，不能注得很细。

a 假蟹效二,梗山鹹二人	ai 蟹一四開,梗山鹹二人	au 流,效二,通入	aŋ “閩”
i:a 假三,曾梗三四入	ɔ:ai 遇,通三人	i:au 流三	i:aŋ 通曾臻一
e 鹹山二三四開		eu 效一,宕江入	ɤ:aŋ 曾一開,通臻山合
ə 曾一開入	əi 止蟹三四開		əŋ 江宕山鹹一
i:ə 蟹效三四,鹹山二三四開,梗鹹山三四入			i:əŋ 江宕通三
ɤ:ə 梗三四開,山二三四合,山三四合入			
ʊ:ə 果,江宕鹹山一人	ʊ:əi 遇一流三		ʊ:əŋ/ʊŋ 宕三臻一合/通一
o 鹹山一二開,梗二開			
ɿ 止精莊開		iu 宕三人	iŋ 曾梗深臻三
i 止開,深臻三人			yŋ 臻梗三合
y 遇流三,通三人			ŋ “吳五”
u 遇效一	ui 止蟹一三四合		

没有入声韵（但有入声调），古入声韵的今读很分散，有的音值相当独特，与古阳声韵往往不平行；鼻音韵尾大量脱落，剩下的合并为一个；-i -u 韵尾也大量失落（现有的-i -u 韵尾很多是后起的）；元音与中古音的对应很不整齐。这跟桂南平话相距甚远（有些特点倒像湘语）。要把这两个韵母系统联系起来，无论用一个大方言内部谱系分化、还是用语言接触来解释，都极为困难，恐怕只能说它们来自分化非常早的方言，属于不同的大方言。

上述两个音系的古全浊音今读都是清化后塞音、塞擦音读不送气。但是，如果拿它们跟平话、土话以外的方言（譬如勾漏片以外的粤方言）比，它们一致而与外方言不同之处，恐怕就只有这一点了。仅凭古全浊音今读这一点就说它们属同一个方言，无法信人。

在桂北、湘南，像这样跟桂南平话差别很大的平话、土话大量存在，而且跟桂南平话的内部一致不同，桂北和湘南的平话、土话互相之间常常也有很大差别。所以，要说桂南平话跟勾漏片是同一方言，绝对没问题；要说桂南平话-勾漏片可以独立于粤方言之外，这也可以讨论。但是，要把古全浊声母不送气的桂北、湘南平话土话也划入这里面，而且是凭这一点与粤方言划界，就是完全行不通的。

这就关系到对汉语方言进行划分时，“古全浊音今读”这个标准的效度问题。丁先生把这个标准摆在第一位，但不认可仅用此一个标准就能划分方言。

笔者认为古全浊音今读确实是划分方言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不可能是唯一标准，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标准。讨论如下：

（一）从分类学角度说，单一标准的分类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事物，用单一的划分标准都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别开来，但不能保证这种划分真能反映被划分对象的本质特性。如果多重划分标准所得结果正好相同或基本相同，则其中一个被认为最重要的标准就可以涵盖或代表其他标准，那么这一个标准也可以成为划分标准。但这不是真正的单一标准。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预设，是祖语的语言特征往往能传到其子语言中去。根据这个预设逆推，可以得出另一个预设，就是当相同的语言特征出现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时，可以判断它们出自同一个祖语。在暂时不考虑语言接触时，这第二个预设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要有一个前提：这是一组互无关联的特征，而不是单个特征，也不是一组互为条件、有依存关系的特征。

在平话划分问题上，古全浊音今读的标准就不能涵盖其他标准，譬如韵母系统方面的标准。在笔者看来，如果确实要立平话这个方言，古全浊音今读不送气可以是个重要标准，但还需要有韵母方面的标准，以把像“八都话”这种整体上更接近湘方言的方言排除掉。

李小凡（2012）认为桂北平话其他方面与桂南平话相去较远，是由于历史上其他方言“入侵”桂北、使此地原有的平话方言特征模糊不清，但从其古全浊音今读上仍能辨认出是平话。他没论证，为什么别的方言特征可以大幅改变，唯独古全浊音今读这个特征却会如此顽强，地保留下来。

（二）经过 30 年，尽管丁先生划分方言的标准获得了很大认同，但也开始显出其未臻完善之处，包括古全浊音今读的标准。

现在我们对汉语方言的了解比 30 年前增加了许多。例如说，以前人们对粤方言古全浊音今读的模式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广州模式，而我们现在既知道有勾漏片这样全不送气的，也知道有吴化片这样全送气的（熊正辉 1987），广州模式并不能涵括粤方言。官话方言也并不都是北京模式，西北不少官话方言的底层其实是全送气的。

此外，陈晖（2008）曾谈及在湘方言内部，保存浊声读法或清化、清化后送气或不送气的方言之间，以及同一方言里古全浊音读法不同的老派和新派之间，常有说话者互相之间对这些不同没有感觉的情况，而这些不同是方言学家们极为重视、认为可以作为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来区分方言的。这说明，这个标准的效度是有条件的、有局限性的。尽管湘方言这种情况有一些是晚近的变化，而非历史的条件，但仍可以让人思考：当历史上出现类似的分化时，它真的都能成为方言谱系分枝的重大节点吗？

（三）划分方言的标准都是历史标准，时间上越早出现的，其所划分的方言层级就越高（丁邦新 1982）。标准在历史上出现的早晚以通语为参照。全浊音在通语的清化大约是在南北宋之间，丁先生认为这是个比较早的变化，所以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标准。但同一个标准在通语历史中和在方言历史中是否一定同时期，却无法断言。湘方言的清化目前还在进行中，吴方言至今基本上未清化，其他已清化的方言，其清化的时间尚需一一考证。

例如，一般被归入江淮官话的泰如片方言（通泰方言）古全浊音送气，与其他江淮官话不同，无论从谱系角度或语言接触角度都难以说明它跟江淮官话的关系。古全浊音在这个方言读为送气，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就是晚于两宋，从吴语式的“清声浊流”变来的（它在韵母、声调方面更像一种吴方言而非一种官话方言）。如果真是如此，则对于这个方言的划定来说，更重要或时代更早的历史标准就可能不在古全浊音今读，而在别的方面，譬如在韵母方面。

就粤方言和平话而言，目前尚未能证明其全浊音清化到底发生于何时。

（四）划分方言的标准，虽然只是形式标准，但要真正理解其意义，还是需要“知其所以然”。例如入声-p-t-k 韵尾表示保存中古音值，轻唇音读双唇是《切韵》及以前的特征，等等。可是，古全浊音读送气或不送气反映了什么？却一直没有公认的说法，即使知道全浊音在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里已分送气和不送气两类，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大的帮助。这个问题不清楚，其送气与否与方言分化的关系就难以了解。

麦耘（1998）和朱晓农（2010）认为，在通语中，清化之前的古全浊音并非一般所构拟的带声声母（浊声声母），而是气声声母（弛声，或“清声浊流”），所谓“浊音清化”其实是一个气声消失（消弛）的过程。气声在某些条件下直接消失，“清化”后的声母就是不送气的，在某些条件下则转化为声母的送气成分。对于北京模式，麦、朱认为是声调上的低造成了清化后声母的送气，声调的高造成了不送气。这只是个初步结论，且也仅就通语而言（大多数官话方言是后来被通语覆盖），其他模式不同的方言，还需要再探讨。

笔者初步假设：在古代汉语各方言中，有各种情况，有带声（真浊声），有气声（清声浊流或浊声浊流），气声也有强有弱。真浊声和弱气声可能直接清化为不送气清声，强

气声可能变为送气声母，气声也可能在一个方言内按不同条件而强化、弱化，然后分别变送气和不送气声母。但是，在当时，全浊音的不同发音只是同一种音位的不同地域变体，可能成为后代不同方言的分化起点，也可能不是。

对于“八都话”，笔者也提出一个假设：在全浊音尚未清化时，它已经从湖南进入桂北，不论其全浊音原本读什么，来到广西后就受当地方言影响，读成真浊音或弱气声（由于全浊音的具体读法是地域变体，不涉及音位系统，所以容易变），到后来一同清化为塞音、塞擦音不送气的模式。这与方言划分无关。

（五）观察语言/方言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最经典的是谱系语言学（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角，当看到两个语言/方言有共同的特征时，第一假设就是它们有共同来源，共同的特征是从共同祖语继承下来的。近些年，接触语言学崛起，从这个视角看语言/方言间的共同特征，常常假设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新兴的演化语言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存在普适性的、超谱系关系且不依赖接触关系的演化规则，语言/方言之间的相似之处在相当多情况下，是平行演化。譬如日耳曼语历史上有 $p > f$ ，汉语也有；官话方言 k 组声母在 $i y$ 后面变 ts 组，吴、湘方言相同。

鲁国尧（2002）纯从语言谱系的视角，把古全浊音今读送气的西北方言、通泰方言和客赣方言联系在一起，假设它们的历史联系。由于这些方言音系的其他特点太不相似，仅仅建立在一个特点上的假设显得极为脆弱。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将如何解释古全浊音今读也是送气的粤方言吴化片？事实上古全浊音今读送气不止于这些方言，例如地处湘方言中心地区的湖南冷水江，古全浊今读就是送气的（赵翠阳 200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一，平话不能仅依古全浊音今读塞音、塞擦音不送气一个条件就视为独立，平话与粤方言的关系尚需在讨论。

二，“古全浊音今读”这个标准，尤其是“古全浊音清化后今读”这个标准在方言划分中的效度需要反思。它仍然是一个重要标准，但不能是唯一标准，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标准。

参考文献

- 陈 晖 2008 古全浊声母在湘方言中的今读音情况，《方言》第 2 期
丁邦新 1982/1998 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丁邦新 1996 书评：中国语言地图集，《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第 1 期
侯兴泉 2006 广东封开罗董话的浊内爆音，《民族语文》，第 5 期
李连进 2000 《平话音韵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李小凡 2012 平话的归属和汉语方言分类，《语言科学》总第 60 期
鲁国尧 2002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上），《中国语文》第 6 期
麦 耘 1998 “浊音清化”分化的语音条件试释，《语言研究》增刊
麦 耘 2008 广西八步鹅塘“八都话”音系，《方言》第 1 期
麦 耘 2010 粤语的形成、发展与粤语和平话的关系，《研究之乐——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覃远雄 2007 平话和土话，《方言》第 2 期
覃远雄、韦树关、卞成林 1997 《南宁平话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熊正辉 1987 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第 3 期
赵翠阳 2009 湖南冷水江毛易话中的浊音清化与阴平分调，《方言》第 1 期
朱晓农 2010 全浊弛声论——兼论全浊清化（消弛）低送高不送，《语言研究》总第 80 期

Cantones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QIE's (Quadra-syllabic Idiomatic Expressions)

從粵語反思「四字格慣用語」

Benjamin K. Tsou 鄒嘉彥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re has been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e emblematic Chinese QIE's regarding its characteristic *structural parallelism*, *cognitive finesse* and *semantic opacity*. It has also explored how idiomaticity is realized through (1) cultural saliency and (2) unique aspects of the semi-autonomous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There are other additional areas of concern such as: (a) morphology and syntax of QIE's, and (b) manipulation of sound symbolism. They are of special interest to research on Yue-Cantonese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y can relate to the comparatively extensive expansion of monosyllabic adjectives in Cantonese from A to ABB or BBA form and to its possible relationship with Burmese which invites review.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xplore some structural aspects QIE's found in Cantonese, but not necessarily in Mandarin or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y include the expansion or combination of disyllabic XY forms to produce quadra-syllabic ABCD forms as an extension of sound symbolism, or through internal developments in the morphology of QIE's and enhancement their semantic and cognitive functionalities. An attempt will be also made at internal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comparison with a non-Sinitic language, and to revisit the putative link between Cantonese-Yue and other neighboring languages.

試談現代粵語“陽入對轉”中的音義關係

——以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的注音與釋義之考察為例

陳世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目 次

- 一、 引言
 - 二、 有關古音學中“清濁輔音韻尾”和“陰—陽—入對轉”的若干研究
 - 三、 有關確定同義詞的若干研究
 - 四、 有關音轉理論與詞彙中同義關係的若干研究
 - 五、 古音學“陽入對轉”理論在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簡釋中的實證
 - 六、 結語
 - 七、 參考資料
-

一、 引言

歷來中外學者對古漢語字音韻尾中的陰聲韻尾與入聲韻尾的討論比較多，可以概括為“輔音韻尾派”和“元音韻尾派”，兩派的人物至今仍然爭論不休，未有定論。本文試圖從古音學中相關的“對轉”理論，應用於現代粵語陽聲韻和入聲韻中，找出“音轉”與同義詞所產生的密切關係，並且考察廣州話的單音節實詞的注音與釋義證明當中存在“聲近義通”的同義現象及其“義由音生”的對應規律。

文中除了「一：引言」和「六：結語」之外，分別包括：「二：有關古音學中“清濁輔音韻尾”和“陰—陽—入對轉”的若干研究」、「三：有關確定同義詞的若干研究」、「四：有關音轉理論與詞彙中同義關係的若干研究」與「五：古音學“陽入對轉”理論在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簡析中的實證」等各部份。（因「五：古音學“陽入對轉”理論在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簡析中的實證」中的廣州話字組右上角均標示聲調，為免跟一般註釋混淆，故文中正文一律捨去頁註，特此說明。）

本文不少觀點是依據前輩和時彥的研究，以及側重於文獻資料的引用，均注明出處（年份和頁數）與附上參考資料。

二、有關古音學中“清濁輔音韻尾”和“陰—陽—入對轉”的若干研究

在上古漢語字音的韻尾中，可分為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三種，若根據李方桂(1980：34—36)的上古音系統，就如他所云：「凡不需要標聲調的時候仍可以用*-m，*-n，*-ng，*-ngw來代表陽聲韻的韻尾，用*-b，*-d，*-g，*-gw來代表陰聲韻的韻尾，用*-p，*-t，*-k，*-kw來代表入聲韻的韻尾。在語音上，*-p跟*-b，*-d跟*-t，*-g跟*-k等並不一定含有清濁等的區別，但也不敢說一定沒有區別。我們既然承認上古有四聲，那麼別的區別似乎是不重要的。」李先生並且歸納出其結論上古時代「也許上古的音節的結構根本就是CVC(輔音+元音+輔音)，正如陸志韋的說法(1947)。」

最後，李先生更總述上古韻尾輔音大致有九組的變化時，當中唯有從上古“仍保留在中古音系裡”的就是「上古*-m，*-n，*-ng仍保留在中古音系裡，上古*-p*，*-t*，*-k仍保留在中古音系裡。」

至於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在古代韻母的擬測”提出“韻尾輔音”的問題(1940：455)並云：「我們可以想像入聲字也許本來是收 -b、-d、-g的，經過類似德文‘bad’>bA:t 那樣的演變，而成為-p、-t、-k，不過我們關於這類的說法並沒有什麼確據。」

董同龢(2001：266)也認為：「*-d與*-g到後代或消失，或因前面元音的影響變為 -i 尾複元音的 -i，或 -u 尾複元音的 -u；*-t與 *-k則仍舊。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從一般的語音演變通例看，濁輔音韻尾容易消失或變元音，清輔音韻尾則容易保持不變。」

這裡涉及到上古漢語陰聲韻尾的“輔音韻尾派”和“元音韻尾派”的不同看法，陳復華、何九盈(1987：457)指出：「古代漢語陰、陽、入三種韻尾，經過幾千年的演變，-m、-n、-ŋ和-p、-t、-k現在都能找到痕跡，而且有的方言還完整地保存著，為什麼唯獨-b、-d、-g尾就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呢？高本漢和董同龢有過一個解釋：那就是所謂“濁輔音韻尾容易消失或變元音，清輔音韻尾則容易保持不變”。高本漢還舉出他瑞典的方言 bed變 be，而 bēt始終讀 bēt為例。在我們看來，這種解釋也不一定可靠。因為-b、-d、-g是濁輔音，-m、-n、-ŋ也應算是濁輔音，為什麼-m、-n、-ŋ又不容易消失呢？」

若按照陳新雄(1999：405)的上古音韻尾系統，則假定為：

「1.陽聲東、冬二部收圓唇舌根鼻音韻尾-uŋ，入聲屋、覺、藥三部收圓唇舌根塞音韻尾-uk，與其相配之陰聲侯、幽、宵三部收舌面後高元音韻尾-u。

2.陽聲耕、陽、蒸三部收舌根鼻音韻尾-ŋ，入聲錫、鐸、職三部收舌根塞音韻尾-k，與其相配之陰聲支、魚、之三部無韻尾-∅。

3.陽聲元、真、諄三部收舌尖鼻音-n，入聲月、質、沒三部收舌尖塞音-t，與其相配之陰聲歌、脂、微三部收舌面前高元音韻尾-i。

4.陽聲侵、添、談三部收雙唇鼻音韻尾-m，入聲緝、帖、盍三部收雙唇塞音韻尾-p。」

另外，李新魁(1994：90)也談到這個問題：「在漢語發展的過程中，出現過主元音相同而韻尾不同的字音相互轉化的現象，前人稱之為“陰陽對轉”。陰、陽對轉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具體分起來，應該是陰—陽—入對轉。古人因為把入聲韻母字合在陽聲韻之內，所以稱陰陽對轉就概括了這三者的對轉。」其實不但在古代漢語出現字音的“對轉”語音變化，而且在某些現代漢語方言中也是仍然保留這種“對轉”的現象，這類韻尾互轉的主要又集中於陽聲韻尾與入聲韻尾的字音上。

有關“清濁輔音韻尾”，即上古音的音節都擬作輔音韻尾，也就是*-b、*-d、*-g、

-gw、-r。至於早期粵語是否像上古漢語一樣都具有輔音韻尾，是否後來才演變脫落的，值得思考。因此，目前我們暫時只是依照上述陳復華、何九盈(1987：457)、陳新雄(1999：405)和李新魁(1994：90)的觀點，對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的注音與釋義進行考察，說明現代廣州話粵語確實存在“陰—陽—入對轉”中的“陽入對轉”現象。

三、有關確定同義詞的若干研究

對於確定同義詞，也有不少學者研究，如郭良夫(1985：49—50)說：「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之間有同義關係，就成為一組同義詞。……同義詞，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意義完全相同的，有的書上叫做等義詞；一種是意義大致相同的，有的書上叫做近義詞。」

周祖謨(2004：295)對同義詞的性質和作用也作過解釋：「語言裡有很多發音不同而意義相同或意義非常相近的詞，這種詞稱為“同義詞”。……同義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同義的詞，一類是意義稍有差別的詞。」

王力(1982：23—24)則“從詞義方面分析同源字”方面，提出：「音義皆近的同義詞，在原始時代本屬一詞。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如方言影響)，語音分化了，但詞義沒有分化，或者只有細微的分別。這種同義詞，在同源字中佔很大的數量。」「所謂同義，是說這個詞的某一意義和那個詞的某一意義相同，不是說這個詞的所有意義和那個詞的所有意義都相同。」

符淮青(2004a：101、102、107)對於“同義詞”的劃分上，也提到：「同義詞的類別。從意義相同的程度上分類。」也就是“等義詞”與“同義詞”兩類，前者是「概念義完全相等。」，後者是「概念義有同，概念義和附屬義有異的詞。」對於同義詞的定義，符先生更認為是：「同義詞除少數等義詞外，從詞的關係說，是基本義、常用義有相同或相近義項(一項或多項)的一組詞，從義項的關係說，是概念義有很大的共同性，但又有某些差別，或者附屬義有差別，或語法特點有差別的一組詞。」

黃曉冬(2003：17—21、24—35)對“同義詞判定的內在依據”則分為“概念同一”、“對象同一”與“義位同一”三種觀點。對“同義詞的確定方法”則提出“替換法”、“義素分析法”與“文本格式法”三種方法。周文德(2002：22—31)在“同義詞的確定標準”分為“意義相同、相近”、“概念同一”、“對象同一”與“義位同一”四種說法。在現代漢語的“同義詞的確定方法”歸納為“替換法”、“義素分析法”與“同形結合法”三種方法。

符淮青(2000 / 2004b：205—206)根據英國學者來昂斯(J.Lyons)1978年的《Semantics I》中的觀點指出“同義詞的同是指詞位意義(sense)相同”，並且進一步說：「1.詞義內容不只簡單歸結為“意義”、“概念”、“所指對象”等等，而是區分為詞位義、詞位義的客觀所指、應用中詞的意義、應用中的詞的具體所指。2.同義詞只是詞位義相同，它們在應用中的詞義內容是有變化的。」

從以上各家之說，同義詞可包括：“等義詞”、“同義詞”與“近義詞”，至於如何確定同義詞的問題，本文則採用符淮青(2004a)先生之說，也就是：「從詞的關係說，是基本義、常用義有相同或相近義項(一項或多項)的一組詞，從義項的關係說，是概念義有很大的共同性，但又有某些差別，或者附屬義有差別，或語法特點有差別的一組詞」作為依據標準的判定。

四、有關音轉理論與詞彙中同義關係的若干研究

在上古漢語語音系統中，音轉理論能夠證明字詞分化，而且可以從規律中發現“聲近義通”與“義由音生”的現象，如陸宗達、王寧(1994：399、402)云：「訓詁學家所以用上古音系來討論音轉問題，是因為他們討論的材料大多是先秦文獻的書面語，在先秦文獻裡已經分化了的字詞用上古音系也就是《詩經》音系來討論它們的音轉，自然是合理的。……儘管在漢語逐漸雙音節化以後，單音節音變造詞已經日趨減少，但直到今天，這種音轉還間或發生，所以，按道理講，討論什麼時候完成的字詞分化，應當用什麼時候的語音，才能全然準確。更嚴格些說，討論那一方言區的音轉，應當用那一方言的音系，才更為準確。然而漢語的各方言區既然同是一個母語發展來的，分別保留著不同時代的語言面貌，而漢語的語音分化造詞大量發生還是在早期；所以，我們用一個或數個現代方言特別是保留古音較多的閩、粵方言來討論漢字的音轉，有時也能保證一定程度的準確性。」「研究音轉現象，是為了以聲音為線索，把同源字系聯在一起，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音轉對我們認識歷史，認識社會生活有這些實用作用，音轉現象在語言中又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所以，音轉不應當只是專家研究的對象，還應當是對語言有興趣的人們都可以關心又可以研究的有趣課題，只要懂得了音轉的科學道理，學會拼音的方法，我們可以由此發現語言中的詞以及漢字之間縱橫的聯繫，這比起我們孤立地一個字一個字去學習漢語和漢字，確實是好得多了。」

早在清代就有運用音轉理論來揭示語源分化的規律，可以從戴震的音轉理論產生說起，如殷寄明(2000：71、72)所云：「戴震在語源學上的傑出貢獻是，以其精深的音韻學研究為依託，首次將傳統的“語轉說”納入科學化的軌道。他將古聲紐分為五大類、二十小類，將古韻部分為九類二十五部。」「戴震的音轉理論對後來孔廣森和章太炎音韻學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孔氏的“對轉”說就是戴震音轉理論基礎上產生。今天我們所見的最先進的音轉理論是王力先生的語音通轉學說，其初始的基礎是由戴震奠定的。」

孫雍長(1997：81、82)也有提到：「將音轉原理與聲義同源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開拓了訓詁新境界。如程瑤田《果臝轉語記》、王念孫《釋大》、阮元《釋門》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作。」「清以後到現代，音轉說在訓詁學中仍一直居重要地位。許多學者運用音轉原理，對近代或現代漢語中的俗語詞尋本溯源，取得了不少成績……」

任繼昉(2004：17)在“語源研究是探求整理詞彙系統的必由之路”一節中曾引用了王力在《漢語史稿》的一段話：「一種語言的語音的系統性和語法的系統性都是容易體會到的，唯有詞彙的系統性往往被人們忽略了，以為詞彙裡面的一個個的詞好像是一盤散沙。其實詞與詞之間是密切聯繫著的。這裡所講的同源詞就是詞彙的系統性的現象之一。」

不過，孟蓬生(2001：24、242)指出“語音相轉和語音相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語音相轉是指兩個音之間存在著單向或雙向的流轉關係，語音相近是指從語音學上看兩個音發音相似，但自清代以來，這兩個概念始終是混淆不分的。」並且認為對“同源詞的韻轉規律作一些探討”，也就是“對轉規律”云：「在前人建立的音轉模式中，對轉最有資格作為音轉規律。這是在主要元音相同的情況下，同部位的鼻音韻尾(陽聲韻)、塞音韻尾(入聲韻)相互轉換或消失(陰聲韻)的現象。……我們贊同王力等先生的意見，認為陰聲韻在上古沒有韻尾，所以我們說對轉是韻尾相互轉換或消失的現象。但歌脂

微跟相應的陽聲韻、入聲韻對轉並非韻尾的失落，而是鼻音韻尾跟元音或輔音韻尾的轉換(n跟 i、t 的轉換).....。」

徐通鏘(1996：254)也云：「鼻音 -m、-n、-ŋ在發音時如果舌根與硬顎的接觸稍為鬆弛一些，也會變成相應的濁擦音。」孟蓬生(2001：243)卻不同意徐通鏘之說法，並云：「陽入對轉是韻尾轉換的結果，但方向性恐怕不能像陰陽對轉一樣確定。徐通鏘先生結合現代方言鼻音韻尾變濁擦音的情況，以為上古的入聲韻很可能是濁擦音收尾的。」更指出徐先生(1996：254)之話“似乎有語病”，再云：「舌根與硬顎的接觸只適合 -ng，不適合 -m和 -n。」

其實，萬世雄(1997：208—218)針對“聲近義通”的現象，認為：「從文字和語言兩個角度分述“聲近義通”的語文現象產生的原因，即：“文字多同音相借，訓詁多聲近相授”，又指出“訓詁多聲近相授”是由於“萬物得名，各有其故”，“義由音生”，“以有限之聲音，御繁多之文字，是必相聯貫而有系統可尋”」

然而，王力(1984：157)早已提到：「文字既是代表有聲語言，同音的字就有同義的可能：不但同聲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義；甚至意符、聲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還可能是同義的。」

蔣紹愚(2005：156)也指出：「詞是音義相結合而產生的，研究音義關係，是詞彙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一種語言的基本詞彙初步形成以後，在詞義引申和新詞滋生的過程中，一些（不是全部）意義有關的詞往往會在語音上也有聯繫。」

吳澤順(2006：315)更肯定音轉“具有必然性和規律性”，前者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後者是“內部呈現出整體有序的基本規則”，並云：「音轉的實質，王念孫等人概括為“音近義通”。“音近”與“義通”互為因果，缺一不可。只談“音近”或“音變”，不談“義通”，那是語音學的內容；只談“義通”而不談“音近”或“音轉”，那是同義詞或近義詞研究的內容。談音轉，必然涉及到音義關係，這是一個基本前提。」

關於上述的討論，我們同意透過聲音相近的語音規律，可以進而挖掘到詞彙中的同義關係，當中所蘊含的因音轉而保留其同義成份，或許也有某種結構性的制約原則。按照吳澤順(2006：315—336)的研究，“音轉的制約機制”中分為“音義關係的機制”、“語言系統的制約性”與“聲韻統一的制約”，並藉此對音轉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作為檢驗。

五、古音學“陽入對轉”理論在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簡釋中的實證

漢語古音學中的“陽入對轉”理論，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粵方言是可以得到證實的，如詹伯慧(2002：19)提到“廣州話的陰陽對轉”所云：「漢語韻母的陰聲韻(元音收尾)、陽聲韻(鼻音收尾)和入聲韻(塞音收尾)，出現過主要元音相同而韻尾不同的字音相互轉化現象，前人稱之為“陰陽對轉”。可以是“陰—入”對轉，也可以是“陽—入”對轉。廣州話主要是陽—入對轉。」

陳伯輝(1998：84)對粵語“陽入對轉”的問題，也說到：「在粵方言中，對轉主要出現在陽聲韻與入聲韻上，形成兩個詞彼此詞性相同，詞義相近。當中大多是“遵古炮製”，本有其字的。」可見有音無文字的詞語，在南方方言中是一個普遍而突出的現象。

李新魁等(1995：48)則提到“語音的屈折”，並云：「指從一個詞根出發，憑借語音形式的變換或衍生來表示不同的語法或詞彙意義，創造新詞。這些屈折現象是歷時

演變的結果，對於現代廣州話這個共時語言體系來說，它們是凝固了的形式；其語法或詞彙功能大多是可歸納的，但一般不能類推。」就“語音屈折”的形式來說，包括陰陽對轉和雙聲疊韻兩種。其中的陰陽對轉：「這是通過韻尾的變化來完成的屈折。就廣州市區話內部而言，基本上只有陽聲韻與入聲韻之間的對轉……」

然而，作為地區上強勢方言來說——粵語，它的情況可能比較特別，可以借用張雙慶(2002：394、395)的話來說明：「強勢方言的一個表徵是有自己的文言文，有大批的方言字。所以研究粵方言特徵詞，可以考慮方言字的作用。在古漢語研究的過程中，擺脫文字的羈絆，曾是研究獲得突破的一個重要因素。李如龍先生也說40年來漢語方言研究的重大突破，是“跳出漢字的魔方”。但是作為一種強勢方言，粵語有很完整的書面語系統，粵語口語詞大多有書面形式，或用本字，或自造方言字，或借用同音字。加上廣州和香港兩大經濟文化重心，有較多粵語出版物，方言字自然流行在粵方言區各個角落。」

儘管相對其他方言，粵語有書面形式的優勢，直接助就方言字的流行，可是因欠缺規範，而且在廣泛運用廣州方言來寫作的程度上來看，畢竟未獲普遍的正式推廣與重視，方言字(包括字典)的同字音、同字義而不同字形的存在，仍有不少。(在港澳地區方言字的使用普遍性上，目前也只停留於某些報刊的部分而已，然而卻無法與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書面語體形式相比。)

下面就以漢語古音學“陽入對轉”的理論在粵語同義詞的注音與釋義作簡要的分類。關於注音上“陽—入對轉”對應相配的標準，我們則依照張洪年(1972 / 2007：4)就鼻尾韻和塞尾韻相配的說明作為根據：「鼻尾韻和塞尾韻相配，這是保存古韻的地方，比方 a行〔a:m, a:n, a:ŋ〕三者俱存，塞尾韻就有〔a:p, a:t, a:k〕；ε行只有〔εŋ〕，塞尾韻也只有〔εk〕，換言之收〔-m〕的就和同部位(homogonic)的〔-p〕相配，〔-n〕和〔-t〕，〔-ŋ〕和〔-k〕也是這這兩兩相配的。」

至於在釋義上之所以羅列出釋義義項的用意，像韓敬體(1996：93)所說：「詞典的釋義就是對詞典所收詞語的含義所作的解釋。在一部詞典中，釋義是極為重要的。」

李開(1990：264)也說到：「詞典釋義作為一種語義解釋，被釋對象是音義統一的語詞，解釋內容是意義完全或接近等值的詞語」

另外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談的粵語(粵方言)，就是以廣州話(又稱廣府話)為代表中心的大方言。因此，以下單音節同義實詞字例的注音與釋義主要都根據白宛如(1998)《廣州方言詞典》，並參考詹伯慧(2002)主編《廣州話正音字典》、黃谷甘(1993)〈粵語詞彙中“陽入對轉”同義詞的語義辨析〉一文、李新魁(1994)《廣東的方言》和李如龍、張雙慶(1992 / 1996)〈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一文等為輔助資料，考察出陽入配對的單音節同義實詞，不涉及虛詞。並且集中於現代粵語發音不位相同的三大類，包括：收雙唇鼻音韻尾-m和收雙唇塞音韻尾-p、收舌尖鼻音-n和收舌尖塞音-t、收舌根鼻音韻尾-ŋ和收舌根塞音韻尾-k；分別得出的數據是：m—p 16組、n—t 21組、ŋ—k 18組，一共為三類五十五組單音節同義實詞。

凡例說明如下：

- (1) 【】 內為用字。
- (2) 【】 後依序為音標、釋義以白宛如為主，若為其他各家則另外註明。
- (3) 〔 〕 內為參考資料的簡稱與頁碼。分別包括：

白宛如(1998)《廣州方言詞典》簡稱為《詞典》、
 詹伯慧(2002)主編《廣州話正音字典》簡稱為《字典》、
 黃谷甘(1993)〈粵語詞彙中“陽入對轉”同義詞的語義辨析〉簡稱為〈辨析〉
 載 鄭定歐 主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114—118)、
 李新魁(1994)《廣東的方言》簡稱為《方言》
 李如龍、張雙慶(1992 / 1996)〈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簡稱為〈派
 生詞〉載《中國語文研究》(香港)1992,5《方言語音韻論集》(306—315) 香
 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10。

- (4) / 為以白宛如標音、釋義為主後，若為其他各家不同的分隔號。
 (5) : 後為例句，選擇性以下標字略加說解。
 (6) 【※】內只是因電腦中打不出的字形，並非有音無字，故唯有在 [] 內對字形結構作
 文字描述。□代表為有音義無合適的字形。
 (7) 「」內為其他各家不同的字音字形或古代韻書的釋義。
 (8) { }內為對轉兩字間的語義聯繫。
 (9) 音標的右下角數字為粵方言9個聲調，包括：陰平55/53(1)、陰上35(2)、陰去33(3)
 陽平21/11(4)、陽上13(5)、陽去22(6)、陰入55(7)、中入33(8)和陽入22(9)。聲調系
 統根據詹伯慧(2002: 10)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的“九聲六調”：「即實際上廣州
 話只有6個調位，七、八、九調可以看作是一、三、六調的變體。」
 (10) 送氣符號一律改以 h，特此說明。

-m/-p (16組)

- 1 【吟】ŋem⁴ 喃喃，囉唆：唔知佢吟乜野。(《詞典》297頁)
 【※】ŋep⁷ 胡謔，說：你※乜野！[此字組合是左邊為口部，加上“隱”字的右邊，即去除左邊
 耳東的阜部] (《詞典》431頁) / 「詹作【噏】」(《字典》263頁) (〈派生詞
 19.〉)
 2 【※】khem² 以物遮蓋：※住啲菜。[此字組合是上面為“冫”，下面為“贛”](《詞典》297頁)
 「李、詹均作上“冫”，下“山”」(《方言》91頁/《字典》24頁)
 【※】khep⁷ (用器皿)覆蓋，扣住：搵個杯※住佢。[此字組合是上“冫”下“合”]
 (《詞典》431頁) / 「李作【蓋】」(《方言》91頁)
 【磕】khep⁷ 蓋(圖章)：磕個印。(《詞典》431頁) / 「詹作【扱】」(《字典》204頁)
 【坭】khep⁹ 壓著，夾著：櫃桶坭住我件衫。(《詞典》431頁) (〈派生詞5.〉)
 3 【點】tim² 蘸(流體物品)：點豉油。(《詞典》301頁)
 【玷】tim³ 輕觸：玷一玷都唔得。(《詞典》302頁)
 【碟】tip⁷ 小口品嚐：碟下滋味。(《詞典》434頁)
 4 【拈】nim¹ 用兩個手指夾取物件：個細路拈起野就食。(《詞典》302頁)
 【捏】nip⁹ 用拇指和其他手指去夾：捏一額汗。(《詞典》434頁)
 5 【揞】em² 用手掩、蓋：揞實個嘴唔出聲。(廣韻感韻烏感切：“手覆”)(《詞典》298頁)「黃
 音作om²」(〈辨析〉115頁) / 「詹音作am²」(《字典》221頁)
 【罨】em⁷ 敷藥於創處，熱敷，冷敷：搵熱毛巾罨頭。(廣韻合韻烏合切：“覆蓋也”)(《詞典》
 432頁)「黃音作op⁷」(〈辨析〉115頁) / 「詹音作ap⁷，字作【罨】」(《字典》
 494頁)

- 6 【滄】nem⁶ 水溼透貌：件衫濕到滄，快啲換喇。（《詞典》289頁）
 【※】nep⁹ 潮，濕：件衫重※嘅，唔好收白先別收。[此字組合是左邊為三點水，加上右邊的“𠂔”，“𠂔”裡面有“又”字]（《詞典》428頁）（〈派生詞27.〉）
- 7 【扞】tem² （用拳頭）打，捶，砸：扞骨。（《詞典》288頁）
 【碇】tep⁹ 捶打，搥（拳打）：碇骨。（《詞典》427頁）（〈派生詞1.〉）
- 8 【閃】sim² 打閃：閃電。（《詞典》304頁）
 【攝】sip⁸ 打閃：攝電。（《詞典》435頁）
- 9 【髻】tem³ 耷拉，垂下來：髻條繩落來。（廣韻感韻徒感切：“髮垂”）（《詞典》288頁）
 【耷】tep⁷ 耷拉，垂下：耷低頭。（《詞典》427頁）（〈派生詞13.〉）
- 10 【躡】lam³ 邁，跨：躡門檻。（《詞典》281頁）
 【攞】lap⁸ 大步走：三步攞埋兩步走跨越。「白宛如無此字，故字形與字義依據詹伯慧，但字音詹作laap，即白氏的lap」（《字典》231頁）
- 11 【覽】lam³ 粗略地看。「白宛如無此字，故字形與字義依據黃谷甘」（〈辨析〉11頁）
 【瞷】lap⁸ 粗略看（閱讀），掃視：瞷一眼。（《詞典》421頁）（〈派生詞6.〉）
- 12 【腌】jim¹/jip⁸ 用鹽、糖、酒等漬制食品：腌黃瓜。「白宛如只有入聲的【腌】」（《詞典》435頁），陳伯輝(1998: 88)認為這個字本身具有陽入對轉。故字形、字音與字義皆依據詹伯慧」（《字典》444頁）（〈派生詞11.〉）
- 13 【目斬】tsam² 眼睛很快地一閉一開：目斬眼。「字形與字義皆依據詹伯慧，字音是dzaam即白氏的tsam」，字形白作【𠵹】」（《字典》487頁）（《詞典》281頁）
 【眨】tsap⁸ 「白宛如無此字，（眼睛）迅速地一閉一開：眨眼。「字形與字義皆依據詹伯慧，字音是dzaam即白氏的tsap」（《字典》485頁）（〈派生詞21.〉）
- 14 【※】tsam⁵ 刺入肉中：※刺 [此字組合是左邊為沒有竹字頭的“簪”，加上右邊是沒有“歹”邊“列”]（《詞典》282頁）
 【插】tshap⁹ 刺入，穿入：插入「字形與字義皆依據詹伯慧，字音是tsaap即白氏的tshap」（《字典》224頁）（〈派生詞24.〉）
- 15 【歉】him³/hip⁸ 歉虛。（《詞典》304頁）
 對不住人的心情：道歉。「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450頁）
- 16 【欸】ham² 碰撞。（《詞典》206頁）
 【磕】ham²/hap⁹ 硬物相碰撞。（《詞典》481頁）

-n/-t (21組)

- 1 【※】pan⁶ 爛泥：一身。[此字組合是左邊為點水，加上右邊的“並”]（《詞典》306頁）
 【埤】phat⁹ 量詞。A)泡，攤，用於稀爛之物：一埤醬糊。
 B)鍬，用於泥、土塊之類：一埤泥。（《詞典》436頁）
- 2 【扞】men²₅ 擦拭：扞屎紙。（《詞典》322頁）
 【扞】men² 抹：幅牆裂咗條罅，搵水泥扞返佢喇。（《詞典》322頁）
 【※】mat⁸ 擦拭，抹掉：※乾淨。[此字組合是左邊為提手旁，加上右邊“蔑”]（《詞典》436頁）/「詹作【抹】」（《字典》208頁）此組詞的主要元音並不相配，有待考證。
- 3 【攤】than¹ 平鋪：攤開報紙。（《詞典》310頁）
 【筴】that⁸ A)向四面張開：隻貓※隻筴開來咁喇 [此字組合是上冂下山]
 B)（展開）到盡頭：開筴把遮喇。（《詞典》438頁）
- 4 【攢】tsan² 積聚：攢錢。（《詞典》313頁）{詹作聚在一起之義}（《字典》231頁）
 【紮】tsat⁸ A)纏，網紮：紮紙花。B)量詞。束，把：一紮花。（《詞典》438頁）{詹作網在一起的東西之義}（《字典》202頁）

- 5 【躑】 tsan³ 顫動，跳動：激到佢躑躑跳。（《詞典》313頁）
 【扎】 tsat⁸ 驚覺，驚跳：嚇到我扎起來。（《詞典》439頁）
- 6 【問】 men⁶ 請人解答不明白或不知道的道理和事情：問價錢。（《詞典》322頁）
 【乜】 met⁷ A)為什麼，幹嗎(詢問原因或目的)：乜你唔食呢？
 B)疑問代詞。什麼：佢乜都唔知道。（《詞典》442頁）
- 7 【墩】 ten¹ 突出的圓形部分，用於身體某些多肉處：面珠墩_{臉蛋兒}。（《詞典》324頁）
 【凸】 tet⁹ A)鼓出：肥到凸起個肚。B)露出：襪穿咗，凸出腳趾。（《詞典》444頁）
 （〈派生詞28.〉）
- 8 【墩】 ten² 大力投放，放置：將包米墩喺呢處。（《詞典》324頁）
 【拙】 tet⁷ (把物件)重重地放下：將啲行李拙個度喇。（《詞典》442頁）
- 9 【震】 tsen³ 心驚，害怕：聽日考試，我唔震。（《詞典》326頁）
 【躑】 tsət⁹ 突然一驚：佢嚇到躑一躑他嚇了一跳。（《詞典》445頁）
- 10 【飲】 hen⁶ 很想得到，渴望：佢飲生存。（《詞典》331頁）
 【乞】 het⁷ 討要，乞討：隨街乞飯。（《詞典》448頁）
- 11 【樽】 tsøn¹ 瓶子：玻璃樽。（《詞典》337頁）
 【梓】 tsət⁷ A)塞子：樽梓_{瓶塞}。B)塞，堵：梓住個樽。（《詞典》454頁）
- 12 【搵】 khin² 掀，揭：搵開被。（《詞典》349頁）
 【揭】 khit⁸ 掀起：揭鍋蓋。「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23頁）（〈派生詞18.〉）
- 13 【斷】 thyn⁵ 斷絕，隔絕：斷市_{貨物脫銷，缺貨}。（《詞典》354頁）
 【脫】 thyt⁸ 解除，除下：脫市_{貨物脫銷，缺貨}。（《詞典》463頁）
- 14 【穿】 tshyn¹ 以繩線貫穿物體使之連貫：穿珠仔。（《詞典》356頁）
 【撮】 tshyt⁸ 用繩穿起(有小孔的東西)：將啲珠來撮起佢。（《詞典》463頁）
- 15 【盡】 tsoen⁶ A)竭，完：取之不盡。B)死亡：自盡。「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96頁）
 【卒】 tsoet⁷ A)完畢，結束：卒業。B)死亡：生卒年。「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0頁）
- 16 【旱】 hon⁵ 長時間不下雨或降雨量太少：旱災。「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406頁）
 【喝】 hot⁸ 飲：喝水。「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0頁）
- 17 【寬】 fun¹ 闊大，範圍廣：馬路很寬。「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136頁）
 【闊】 fut⁸ 寬廣：呢條路好闊。「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146頁）
- 18 【竄】 tshyn²⁽³⁾ 逃跑，亂走：抱頭鼠竄。「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458頁）
 【猝】 tshyt⁸ A)匆忙：倉猝。B)突然，立刻：猝不及防。「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87頁）
- 19 【研】 njan⁴ 碾，指滾動摩擦：研藥。「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475頁）
 【嚙】 nat⁹ 磨：嚙牙_{睡覺磨牙}。「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53頁）（〈派生詞26.〉）
- 20 【辨】 bin⁶ 分辨，辨別：辨明是非。「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585頁）
 【別】 bit⁹ 區分：區別。「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44頁）
- 21 【濺】 tsin³ 液體受衝擊後四處射出去：飛濺。「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144頁）
 【※】 tsit⁷ 濺 被車子濺到滿身泥。「釋義根據詹伯慧」[此字組合是左邊為“汙”，加上右邊“節”]
 （《字典》102頁）
 【※】 tsit⁷ 用手擠：※牙膏。「釋義根據詹伯慧」[此字組合是左邊為“才”，加上右邊“節”]
 （《字典》208頁）（〈派生詞17.〉）

-ŋ/-k (18組)

- 1 【逛】 kuan³/khuak⁸ 到處遊玩：逛街。（《詞典》367頁）
 遊逛：逛街。（《詞典》472頁）此字為一字兩音。
- 2 【哽】 kheŋ² 噎，卡(刺、骨在喉)：哽骨。（《詞典》370頁）

- 【擱】 khək⁷ 卡住，阻礙：搵塊磚來擱住個車輪。（《詞典》475頁）（〈派生詞30.〉）
- 3【抨】 phen¹ 用力砍殺：一刀抨過去。（《詞典》373頁）
- 【劈】 phək⁸（用刀斧）破開：劈柴。（《詞典》476頁）
- 4【抨】 phən¹ 趕，打：抨佢出去。（廣韻耕韻普耕切：“揮也”）（《詞典》360頁）
- 【拍】 phak⁹ 攙，趕：拍扯佢攙走他。（《詞典》467頁）
- 5【掬】 feŋ⁶ 晃動，甩動：洗完頭，掬乾頭髮。（《詞典》380頁）
- 【搥】 fek⁹ 用手巾、手帕類使勁揮動：唔好搥親人別甩著人。（《詞典》480頁）
- 6【啄】 tœŋ¹/tœk⁸（用尖嘴）取食：雞啄米。（《詞典》390頁）
「黃、詹認為是白讀/文讀」（〈辨析〉117頁）（《字典》252頁）
- 7【啄】 tœŋ¹（鋒利物）砸落：把刀跌落來，啄親我隻腳。（《詞典》390頁）
- 【剝】 tœk⁸ 用刀向下砍：剝開兩邊。（《詞典》487頁）（〈派生詞23.〉）
- 8【仰】 ŋəŋ⁵ 仰頭，臉、腹朝上：仰高頭。（《詞典》405頁）「李、詹音ŋəŋ⁴，字作【昂】」（《字典》407頁）（《方言》91頁）
- 【嶺】 ŋək⁹ 仰頭，抬頭：嶺高頭。（《詞典》496頁）（〈派生詞7.〉）
- 9【靚】 leŋ³ 漂亮好看：生得好靚。（《詞典》375頁）
- 【歷】 lek⁷ 能幹，聰明，有本事：佢唱歌跳舞最歷。（《詞典》476頁）
- 10【拎】 leŋ¹ A)拿，持：拎住一本書。B)提：拎唔起提不動。（《詞典》382頁）「李音作neŋ₁」（《方言》91頁）
- 【擱】 nek⁷ 提，拿：佢擱起皮箱就走口。（《詞典》481頁）（〈派生詞9.〉）
- 11【椪】 teŋ³ 瓜果的蒂：蘋果椪。（《詞典》381頁）
- 【葯】 tek⁷ 物品上類似蓮子的東西，供手拿的部分：茶壺葯茶壺蓋的頂子。（《詞典》480頁）（〈派生詞14.〉）
- 12【綁】 pəŋ² 用繩、帶等纏繞或捆扎：綁擔架。「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319頁）
- 【縛】 pək⁸ 捆綁：束縛。「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325頁）
- 13【□】 kaŋ³ 較量，比武：□拳二人握拳，以腕相較力。此為有音無字。（《詞典》364頁）
- 【格】 kak⁸ 抵擋：格拳二人用臂相擊以較力。（《詞典》469頁）（〈派生詞16.〉）
- 14【捅】 thong² A)戳，扎：用刀捅。B)觸動，碰：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16頁）
- 【殺】 tok⁷ A)刺，捅：殺一個窿。B)用指頭、棍棒輕擊輕點：隨筆點殺。「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18頁）（字形白作【擱】）（擱：集韻燭韻株玉切“刺也”）（《詞典》500頁）
- 15【盈】 jien⁴ A)充滿：熱淚盈眶。B)有餘，多出：盈利。「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495頁）
- 【溢】 jat⁹ A)充滿：熱情洋溢。B)因充滿而流出，泛濫：河水四溢。「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116頁）（廣韻質韻夷質切；上古為錫部）
- 16【框】 kwəŋ¹ A)用來安裝門窗的架子：門框。B)鑲在器物周圍，起保護、支撐等作用的東西：鏡框。「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375—376頁）
- 17【※】 kwək⁷ 圈儿：汽車兜了一個大圈。[此字組合是“緯”的左邊加上“口”]「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263頁）
- 18【攻】 koŋ¹ 氣味刺激鼻子，鑽鼻子：攻鼻。（《詞典》416頁）
- 【焗】 kok⁹ 悶，指空氣不疏通，悶熱。「釋義根據詹伯慧」（《字典》343頁）（〈派生詞4.〉）

在上述ŋ—k中的14、15最後兩組相較於其餘各組，語音對應似乎不齊（【捅】和【殺】聲母有送氣與否之別；【盈】和【溢】韻尾也有不同），但前者仍符合語音近似的同源原則，後者則由于歷史音變緣故反映不出對轉現象，然從上古音仍可判斷二者之間的同源關係。

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 / 1996 : 306、313、314)說：「這種語詞派生方式還可以追溯到中古漢語和上古漢語，看來應是漢語派生同源詞的一條規律」。「閩粵方言裡這種“陽入對轉”派生同源詞的方式看來是源遠流長的《廣韻》裡的異讀字有的就是陽聲韻和入聲韻和相應的入聲韻并見，而且字義注釋相同或相近。」「所有的這些，都說明了“陽入對轉”滋生新詞可以追溯到上古漢語，它是早期的漢語詞彙演生規律之一」。也許是觀點的不同以及引用文獻的差異，李、張兩先生(1992 / 1996)在“閩方言以泉州話為例，常用的有以下30條”和在“粵方言以廣州話為例，常用的也有以下30條”。分別引用了《十五音》、《廣韻》、《字林》、《前漢書·灌夫傳》、《前漢書·惠帝紀》、《集韻》、《廣州話方言詞典》、《說文》、《周禮》、早期《切韻》（黃典誠《切韻宗和研》）和王力《同源字典》等。因此，跟李、張兩先生(1992 / 1996)〈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一文相比，只有10組是本文所沒有的，包括是：李如龍、張雙慶(1992 / 1996)的第2組n-p、第3組ŋ-t、第8組、第29組的ŋ-k、第10組、第15組、第22組、第25組的m-p、第12組、第20組n-t。

此外，又如郭必之、錢志安、鄒嘉彥(2008)〈粵語“陽入對轉”詞的底層來源〉一文，認為粵語有一批具“陽入對轉”關係的詞語，可能與壯侗、苗瑤底層有關。這一批兩兩成組的詞，語義相同或相近，他們根據龔煌城(2003)的意見，把這些詞稱為“陽入對轉”同源異形詞”。

簡而言之，派生詞、滋生新詞、跟壯侗、苗瑤比較同源異形詞等漢語詞彙歷時演變，都並非本文討論的範圍。當中上述ŋ-k中的14、15只是從《廣韻》切語可推知是同源詞關係而已。其他引用到《廣韻》、《集韻》的切語，也只是有助於對現代粵語的音讀有所參考和驗證出“陽入對轉”的理論。筆者主要是將焦點集中於「現代粵語“陽入對轉”中的音義關係」，並單純地「以廣州話單音節同義實詞的注音與釋義之考察為例」，把箇中所蘊含著的音義關係鉅細靡遺挖掘呈現出來。

六、結語

在現代粵語中陽聲韻與入聲韻的問題，目前在粵方言地區有學者指出也有一些變化的情況，如邵慧君(2003 : 260-277)從粵語中保留古-m、-n、-ŋ和-p、-t、-k韻尾這一角度出發，稱為“存古型”，把韻尾發生程度各異分化的稱為“分化型”，並從陽、入韻尾分化定作內部和外部條件進入探討。

孫玉卿(2003 : 287-294)通過對珠江三角洲 25個方言點考察了入聲韻尾與陽聲韻尾之間的搭配關係，指出二者是一種互相對應的關係，但是也有不對應的現象。邵文與孫文皆指出粵語出現入聲尾的混讀情況，即陽聲韻尾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而且產生陽聲韻尾的變化往往滯後於入聲韻尾，這些都是導致不對應的表現。

不過鍾奇(2001 : 278-286)則以同化、異化、文字的影響、其他方言的影響、雜揉(訓讀)、另有來源、原因不明等七種成因，對形成廣州-m/-p、-n/-t、-ŋ/-k互變特字進行了分析。不過粵方言入聲韻尾發生了分化，也有入聲韻與陽聲韻搭配的情況，當中搭配整齊，“基本上沒有發現入聲韻尾有混讀的現象”。

綜上所述，我們相信藉著對古音學中“陽入對轉”理論實踐的運用，在標音上，陽聲韻尾的-m、-n、-ŋ與入聲韻尾的-p、-t、-k音轉關係；在釋義上，可發現與陽入音轉

有關係的單音節實詞中的義項，都是具有同義現象。這樣不但能夠證實現代粵語單音節實詞字義中“音近義通”與“義由音生”對應規律的現象，而且當中所蘊含的同義詞彙關係。正如齊佩瑢(1998：155)所云：「語音與語義在起初配合時雖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後來在語言的演進過程中，因為詞彙從同一語根孳生分化的緣故，音讀相同相近者，其意義也往往相近相同，形成一個語族。從前的人論音義關係時常糾纏不清，混兩種現象為一者，正緣分分不清前期和後期的生和長的原故。」

然而，就“音近義通”來說，儘管不應過於強調其必然規律，就像許威漢(1995：504)所說：「“音近義通”是訓詁學家從語言實際中歸納出來的一條規則，他們又用演繹法把這條規則運用於訓詁實踐，但經過驗證，“音近義通”畢竟只反映了局部的語言事實，還不能成為一條普通規則。因此，我們只能認為音近義通有其可能性，並無必然性。」

不過，若從各學者們黃谷甘(1993)、李新魁(1994)、李新魁等(1995)和李如龍、張雙慶(1992 / 1996)對陽入配對的研究，以及的本文所考察出的三類五十五組單音節同義實詞，就實際歸納出的客觀現象來看，當中所蘊涵着有規律性的音義現象，也是的確不能否定而又存在的語言事實。

七、參考資料

- 陳復華 何九盈《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10
- 陳慧英〈談廣州方言的同義詞語〉載 單周堯 主編《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121—130)，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1994
- 陳伯輝《論粵方言詞本字考釋》香港：中華書局 1998,5
- 陳新雄《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9,4
- 曹煒《現代漢語詞彙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3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北京：中華書局 2001,10
- 董紹克〈淺談入聲塞音韻尾的演變〉，山東省語言學會 編《語海新探》(第二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9.4
- 符淮青《現代漢語詞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同義詞研究的幾個問題〉載《詞典學詞彙學語義學文集》(204—216)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b,5 (原載《中國語文》2000年第3期)
-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著 趙元任 羅常培 李方桂 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1940,9
- 葛本儀《現代漢語詞彙學》(修訂本)(第二版) 2004.10
- 郭必之 錢志安 鄒嘉彥〈粵語“陽入對轉”詞的底層來源〉《民族語文》2008年第4期
- 郭良夫《詞彙》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7
- 韓敬體〈同義詞語及其注釋〉載《“現代漢語詞典”編纂學術論文集》(301—322)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8
- 〈論規範性詞典釋義的一般原則〉載《現代漢語詞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3—112)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10
- 胡和平《同義詞說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8
- 黃谷甘〈粵語詞彙中“陽入對轉”同義詞的語義辨析〉載 鄭定歐 主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114—118)，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3,12
- 黃金貴〈同義詞，“同”在哪裡—古漢語同義詞研究之一〉載 徐時儀、陳吾云 編《語苑集錦：許威漢先生從教 50 週年紀念文集》(36—42)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1
- 黃曉冬《“荀子”單音節形容詞同義關係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3.6
- 黃小姪〈粵語方言用字一百多年來的演變〉載 單周堯 陸鏡光 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 (237—260)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12
- 蔣冀聘《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12
- 蔣紹愚《古漢語詞彙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9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7
- 李開《現代詞典學教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0.11
- 李榮 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白宛如 編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12
- 李如龍 張雙慶(1992/1996)〈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中國語文研究》(香港)1992,5
《方言語音韻論集》(306—315)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96,10
-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4,10
- 李新魁 等 《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6
- 陸宗達 王寧〈音轉原理淺談〉載《訓詁與訓詁學》(389—402)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4,9
- 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6
- 齊佩琮〈語義和語音〉載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語言文獻卷(152—157)》1998,4
- 任繼昉《漢語語源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4,5
- 邵慧君〈粵方言陽聲韻尾及入聲韻尾的分化模式及成因初探〉載 詹伯慧 主編《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61—277),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12
- 許威漢〈語文學科的方法論〉載《漢語學》(503—515)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5,9
- 孫雍長《訓詁原理》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7,12
- 孫玉卿〈珠江三角洲粵方言入聲韻尾舒化過程中的幾種類型及與陽聲韻尾的關係〉載 詹伯慧 主編《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61—277),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12
- 吳澤順《漢語音轉研究》長沙：岳麓書社 2006.1
- 萬世雄〈文字多同音相借訓詁多聲近相授—淺談黃侃對“聲近義通”現象產生原因的認識〉載 鄭遠漢 主編《黃侃學術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7,5
- 王 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2,10
- 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2000,6
- 《中國語言學史》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 1984,5
- 王 寧《訓詁學原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8
- 文若稚《廣州方言古語選釋續篇》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3,8
- 徐通鏞〈“陰陽對轉”新論〉載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語言文獻卷》(248—261) 1998,4
- 殷寄明《語源學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3
- 袁家驊 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1月
-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2,10/2007(增訂版)
- 張雙慶〈粵語的特徵詞〉載 李如龍 主編《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390—414)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2,12
- 詹伯慧 主編《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2,7
- 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2,7
- 〈關於方言詞的用字問題——以粵方言為例〉載《漫步語壇的第三個腳印：漢語方言與語言應用論集》(90—106)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4
- 〈漢語方言詞典編纂中的幾個問題〉載《漫步語壇的第三個腳印：漢語方言與語言應用論集》(118—134)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4
- 〈漢語方言詞典收詞小議〉載《漫步語壇的第三個腳印：漢語方言與語言應用論集》(135—14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4
- 鍾 奇〈中古、廣州-m/p、-n/t、-ŋ/k互變特字成因試析〉載 詹伯慧 主編《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78—286)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12
- 周文德《“孟子”同義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2,9
- 周祖謨《周祖謨文字音韻訓詁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2

A Study of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ropertie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u3*

Lau Wan Yee, Cind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lu3*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hereafter SFPs) are on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spoken Cantonese, which carry very special linguistic functions within an utterance, such as marking the sentence type. Researchers have limited discussion on the SFP *lu3* (Fung, 2000; Leung, 2005). *Lu3* is claimed to come from either *laa3* or *lo3*. Leung (2005) gave an example on *lu3* as below:

好嘢! 做晒功課 *lu3*。

“Yeah! (I) have done all the homework already.”

Since not many studies focused on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lu3*,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properties of *lu3* by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SFPs beginning with the same consonant *l*, mainly *laa3* and *lo3*. Finally, a conclusion is made in an attempt to account the properties of *lu3*. Semantically, it marks a change of state and current relevance. It can also mark either a declarative or suggestion, with a pragmatic function - newsworthy. Different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lu3* did not show reminding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lu3* is commonly found in conversation between people with intimate relationship, like friends and siblings. It is used in informal situation like casual chatting and it shows the lowest degree of seriousness when compared to *laa3* and *lo3*. *Lu3* behaves like *laa3* and *lo3*, but not identical to any of them.

I. Introduction

1.1 SFPs in Cantonese

Cantonese has a large and complex inventory of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hereafter SFPs). Defined by Leung (2005), SFPs is a bound phonetic form which can attach to an utterance to state situation about an event, or express the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tonese speech. They usually appear in casual speech like conversation between friends. 30 to 95 Cantonese SFPs have been identified previously (Kwok, 1984; Luke, 1990; Leung 2005). Researchers categorized SFPs according to their semantic functions (Matthews & Yip, 2001; Fang, 2003; Kwok, 2006) or phonological features (Li, 2007; Fung, 2000). Even though a sentence can also be well-formed without SFPs, they are vital in Cantonese speech. Besides,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two or more SFPs are common in Cantonese (Matthews & Yip, 2001; Leung, 2005). Some SFPs are phonologically similar which may have similar meanings (Fung, 2000). SFPs are the particles that are usually found at the end of Cantonese utterance. According to Chao (1968), it is always bound. An SFP is typically used to express the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Luke (1990) stated that SFPs do not possess any truth-meanings but serve certain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y can show moods,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and they situate at the end of a clause (黎錦熙, 1955). They were once called as “empty word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lexical meanings (Kwok, 1984) while Law (1998) even called them as “emphatic words”, which

serve to strengthen the tone of the sentence. Since Cantonese is a tonal language, words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tones, such as “㗎” *laa1* which serves as making suggestion; and “喇” *laa3* which is marking assertion. SFPs can also signal new information, assertion, requests, or advice-giving, etc.

1.2 Research Motivation

Cantonese SFP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for many years; however, not so much have been done on *lu3*. Fung (2000) and Leung (2005) have tried to account for the source of *lu3*. Fung (2000) proposed that *lu3* is a variation of *lo3* while Leung (2005) thought it comes from *laa3* by undergoing “high-back labialization”. Another related study is Li (2007), who tried to break down a SFP into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order to show a structural mapping of the SFP with its meaning. Following Fung (2000), the word *family* refers to SFPs with the same initial consonant. The SFPs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family have the similar semantic funct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which have the same tone. Following the assumption proposed by Li (2007), it can be hypothesized or generalized that the currently used SFP *lu3* may also share some features with the other *l-family* members – to show a change of state.

In this paper,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lu3* are investigated. The examples used in this paper are drawn from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natural conversation noticed by the author, the speakers are aging from 18-25.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Cantonese adopted in this paper is *Jyutping*, the romanization system proposed by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LSHK).

II. Basic Semantic Properties

Since *lu3* also begins with a consonant *l*,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lu3* also share the common properties of *l-family* members following Li (2007). This chapter compares *lu3* with two other family members: *laa3*, and *lo3*. The “neutral” SFP *aa3* is also used in certain examples as comparison. An overview of Cantonese informative SFPs is given first.

2.1 Cantonese Informative SFPs

Kwok (2006) did a study on the Cantonese informative SFPs, including *aa3*, *laa3*, *bo3* and *wo3*. She stated that informative SFPs have five features, namely, noteworthy, reminding, assertion, suggestion, and newsworthy. Let’s take a look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s from Kwok’s paper:

- | | | |
|-----|--|--------------------------|
| (1) | 佢 肯 做 <i>laa3</i> 。
Keoi5 han2 zou6 laa3
He willing do SFP
“He’s willing to do so.” | (Kwok, 1984; Kwok, 2006) |
| (2) | 佢 走咗 <i>laa3</i> 。
Keoi5 zau5 zo5 laa3
He go-perf SFP | (Fung, 2000; Kwok, 2006) |

“He’s gone.”

The above sentences are extracted from Kwok’s paper. Sentence (1) and (2) show that *laa3* is used as informative SFP in showing that the speaker assumes that the proposition is new to the hearer. *Laa3* in both sentences shows the function of newsworthiness. According to Kwok’s definition towards informativeness, it is believed that *lu3* is also an informative SFP.

(3) 佢 肯 做 *laa3/lu3*。
Keoi5 han2 zou6 *laa3/lu3*
He willing do SFP
“He’s finally willing to do so.”

(4) 大 個 女 *laa3/lu3*。
Daai6 go3 leoi5 *laa3/lu3*
Big CL girl SFP
“(You) have become mature.”

Both sentences above were extracted from Kwok’s paper. The original informative particle *laa3* were substituted by *lu3*, while both sentence are still acceptable without changing any meaning. Using *lu3* in the above sentences can show its property of newsworthiness. As such, *lu3*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roperty of informative SFP. (5a) is found in Fung’s paper.

(5) a. 哎呀, 今日 廿五 號 *laa3*。 (Fung 2000:, -79)
ai1jaa3, gam1 jat6 jaa6-ng5 hou6 *laa3*
Oh, today twenty-five number SFP
“Oh, today is (already) 25th of the month.”
??b. 哎呀, 今日 廿五 號 *lu3*。
ai1jaa3, gam1 jat6 jaa6-ng5 hou6 *lu3*
Oh, today twenty-five number SFP
“Oh, today has been 25th of the month.”

Laa3 can show the property of newsworthy as well as reminding; however, *lu3* do not preserve the second function. Fung (2000) mentioned that the speaker utters (5a) as “a new information to the audience’s mental world”. Even though this date is not any new information to the physical world, it is new to the audience (including the speaker), perhaps they just realized the date. Thus, *laa3* is used and it is acceptable. The other interpretation of using *laa3* is that both of the speaker and listener have such common knowledge of the date, but the speaker utters the sentence with an aim to remind the audience. However, *lu3* in (5b) does not seem to have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With *lu3*, the only interpretation will be that the speaker himself is ignorance to the fact.

In Kwok's paper, she stated that when a linguistic form indicates that a speaker has a presupposition about the audience's knowledge of the proposition, such form carries the feature of informativeness. In other words, the speaker presupposed that the listener has the knowledge or is ignorant about the proposition. However, it is suggested that other words like "assumption" should be used instead of "presupposition" here.^{#1}

The properties of *lu3*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upcoming subsections.

2.2 Change of State

All *l-family* members have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as "change of state". Similar to *lo3* and *laa3* (Li, 2007), *lu3* can be attached to the predicate that involves a change of state and it can also indicate a current relevance.

- (6) a. 落 雨 *laa3*. (Fang 2003:, -103)
 lok6 jyu5 *laa3*
 down rain SFP
 "It's raining now."
 b. 落 雨 *lu3*.
 lok6 jyu5 *lu3*
 down rain SFP
 "It's raining now."

- (7) a. 食咗 飯 *lo3*. (Cheung 2007:, -186)
 sik6- zo2-faan6 *lo3*
 eat- Perf- meal SFP
 "I am done eating."
 b. 食咗 飯 *lu3*。
 sik6- zo2-faan6 *lu3*
 eat ASP meal SFP
 "I am done eating."

Both sentence (6a) and (6b) indicate the event of raining is about to begin or just begin. In other words, the event is about to realize. (7a) and (7b) can both indicate the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which is the completion of eating a meal. *Lu3* shares the common property of *l-family* which marks a change of state.

¹According to Saeed (2003), "to presuppose means to assume it". Saeed further explained this theory by using the following example:

- (a) Her husband is a fool.
 (b) She has a husband.

In the pragmatic usage of presupposition, it means that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have a common ground towards the message. The above example, (a), is the sentence that presupposes (b). If we said "her husband", it is a common knowledge that she has a husband. Both speaker and listener know it. Just like when we utter "John's brother went to France." it is presupposed that "John has a brother." However, some informative SFPs can show newsworthy function which means the audience can be totally ignorance to the fact. Due to this reason, this paper would adopt the word "assume" to get rid of misconception.

Such proper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e of the predicate of the sentence, which will be illustrated below:

2.2.1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 and stage-level predicate

Lu3 can show its property of change of state in any predicate. Two predicates are discussed here (Ackerman & Webelhuth, 1998; Lyons, 1995; Saeed, 2003). “An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 is true throughout the existence of an individual” (Ackerman & Webelhuth, 1998). For example, if John is “smart”, this is a property that he has, regardless of the time that the statement is uttered. In other words, the event described does not have an end point. In contrast, a *stage-level predicate* requires an end point of an event to signal the change, see (8)-(10).

- (8) a. 我係 香港人 aa3。
 Ngo4 hai6 heong1 gong5 jan4 aa3
 I am Hong Kong human SFP
 “I am a Hong Kong resident.”
 ?b. 我係 香港人 lu3。
 Ngo4 hai6 heong1 gong5 jan4 lu3
 I am Hong Kong human SFP
 “I have become a Hong Kong resident.”
- (9) a. 我識 中文 aa3。
 ngo5 sik1 zung1 man2 aa3
 I know Chinese SFP
 “I know Chinese.”
 *b. 我識 中文 lu3。
 ngo5sik1 zung1 man2 lu3
 I know Chinese SFP
 “I have acquired Chinese.”
- (10) a. 小明 去咗 機鋪 打機 aa3。
 siu2 ming4 heoi3-zo2 gei1 pou1 daa2 gei1 aa3
 Siu Ming go ASP game centre play game SFP
 “Siu Ming has gone to the game centre.”
 b. 小明 去咗 機鋪 打機 lu3。
 siu2 ming4 heoi3-zo2 gei1 pou1 daa2 gei1 lu3
 Siu Ming go ASP game centre play game SFP
 “Siu Ming has gone to the game centre.”

The above examples show the meaning difference between *aa3* and *lu3*. However, when *lu3* substituted *aa3*, different outcome may result. For (8a), the speaker is a Hong Kong citizen throughout his life; however, speaker who utters (8b) may not be a Hong Kong resident before, but after completing certain conditions, he becomes a Hong Kong resident now. Thus, a change must be involved. A similar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9). Sentence (9a) means “I know Chinese.” while (9b) means “I have acquired Chinese.” A change of state has to be involv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9b). For example, the speaker is not a Chinese native speaker and he has recently completed some Chinese courses, and so he acquired Chinese at last. This reading is

acceptable in only *lu3* but not *aa3*. (8b) and (9b) are similar to (10), which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stage-level predicate. Siu Ming shows a change of state from not going to the game centre to going there, so a change is resulted.

In short, no matter what kind of predicate *lu3* is appended to, it necessarily shows a change of state.

2.2.2 Current Relevance

Besides indicating a change of state, *lu3* can also show current relevance. The event should be so close to the speech time, which means the action will be happened soon, just finished, or even occurred a long time ago but the result still held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See the following examples (11)-(14):

- (11) a. 我 聽日 去 日本 *laa3*。
 ngo5 ting1 jat6 heoi3 jat6 bun2 laa3
 I tomorrow go Japan SFP
 “I will go to Japan tomorrow.”
 b. 我 聽日 去 日本 *lu3*。
 ngo5 ting1 jat6 heoi3 jat6 bun2 lu3
 I tomorrow go Japan SFP
 “I will go to Japan tomorrow.”
- (12) a. 陳小明 一九七九 年 讀 中學 *laa3*。
 Can4 siu2 ming4 jat1 gau2 cat1 gau2 nin4 duk6 zung1 hok6 laa3
 Chan SiuMing one nine seven nine year study secondary school SFP
 “Chan Siu Ming entered secondary school in 1979.”
 *b. 陳小明 一九七九 年 讀 中學 *lu3*。
 Can4 siu2 ming4 jat1 gau2 cat1 gau2 nin4 duk6 zung1 hok6 lu3
 Chan Siu Ming one nine seven nine year study secondary school SFP
 “Chan Siu Ming entered secondary school in 1979.”
- (13) a. 陳太 十年前 生咗 小明 *laa3*。
 can4 taai2 sap6 nin4 cin4 sang1-zo2 siu2 ming4 laa3
 Chan Mrs ten years ago birth ASPSiu Ming SFP
 “Mrs Chan gave born to Siu Ming ten years ago.”
 *b. 陳太 十年前 生咗 小明 *lu3*。
 can4 taai2 sap6 nin4 cin4 sang1-zo2 siu2 ming4 lu3
 Chan Mrs ten years ago birth ASPSiu Ming SFP
 “Mrs Chan gave born to Siu Ming ten years ago.”
- (14) a. 我 十二年前 就 住喺度 *laa3*。
 Ngo5 sap6 ji6 nin4 cin4 zau6 zyu6 hai2 dou6 laa3
 I ten two year ago then live here SFP
 “I have lived here since twelve years ago.”
 b. 我 十二年前 就 住喺度 *lu3*。

Ngo5 sap6 ji6 nin4 cin4 zau6 zyu6 hai2 dou6 lu3
 I ten two year ago then live here SFP
 “I have lived here since twelve years ago.”

??c. 我 十二年前 就 住 嚟度 lu3 ,
 Ngo5 sap6 ji6 nin4 cin4 zau6 zyu6 hai2 dou6 lu3
 I ten two year ago then live here SFP
 不過 三年前 搬咗 去 加拿大。
 bat1 gwo3 saam1 nin4 cin4 bun1 zo2 heoi3 gaa1 naa4 daai6
 but three years ago move-ASP go Canada
 “I lived here twelve years ago, but I moved to Canada three years ago.”

Sentence (11) shows that an event is happening soon. The speaker is going to change the state from “not going to Japan” to “going to Japan”. Therefore, both *laa3* and *lu3* are acceptable. For sentences (12)-(14), all of them are talking about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the distal past. Sentence (12) stated that “Chan Siu Ming entered the secondary school in 1979.” This sentence is talking about an old information happened many years ago. Therefore, if *lu3* is used as in (12b), it is odd and bad, even though it involves a change of state. Example (13) talks about “Mrs. Chan gave birth to Siu Ming ten years ago.”. Even though this event is no longer current to the speech time, it is still continuing at the present moment, which means that Mrs. Chan’s son is still alive. It exemplifies a feature of continuative and so *lu3* is applicable in (13b). Sentence (14a) and (14b) show that the speaker lived here since twelve years ago, and the speaker is still living here. Therefore, both *laa3* and *lu3* are also applicable. In (14c), the speaker no longer lived here, and moved to Canada. Under this situation, *lu3* is incompatible since the result no longer holds.

2.3 Suggestion

The second function of *lu3* is making suggestion, which means it can attached to sentence involving suggestion. A controversy is embarked to decide whether *laa3* can mark suggestion (Leung, 2005; Fang, 2003) or not (Kwok, 1984; Fung, 2000; Cheung, 2007). We are not going deep into this topic, and we decided to put *laa3* in this category showing suggestion. In fact, *laa3*, *lo3*, and *lu3* can also mark suggestion;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 degree of seriousness. *Lu3* generally carries a more casual and relaxed attitude. Also, sometimes the negation marker “唔”*m4* is used together with *lu3*. See the following examples from the conversation below:

- (15) I: (我)做緊 功課 aa3。
 zou6 gan2 gung1 fo3 aa3
 Do PROG homework SFP
 “(I) am now doing homework.”
- R: 咁 唔阻 你 lu3。
 gam2 m4 zo2 nei5 lu3
 then not disturb you SFP
 “It is better not to disturb you.”
- (16) M: [In a telephone call...]
 兩點鐘 laa3。

loeng5 dim2 zung1 laa3
two o'clock SFP
“It’s two o’clock now.”

K: 喂，咁 唔好 傾 lu3， 唔係 聽日 又 唔知 醒。
wai3 gam2 m4 hou2 king1 lu3 m4 hai6 ting1 jat6 jau6 m4 zi1 seng2
hey then not talk SFP otherwise tomorrow again not awake
“Hey, it’s better not to continue, otherwis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wake up in time tomorrow.”

The context in (15) is that “R” wanted to play with “I”, who was busy with her homework, so “R” suggested not disturbing “I” by uttering the above sentence. The other example comes from (16). “M” and “K” were talking phone and “M” noticed that it was two o’clock already. “K” was afraid of not able to get up in time so she suggested not continuing the call. In both cases, *lu3* is also applicable in making suggestion.

2.4 Newsworthiness

The newsworthy functio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made by the speaker towards the audience. The speaker assumes that the message is new to the audience’s mental world (Kwok, 2006). It realizes the implication by the speaker. Also,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context. The speaker utters such sentence because the message is worth noticing for the hearer.

For example:

(17) 我 食咗 飯 lu3。
ngo5 sik6-zo2 faan6 lu3
I eat-perf rice SFP
“I have finished the meal.”

(18) 三號 風球 lu3。
saam1 hou6 fung1 kau4lu3
three number typhoon SFP
“It has become typhoon signal no. three already.”

For sentence (17), let’s consider the context that somebody does not know that you have had the meal already and so he asked you to go for lunch. However, you are really full and then you utter (17). In sentence (18), it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typhoon signal number three has been hoisted now. The speaker thought that the hearer does not know this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he utters (18).

Even though Li (2007) stated that tone 3 is a neutral tone which does not contribute any meaning to the SFP; however, *lu3* can convey a sense of negative feelings. Sometimes the thing that out of your expectation may be always be regarded as negative event,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say that *lu3* is attached to the utterance saying something unexpected or even unwanted to the speaker or listener. See the examples below:

(19) 我 同 女朋友 分咗手 lu3。

ngo5 tung4 neoi5 pang4 jau5 fan1-zo2- sau2 lu3
 I with girlfriend break-up.perf SFP
 “I have broken up with my girlfriend.”

(20) S:有冇雪糕食呀仲?
 jau5 mou5 syut3 gou1 sik6 aa1 zung6
 have not ice-cream eat SFP still
 “Is there still any ice-cream?”

A:食晒 lu3, 你又唔早啲行出嚟。
 sik6saai3 lu3 nei5 jau6 m4 zou2 di1 hang4 ceot1 lai4
 eat all SFP you again not early little walk out come
 “It was eaten already, why don’t you come earlier?”

The speaker utters (19) or (20) are considering to inform the audience something that they do not know, or here, do not expect. The speaker utters sentence (19) to tell the hearer who does not know that he has broken up with his girlfriend. This sentence may also imply an unwanted or even sad feeling since the speaker himself does not expect it to happen. Sentence (20)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 and “A”. When “S” asks whether there is still any ice-cream, normally “S” expects there is some ice-cream left. Understand this expectation; the speaker “A” replied “It was eaten already” by using *lu3* so as to show the fact is unwanted by the hearer “S”.

To give a small conclusion on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roperties of *lu3* here, the core property of *lu3* is change of state and current relevance, it can functions as making suggestion. It can also mark newsworthy information. The rest of this chapter will show some sociolinguistic factors that may also limit the use of *lu3*.

2.5 Formality

As stated by previous studies (e.g. Leung, 2005), SFPs are usually found in casual speech and informal context. Let’s us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21) 我 上年 畢咗業 lu3。
 ngo5 soeng6 nin4 bat1 zo2 jip6 lu3
 I last year graduate.perf SFP
 “I have graduated since last year.”

Imagine there are two contexts that the same sentence is used: First, two friends are chatting about their academic affairs in a casual atmosphere in a restaurant. Then the above sentence is plausible. Second, if the background is inside a company, a graduate student is having interview. When the boss asked when the interviewee graduated, the interviewee should not say the above sentence as reply, since it will be regarded as impolite.

(22) 我 已經 做晒 功課 lu3。
 ngo5 ji5 ging1 zou6 saai3gung1 fo3 lu3
 I already do all homework SFP
 “I have already done all of my homework.”

The boy utters (22) in order to let the friend know that he has finished the homework. However, if the boy is a student talking to his teacher, even though the above sentence is grammatical, it is a impolite utterance.

2.6 Degree of seriousness

Fung (2000) said that *lo3* possess the most intensive emotions, and *laa3* is less forceful. Here, it is believed that *lu3* is the least forceful among the three. In other words, *lu3* shows the most casual emotion. See the following examples:

- (23) a. 本港 發出 今年 首個 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
 Bun2 gong2 faat3 ceot1 gam1 nin4 sau2 go3 hak1 sik1 bou6 jyu5 ging2 gou3 seon4 hou6
 This Kong hoisted this year first CL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Hong Kong hoisted the first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b. 本港 發出 今年 首個 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 *lu3*。
 Bun2 gong2 faat3 ceot1 gam1 nin4 sau2 go3 hak1 sik1 bou6 jyu5 ging2 gou3 seon4 hou6 *lu3*
 This Kong hoisted this year first CL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Hong Kong hoisted the first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HKET, 2013)
- (24) a. 陳志華 因為 偷野， 下個月 要 入獄 *laa3*。
 can4 zi3 waa4 jan1 wai6 tau1 je5 haa6 go3 jyut6 jiu3 jap6 juk6 *laa3*
 Chan Chi Wa because steal thing next CL month need into jail SFP
 “Chan Chi Wa is going to be sent to prison due to theft.”
 *b. 陳志華 因為 偷野， 下個月 要 入獄 *lu3*。
 can4 zi3 waa4 jan1 wai6 tau1 je5 haa6 go3 jyut6 jiu3 jap6 juk6 *lu3*
 Chan Chi Wa because steal thing next CL month need into jail SFP
 “Wa is going to be sent to prison due to theft.”
- (25) a. 佢 出門 唔記得 帶遮， 成身 濕晒。
 Keoi5 ceot1 mun4 m4 gei3 dak1 daai3 ze1 sing4 san1 sap1 saai3
 He/She out door not remember bring umbrella whole body wet all
 “He/She forgot to bring the umbrella when going out, so they got wet.”
 b. 佢 出門 唔記得 帶遮， 成身 濕晒 *lu3*。
 Keoi5 ceot1 mun4 m4 gei3 dak1 daai3 ze1 sing4 san1 sap1 saai3 *lu3*
 He/She out door not remember bring umbrella whole body wet all SFP
 “He/She forgot to bring the umbrella when going out, so they got wet.”

Sentence (23) is extracted from a newspaper. As stated in various studies, SFPs are not commonly found in formal settings like news report, public speech or academic seminar. Even though the information in (23b) involves a change of state from not hoisting the rainstorm signal to the hoisting, sentence (23b) is unacceptable. *Lu3* i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informal settings involve casual events, rather than indicating a serious event. The use of *lu3* here will drastically decrease the degree of seriousness, it can be possible only if the speaker is joking or does not treat such event seriously. Sentence (24) is possible to be found in casual conversation. Although one may argu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sentence (24) can be a serious matter, the speaker who utters this sentence may not really care about “Chan Chi Wa” or even to his crime.

(25) is another example showing that the speaker who utters (25b) is teasing his/her friends to be wet. It would be odd to use this sentence in formal context. Therefore,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tease or joke; and so *lu3* is fine in this sentence.

To summarize this section, *lu3* can function as realizing change of state, marking current relevance, making suggestion, and showing newsworthy.

III. Discuss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lu3* possess properties that are not the same as any existed SFPs.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paper, we found that *lu3* may be the variant of *laa3* or *lo3*. However, *lu3* seems comprise the properties found in those two. The following table helps summarize all functions found in *lu3*:

Table 1: properties of *lu3* which can also be found in *laa3* and *lo3*.

<i>Properties</i>	<i>Laa3</i>	<i>Lo3</i>	<i>Lu3</i>
Change of state			
Current relevance		X	
Newsworthy		X	
Suggestion			
Formality	Highest	mediate	lowest
Degree of seriousness	mediate	highest	lowest

In short, there are four prominent functions could be found in *lu3*. For semantic functions, it can realize a change of state, and current relevance; in terms of sentence type, it marks a suggestion; pragmatically, it shows newsworthy function. Here, we try to claim that there may be two senses of *lu3* in Cantonese. The first *lu3₁* is an informative used in declarative sentence to show change of state, current relevance, and newsworthy; the second one, *lu3₂*, is to make suggestion. These two *lu3*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hen the predicate inside a sentence involves a stative verb, then the *lu3* must be the second one, *lu3₁*. See the examples below:

- (26) 我 係 香港人 *lu3₁*。
 ngo5 hai6 hoeng1 gong2 jan4 lu3
 I am Hong Kong person SFP
 “I have become a Chinese resident.”
- (27) 我 識 中文 *lu3₁*。
 ngo5sik1 zung1 man2 lu3
 I know Chinese SFP
 “I have acquired Chinese.”

“hai6” (am) and “sik1” (know) are stative verbs. The *lu3₁* here marks a change of state that

the speaker in (26) may not be a Hong Kong resident, but he is now; and in (27) the speaker changes the state from having no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to acquire it. This sentence also shows the noteworthy feature of *lu3₁* which assumes that the audience did not know this fact before. On the contrary, if the predicate involve a non-stative verb, the sentence can be ambiguous. The sentence can be making a suggestion or an informative statement. Such as:

- (28) 我 哋 去 睇戲 *lu3₂* ◦
 ngo5 dei6 heoi3 tai2 hei3 lu3
 We go see film SFP
 “We are going to see films.”/ “Let’s go to see films, shall we?”

Imagine there are three people hanging around together, A, B and C. A uttered the above sentence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in two ways: first, A informed C that A would go to cinema with B. Thus, *lu3₁* is exemplified. The othe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A suggested all of them going to the cinema together. Then, the *lu3₂* is interpreted.

IV. Conclus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lu3* is a member of SFPs ‘*l-family*’. It shares the common semantic properties and meanings with the other ‘*l-family*’ members, which is showing change of state. Two senses of *lu3* can be found in Cantonese. One is an informative *lu3₁* used in declaratives which shows change of state, current relevance and newsworthy. The other *lu3₂* can make suggestion and show newsworthy property. *lu3₁* is compatible with stative verbs and non-stative; while *lu3₂* can only compatible with non-stative verb. Unlike what the previous literature’s claim, *lu3* is not identical to any existed SFPs; rather, it is a *l-family* member which integrates different properties from other members. Even though *laa3* and *lu3* are informative SFP, *lu3* does not serve reminding function. Among the three SFP *laa3*, *lo3* and *lu3*, *lu3* shows the least degree of seriousness and it can only be used in informal context.

After investigating *lu3* in this paper, two questions may be valuable to address. First, some literature uses the structural mapping approach to account for the properties of SFPs; however, it is rare to find any literature give explanation on the vowel “*u*” (e.g. *lu3*). In structural mapping can account every SFP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u*” the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if “*u*” has a certain meaning, why does it only exist in the *l-family*? Can it appear in *G-family* as ‘*Gu*’ or *Z-family* as ‘*Zu*’? These two questions may give important discovery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ng SFP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has three limitations: First,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t, the data is not able to be collected in a large amount. Second, because *lu3* is a mainly adopted SFP by youngsters, many corpuses could not find any data including *lu3*; only limited natural conversation by teenagers can be extracted as data in this paper. Third,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feature of newsworthy is sometimes hard to tell. For example, a speaker utters (29) since the hearer did not know this fact.

- (29) 陳卓樺 嚟緊 *lu3* ◦
 can4 coek3 waa4 lai4 gan2 lu3
 Chan CheukWahcome.prog SFP
 “Chan CheukWah is coming.”

However, in reality, it is hard to assume someone's attitude and mindset. It is difficult to assume that whenever the speaker utters sentence with *lu3*, he/she must be assuming that the hearer possess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message or even no idea to it. It shows that it is hard to control or anticipate what other's thinking in their mind.

This paper opens the door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SFP *lu3*. If structural mapping is available to account for all SFPs, can the other families also generate a “*u*” endings particle? what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u*”? If *lu3* can be used under a certain assumption by the speaker to the listener, how should we explain such assumption in speaker's mind? Hope that this paper can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n Cantonese Linguistics and especially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References:

黎錦熙. (1955) 《新注國文語法》，上海：商務印書館。

Ackerman, F. and G. Webelhuth. 1998. *A theory of predicates*.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Chao, Y.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eung, Samuel Hung Nin. 2007. *Xianggan Yueyu Yufa de Yanjiu*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ng, Xiao Yian. 2003. *Guangzhou fang yanjumoyu qi zhuci*. Guang 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Fung, Roxana Suk-Yee.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Law, S.P. 1998.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Ph.D Thesis. United States: Boston University.

Leung, C.-S. 2005. *A study of the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anguage Information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 Boya. 2007. *The dissection and structural mapping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The Netherland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Leiden.

Luke, K.-K. 1990.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Saeed, John I. 2003. *Semantics*. 2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Sybesma, R. & Boya Li. (2007). *The dissection and structural mapping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Lingua*, Volume 117, Issue 10, 1739-1783.

Kwok, H.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wok, W, -Y. 2006. *A Study of Cantonese Informativ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MA thesi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tthews, S., & Yip, V. 2001.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References (Newspaper):

<<黑雨5小時塌山泥癱瘓秀茂坪>>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23/05/2013

從短長到高低：廣府片粵語入聲的聲學性質及演化路徑

沈瑞清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1. 引言

在除粵語外的大部份漢語方言裡，中古清入類²如果仍然保留入聲韻尾（p/t/k/?）或者入聲調，大都只對應一個調類；但在大部份粵語裡，³清入類卻分化為兩類，形成了以廣府片⁴粵語為最典型的三個入聲調。⁵這種不管是歷時演變還是共時表現都十分複雜的入聲系統一直被視作粵語在漢語方言中的重要區別特徵之一。

以往對粵語入聲演變的研究主要從中古音的框架出發，試圖解釋粵語入聲調類的演變，而未見對微觀音變的語音機制及其動因的研究。跟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有三個新的出發點：一是根據聲調聲學描寫的成果，揭示廣府片粵語入聲的聲學性質；二是結合其他東南亞語言中類似的例子，指出長短入聲音高分化的不平衡性：“短高長低”模式遠比“短長高低”常見；三是在演化音法學的視角下審視“短高長低”的自然語音模式，用聽感的過度改正解釋了這一模式的成因，並構擬了一條“從短長到高低”的演化路徑。

本文也附帶討論了粵語陰入分化的時間及其跟台語支語言入聲相似性的成因究竟是底層、晚近影響還是平行演化的問題。

2. 廣府片粵語入聲的聲學描寫

以廣州粵語、香港粵語為代表的廣府片粵語大概是研究最充分的粵語方言，前人對香港粵語的語音也有較充分的描寫，⁶所以我們用香港粵語作為例子來討論廣府片粵語入聲的聲學性質。

2.1 香港粵語的長短元音

² 漢語的“入聲”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共時層面的含義，對應於以塞音（包括喉塞音）收尾的入聲，可以翻譯成 *stopped tone*；另一種是歷時層面的含義：對應早期漢語的“入聲類”，可以翻譯成 *entering tone* 或者 *Ru tone*。本文的“入聲”單獨使用時只用於第一種共時層面的含義，要表達歷時意義時則加上“中古”“類”等詞來限定。

³ 還見於部份平話以及少量湘粵桂三省交界處的土話（王莉寧 2011）。

⁴ 廣府片，又稱為粵海片，主要分佈在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粵中以及粵北部份地區。香港、澳門所通行的粵語基本上也屬於粵海片。

⁵ 部份粵語的中古全濁入類也分化為兩類，主要在广西境內（王莉寧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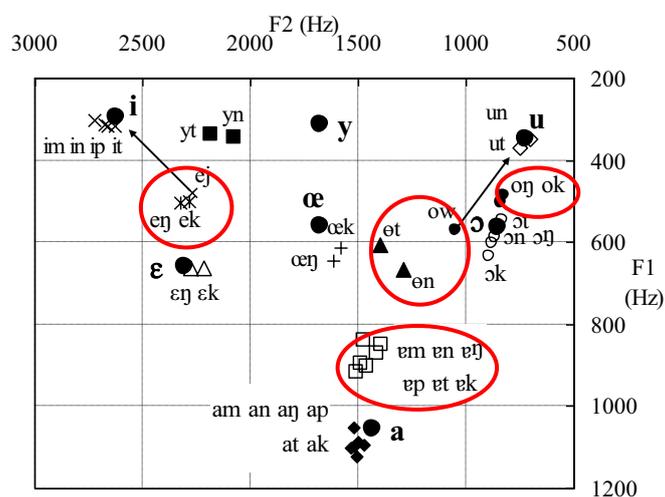
⁶ 香港粵語聲調的研究歷史請參看 Yim (2012: 41-74)。

廣府片粵語的入聲跟長短元音有密切的關聯，要瞭解入聲的聲學性質，必須先從長短元音入手。Kao (1971: 43-58) 跟李行德 (1985) 對長短元音在不同音節中的時長作了聲學測量，都得到了“開音節長元音>鼻音尾長元音>塞音尾長元音>鼻音尾短元音>塞音尾短元音”這樣由長到短的長度序列：¹

音節類型	CVV	CVVN	CVVO	CVN	CVO
舉例	ka ²	ka:m	ka:p	kəm	kəp
Kao (1971: 43-58)	308	203	169	100	89
李行德 (1985) ³	345	238	162	104	77
	長元音			短元音	

表一 香港粵語長短元音的長度序列

實驗語音學的研究表明，粵語的長元音跟短元音除了音長方面的差異，還有音質的差異，⁴這不僅體現在低元音[a:] [ə]的對立，也體現在高元音中，只是語言學家僅憑藉人耳很難分辨這些細微的音質差別。在下面的聲學元音圖中，圈裡的是短元音，圈外的則是長元音，可以看到兩者佔據了不同的聲學空間：



¹ Khorat 泰語的短元音在 CVO 音節里要長於 CVN (Roengpitya 2006)，其他的長度序列跟粵語相同。

² 開尾韻音節只能出現長元音，沒有長短元音的對立。

³ 李行德 (1985) 測量了廣州、香港各三人，這裡以香港一人的數值為代表。

⁴ 這跟英語的 tense-lax 元音很相似，所以 Yue (1972) 認為 tense-lax 比 long-short 更合適粵語。本文之所以仍然用 long-short 是因為 tense-lax 有太多不同的含義 (更多地用在跟發聲態相關的場合)，而且暗含兩兩相配的意思，而 long-short 相對較少附加含義，也不一定需要兩兩相配。更重要的是，大部份世界語言里的長短元音對立都伴隨著細微音質差異，比如泰語 (Abramson & Ren 1990) 跟紅水河壯語 (周學文 2012) 的長短元音也有音質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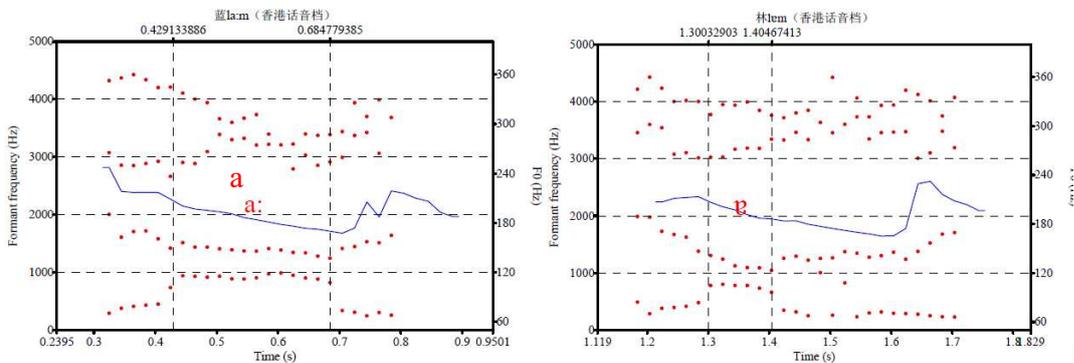
圖一 香港粵語聲學元音圖（轉引自嚴至誠 2011:192）

以往對粵語的元音系統有不同的音位處理：有的處理側重元音音值的區別，而把元音長短放在次要的位置，因而有得到較多的元音音位；有的處理則側重元音長短的區別，因而有較少的元音音位。¹¹這個例子正反映了音位分析處理冗餘語音信息的困境，“語音表達中的冗餘信息對於分類來說是必要的”，¹²而音位分析中“只有一個特徵被選來表達這種對立，這種選擇是隨意的、且根本不反應聽感、語言學的實質”。¹³

根據圖一的元音聲學圖，我們同意嚴至誠（2011）的看法，認為香港粵語一共有 11 個元音，其中 7 個長元音 [i/y/u/ɛ/œ/ɔ/a] 可以單獨作為韻母、也可以與元音尾、鼻音尾、塞音尾結合，而 4 個短元音 [e/o/ə/e] 不能單獨作韻母，只能與元音尾、鼻音尾、塞音尾結合。

2.2 長短元音與韻尾補償機制

粵語的十一個長短元音都可以與響音尾（包括元音尾跟鼻音尾）、塞音尾相配。對於響音尾來說，長元音或短元音作為韻腹並不會對它的音長產生顯著的影響，因為響音尾本身也是音長的負載單位之一。如果元音的音長較短，則響音尾會延長音長，從而補償長短元音之間的音長差異，比如：



圖二 香港

粵語¹⁴ “藍” [la:m] “林” [lem]的聲調曲綫與元音起始（豎線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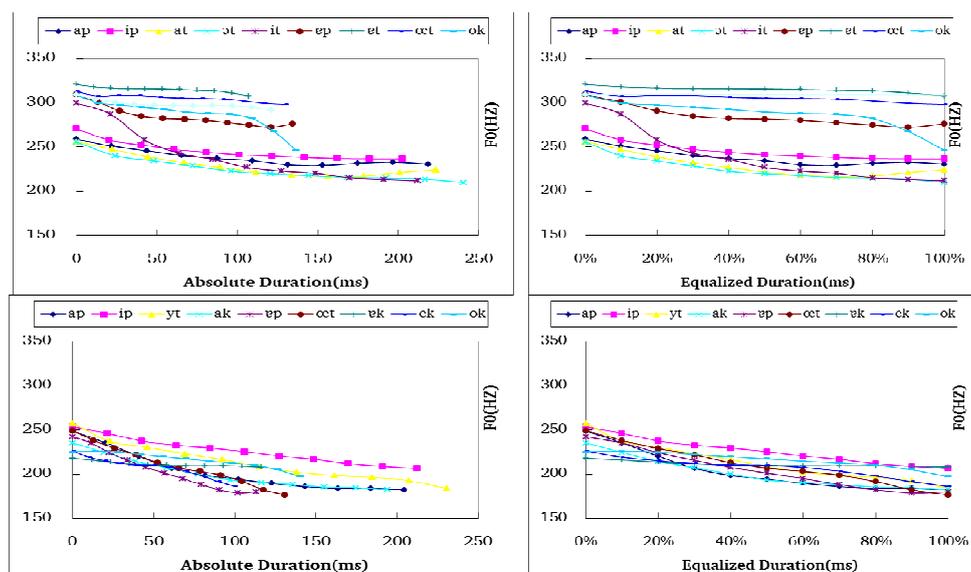
¹¹ 不同學者對音位歸併參看嚴至誠（2011），在此不再展開。

¹² Redundancy in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is essential to categorization. (Ohala & Ohala 1995)

¹³ Only one feature is chosen as expressing the contrast. This choice is arbitrary and often does not reflect the perceptual or linguistic reality. (Bybee 2001: 42-43)

¹⁴ 本文香港粵語的材料都來自《現代漢語方言音庫》的“香港話音檔”，其他來源則另作說明。

由於響音尾的補償作用，舒聲調的時長並不會因為長短元音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但對於塞音收尾的入聲調來說，情況卻很不一樣。由於塞音尾不負載聲調，因此長短元音的音長差異會直接反映在聲調的時長上，下面是入聲（上為陰入類、下為陽入類）部份例字的絕對時長圖與等長圖：¹⁵



圖三 香港粵語入聲部份例字的絕對時長圖（左）與等長圖（右）（上陰入類，下陽入類）

從左圖中我們看到，陰入類跟陽入類都形成了長短兩組，其中短陽入的分類完全與長短元音平行：一組對應 4 個短元音，長陽入一組則對應 7 個長元音。在右邊的等長圖上我們看到，跟陰入類分成有音高差別不同的兩組不同，陽入類的兩組沒有音高差別。

2.3 一個還是兩個陽入？

跟長短元音的音位分析類似，兩組陽入的對立也可以有不同的音位分析：一種看法（大多數學者）是把陽入類看作一個聲調，而把差異歸結為元音音質音長的不同，另一種看法（Yim 2012）則是把陽入類分成短陽入、長陽入兩個聲調，認為陽入類的區別跟陰入類的差別類似，都是不同的聲調。究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在傳統的音段/超音段兩分框架裡，音長正好處於一個兩可的地位：

¹⁵ 聲調作圖的方法根據朱曉農（2010：281-291）。



圖四 音段/超音段兩分框架裡音長的兩可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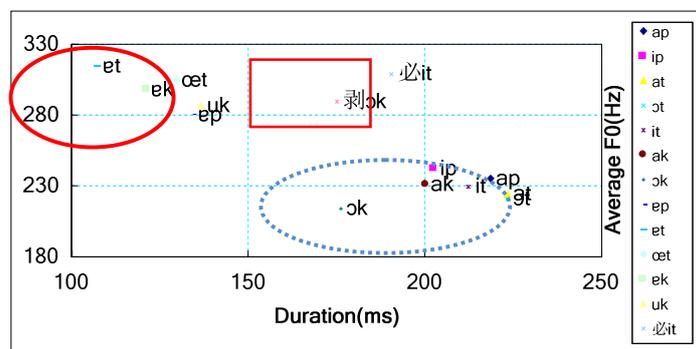
音長既可以視作音段特徵的一部份，也可以視作超音段特徵的一部份。因此，音長的差異是否處理成聲調有別，取決於對聲調的定義。如果接受“聲調=音高”的說法，那麼香港粵語只有三個入聲，兩組陽入的時長差異是元音的附加特徵；如果接受聲調多維說（朱曉農等 2010），即聲調不僅包括音高，也包括時長等其他維度，那麼香港粵語無疑有四個入聲。下表是入聲與長短元音的搭配關係及其兩種分析：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上陰入	下陰入	短陽入	長陽入
短元音	ok/ət/et/ek	+	-	+	+	-	+	-
短元音	ek/ɛp	+	(+)	+	+	(+)	+	-
長元音	ip/yt/ut/œk/ɔt/at	-	+	+	-	+	-	+
長元音		(+)	+	+	(+)	+	-	+
	it/ɔk/ɛk/ap/ak	(+)	+	+	(+)	+	-	+

表二 香港粵語入聲與長短元音的搭配及兩種分析（左三個入聲，右四個入聲）

從上表我們看到，陽入類在與長短元音搭配時沒有例外，所以有看作一類跟看作互補的兩類兩種分析。而陰入類與長短元音相配卻有一定數量的“例外”，所以必須分成上下陰入兩類。¹⁶可見，上下陰入跟陽入兩類的區別的關鍵就在於這些“例外”，下面是香港粵語上下陰入部份例字：

¹⁶ Yue (1972:177) 列出了上下陰入與長短元音相配的例外，其中上陰入與長元音相配的有 13 個語素，下陰入與短元音相配的則有 5 個語素。



圖五 香港粵語上下陰入部份例字的絕對時長（橫軸）與平均基頻（縱軸）

上圖中橫軸是絕對時長，縱軸是平均基頻。如圖所示，上陰入一般集中在左上角（時長短，基頻高），下陰入則集中在右下角（時長長，基頻低），而“必”“剝”兩個字則是時長長（長元音），基頻高的“例外”。處於右上角的“必”“剝”跟上陰入有相近的基頻，跟下陰入有相近的時長。說香港粵語的人把“必”“剝”感知為上陰入而非下陰入，這說明從聽感上來說，音高是比時長更重要的聲學線索，可見上下陰入是以音高作為主要聲學線索的，與陽入兩類以時長及元音音質作為主要聲學線索不同。

上文我們已經指出，香港粵語到底有三個還是四個人聲調取決於對聲調的定義。我們更關心的是理解香港粵語陰入類跟陽入類的聲學性質：上下陰入以音高作為主要聲學線索，而陽入的長短兩類沒有音高區別，以時長及元音音質作為主要聲學線索。

3. “短高長低”的人聲模式

3.1 “短高長低”與“長高短低”

音高相同的長短入聲如果產生音高分化，從邏輯上來說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語音模式（sound pattern）：一種是“短高長低”，即時長較短的入聲比時長較長的入聲音高更高，另一種是“長高短低”，即時長較長的入聲比時長較短的入聲音高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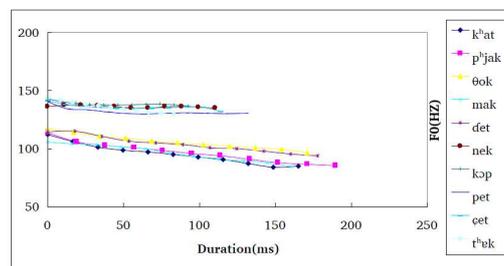
從圖三左上的絕對時長圖，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粵語的陰入類呈現出“短高長低”的模式，王莉寧（2011）利用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漢語方言地圖集數據庫”中 61 個粵語、39 個平話以及 20 個湘粵桂土話調查點的材料，考察了古入聲字“短元音與長元音短

高長低分調”¹⁷的音變現象，總結了 7 種不同的調值類型，除了部份平話（賓陽、羅城、上林）跟土話（嘉禾）濁入分調外，其他都符合“短高長低”的模式。

有意思的是，這種“短高長低”的模式並不是粵語的特色，這種入聲模式普遍存在於東南亞語言，下面我們舉一些具有“短高長低”入聲模式的例子。

3.2 扶平壯語的“短高長低”

第一種是扶平壯語，屬於侗台語族的中部台語支。¹⁸發音人為 1979 年生的男性，在廣西德保縣扶平鄉長大。扶平壯語 D2 調的長短入聲沒有音高區別，而 D1 調有音高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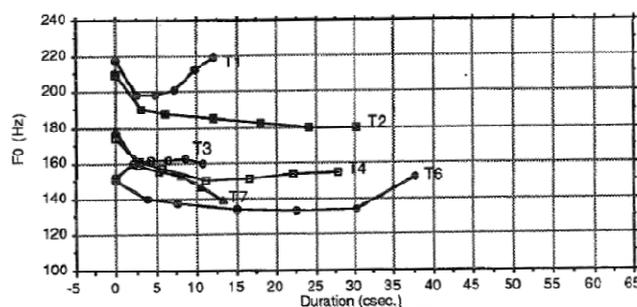


圖六 扶平壯語 D1 長短入聲的絕對時長圖

如圖所示，扶平壯語的 D1 呈現出跟粵語上下陰入非常相似的模式——“短高長低”。

3.3 PPN 泰語方言的“短高長低”

下面我們來看屬於侗台語族東南台語支的一種泰國南部方言的入聲（Rose 1996），這種方言有有六個入聲調：



圖七 PPN 泰語入聲的平均基頻曲綫（轉引自 Rose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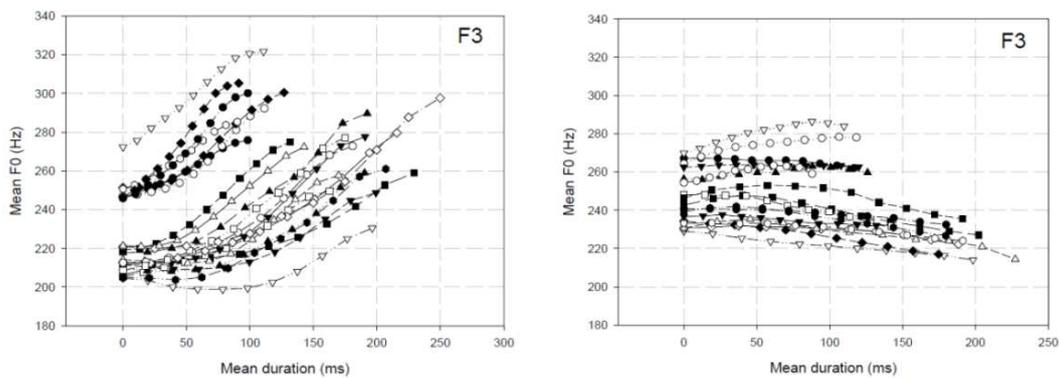
¹⁷ 原文用“高短元音與低長元音分調”的說法，這一說法容易引起“高短元音”比“低長元音”舌位更高的誤解，其實，這裡的高低是音高，屬於聲調的範圍，與元音無關，所以這裡採用了“短元音與長元音短高長低分調”的表述。

¹⁸ 關於扶平壯語的概況及其聲調聲學描寫，參看 Shen & Liao (2012)。

從圖中可以看到，六個人聲兩兩相配分成三組（T1-T2、T3-T4、T7-T6），這三組早期應該具有相同的音高，現在逐漸產生分化。其中 T3-T4、T7-T6 的音高還比較接近，而 T1 的音高則明顯高出 T2。呈現“短高長低”的模式。

3.4 北中部越南語方言的“短高長低”

越南語屬於南亞語族越芒語支，Honda 的博士論文（2008）詳細描寫了北中部越南語方言的音系，發現河內越南語的兩個人聲 Sac、Nang 在這個方言裡分別發生了進一步的分化：



圖八 越南語北中部方言入聲的分化（轉引自 Honda 2008: 114, 123）

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越南語方言入聲的分化也遵循“短高長低”的原則。

3.4 自然語音模式（nature sound pattern）及其解釋

如果長短入聲的音高分化沒有任何語音限制，那麼“短高長低”與“長高短低”兩種語音模式的分佈應該具有對稱性，即大致呈現相同的出現頻率。

但是，我們在漢藏語族的漢語方言、侗台語族的台語支語言跟南亞語族的越南語方言裡都發現了“短高長低”的入聲模式，而“長高短低”的入聲模式卻非常罕見。¹⁹可見這並非偶然，說明“短高長低”相對於“長高短低”來說是一種更自然的語音模式。

¹⁹ “長高短低”的語音模式在我們目前考察的語言中有泰語 D2 調疑似一例。其實，泰語的 D2L 跟 D2S 有相似的基頻範圍，也不是嚴格的反例。而且，泰語入聲的 D2S、D2L 一般認為對應非入聲音節裡的 High、Falling 調，Abramson（1962）描寫的 High 調處在最高的基頻區（約相當於五度制的 45），而在當代年輕人的泰語這個 High 調已經逐漸降低，見 Thepboriruk（2010）。所以泰語入聲的音高可能經歷了較大的改變。

要解釋自然語音模式（nature sound pattern）最合理的辦法是找到它的語音基礎，並把它在實驗室裡用物理模型還原出來。因此，Blevins 從演化音法學的角度把自然語音模式定義為“基於語言的發音和聽覺性質的語音模式”。²⁰下面我們就從演化音法學的角度來看“短高長低”入聲模式的語音基礎及其演化階段。

4. “短高長低”入聲模式的語音基礎及演化階段

4.1 演化音法學

演化音法學是 Evolutionary Phonology²¹的譯名（朱曉農 2011），演化音法學把語言看作一個跟生物有機體類似演化過程的複雜自我調整系統（adaptive system）（Ohala 1989；Blevins 2006），它也是根基於我們對聲音發聲和感知的物理實質的一個動態的、有概率性的演化系統。

演化音法學的兩個中心目標是解釋語音模式跟音變的相似性，並為這種相似性尋找音系外部的解釋，這兩個目標使它跟傳統歷史語言學、早期類型學以及生成音系學等理論大不相同（Blevins 2006: 131）。它把語音模式跟音變聯繫在一起，認為共時層面的相似是歷時演化的結果，“常見共時語音模式來源於常見語音驅動的音變”。²²因此，語音模式的解釋應該向基於發音的變異，語音變異的限制、誤聽的概率等方向去尋找答案。

4.2 “短高長低”的語音基礎

為什麼不同語系不同方言在不同時期發生的長短入聲音高分化都遵循短高-長低的模式？背後是什麼語音機制在起作用？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條平調的聲調共性。跨語言的研究表明，平調中元音的時長跟平均基頻有逆相關：其他條件一致時，低調的元音比高調的元音更長，Faytak & Yu（2011）重新從類型學角度證明了這條規律的可靠性。同時，跟這一共時變異完全平行的還有歷時音變，根據 Svantesson（1989）對北部孟高棉語聲調起源的研究，Hu 語的高低調來自長短元音：

²⁰ Natural sound patterns are sound patterns grounded in articulatory and perceptual properties of speech. (Blevins 2008: 126)。

²¹ 關於 Evolutionary Phonology 的最新進展跟內部差異，可以參看 Hansson（2008）。

²² Recurrent synchronic sound patterns have their origins in recurrent phonetically motivated sound change. (Blevins 2004:5)

Hu	Lamet	
jam (H)	jam	'to die'
jam (L)	ja:m	'to cry'

表三 來源於長短元音對立的 Hu 語高低調（轉引自 Heike 2013：101）

高調對應短元音，低調對應長元音，這跟我們上文總結的入聲“短高低長”的模式完全一致。²³對於平調中元音的時長跟平均基頻有逆相關這條規律，Yu (2010) 受 Ohala (1981) “聽者引發音變”的啟發提出一種解釋，認為這是為了保證不同聲調聽感時長的一致性而採取的一種補償性加長策略，是由於過度改正（hyper-correction）引起的。由於低調的感知長度較短，所以在感知低調時會導致時長縮短；反過來，感知高調時也會導致時長延長。為了把感知的效果（時長）歸一化，說者就會把低調發得比高調長，通過發音的調整來達到聽感的一致。

我們認為，平調以及入聲音高分化的“短高長低”也可以用過度改正來解釋。由於聽感上低調會縮短，所以聽者聽到一個短調會懷疑是因為音高低所導致的歸一化效應，因而變成說者的聽者在發音時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調整來補償，因而就會抬升音高。反之，長調會通過降低音高來補償。下圖以短入為例，分析音高變高的原因：



圖九 過度改正（hyper-correction）引起長短入聲音高分化的假想過程²⁴

這種由於過度改正所導致的音高變化如果被逐漸感知，并漸漸成為主要的聲學線索，那麼從短長到高低的演變也就完成了。

4.3 三個演化階段

²³ Heike (2013：101) 認為從元音長短到音高高低的演化方向較為少見，這是針對非塞音收尾韻說的，在上面第三節我們已經看到，對塞音收尾的入聲來說，元音長短到音高高低的演化方向是極為自然的。當然，這跟入聲的時長較短、增加了元音長短聽辨的困難有關。

²⁴ 此圖是根據 Ohala (1981：187) 方案三，結合長短入聲的例子而繪製的。

理解了“短高長低”入聲模式的語音基礎，我們可以進一步重構長短入聲音高分化的演化階段。

從第二節對香港粵語入聲的聲學描寫可以看到，香港粵語的陽入類以時長為主要聲學線索，音高不起作用，而香港粵語的上下陰入以音高為主要聲學線索，兩者分別代表了演化的起點與終點。

那麼，演化的中間階段如何呢？我們發現第三節介紹過的北中部越南語方言可以作為中間階段的代表。Honda（2008 第 6.3 章）的研究表明，北中部越南語的兩個入聲究竟以音高還是時長作為主要聲學線索在不同發音人中有不同表現。這樣，我們就可以為長短入聲音高分化重構如下的三個演化階段：

階段	例子	語音/音位表現	聲調感知
1	香港粵語陽入類	長短入聲有元音音質跟時長的差異，沒有音高區別	音高不起作用
2	北中部越南語入聲	長短入聲的元音音質、時長跟音高都形成區別，音高區別較小	以音高還是時長作為主要聲學線索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表現
3	香港粵語上下陰入	音高區別變大，並且在時長跟音高的搭配中形成“例外”，形成了僅以音高區別的最小對立	以音高作為主要聲學線索

表三 長短入聲音高分化三個演化階段的構想

表中的第一階段是起點，此時長短入聲完全根據長短元音的時長來區別，音高不起作用。到了第二階段，由於聽感的過度改正，“短高長低”的讀音開始在人群中擴散，音高的差別也逐漸被感知，有些人群開始用音高代替時長來作為主要聲學線索。到了第三階段，音高區別變大，並且在時長跟音高的搭配中形成“例外”，形成了僅以音高區別的最小對立。

5 韻尾

在此基礎上，附帶討論一個目前學界尚有爭議的問題：“粵語和壯語的入聲都以元音長短分調，這反映古老的底層還是晚近的影響或平行演變”（麥耘 2009：224 注 1）。

余藹芹（Yue 1972：48）在比較了廣州、台山、廉州三處陰入的分化之後，認為“陰入的分化在原始粵語裏已經發生”，而王莉寧（2011）指出粵語的“元音分調”（即本文的“音高分化”）有不同類型，“導致音變的關鍵因素應是音變發生時的實際音值，不能簡單地歸之為‘古音’或‘今音’”。我們同意王莉寧（2011）的看法，認為長短入聲（不

管是陰入類還是陽入類)的音高分化是在粵語分支各自發生的,所以在古音類的對應上會有所不同。

另外,有很多證據表明台語支語言長短入聲的音高分化也是後起的,由於牽涉的問題較廣,這裡無法進一步展開。

根據本文的研究,長短入聲演化為“短高長低”的模式是一種有自然語音基礎的泛時音變,可以在任何時候獨立地在具有長短入聲的語言里發生。因此,粵語跟台語支語言的相似性很可能是各自發生的平行演化。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語言接觸會誘發音變的因素,語言演變的外部因素跟內部因素並非截然對立。

另外,粵語的長短元音跟中古內外轉的關係以及粵語跟台語長短元音的相似性及其來源等,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相關問題,只是相關的討論已經超越本文的範圍了。

參考文獻

- Abramson, A.S. 1962. The vowels and tones of standard Thai: Acoustical measurements and experiments. Indiana U. Research Center in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Pub. 20. Bloomington.
- Abramson, A. S., & Ren, N. 1990. Distinctive vowel length: duration vs. spectrum in Thai. *Journal of Phonetics*, 18(1), 79-92.
- Alan, C. L. 2010. Tonal effects on perceived vowel duration. *Laboratory Phonology* 10, 4(4), 151.
- Blevins, J. 2004. *Evolutionary Pho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evins, J. 2006. A theoretical synopsis of Evolutionary Phonology,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2: 117–166.
- Blevins, J. 2008. Natural and unnatural sound patterns: A pocket field guide, In: Willems, Klaas and Ludovic De Cuyper (eds.), *Naturalness and Iconicity in Language*. pp. 121–148.
- Bybee, J. 2003. *Phonology and language use* (Vol. 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 R. 1934. On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 363–397.
- Faytak, Matthew. & Alan C. L. Yu. 2011.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vel tones and dur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honetic Sciences XVII*.
- Gedney, William J. 1972[1989]. A checklist for determining tones in Tai dialects. *Studie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George L. Trager*, ed. by M. Estellie Smith. The Hague: Mouton: 423-437.
- Hansson, O.G. 2008. Diachronic explanations of sound patterns. *Language & Linguistics Compass* 2(5): 859–893.
- Heike Lehnert-LeHouillier. 2013. From Long to Short and From Short to Long: Perceptual motivations for changes in vocalic length. In *Origins of Sound Change: Approaches to Phonolog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nda, Koichi. 2008. *Tone in the Lam River Speech of North-Central Vietnamese*, Ph. D. disserta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Kao, Diana L. 1971. *Structure of the Syllable in Cantonese*. Hague: Mouton.
- Thepboriruk, K. 2010. “Bangkok Thai tones revisited”, *J.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 Soc.*, 3(1):86-105.
- Li, Fang 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Michaud, Alexis. 2004. Final consonants and glott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from Hanoi Vietnamese. *Phonetica* 61. pp. 119–146.

- Ohala, J. J. 1972. How to represent natural sound patterns.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Berkeley) 16.40-57.
- Ohala, J. J. 1981. The listener as a source of sound change. In: C. S. Masek, R. A. Hendrick, & M. F. Miller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anguage and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Ling. Soc. 178 - 203.
- Ohala, J. J. 1989. Sound change is drawn from a pool of synchronic variation. L. E. Breivik and E. H. Jahr (eds.), *Language Chang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its causes*. [Series: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No. 4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73–198.
- Ohala, J. J. & Ohala, M. 1995. Speech perception and lexical representation: The role of vowel nasalization in Hindi and English. B. Connell & A. Arvaniti (eds.), *Phonology and Phonetic Evidence*. Papers in Laboratory Phonology 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60.
- Roengpitya, Rungpat. 2006. “The Phonetic Realizations of the Khorat Thai Tone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Australas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e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ST 2006)*.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December.
- Rose, Phil. 1996. *The Realization of Stopped-syllable Tones in Hua Sai and Pakphanag*.
- Shen Ruiqing and Liao Hanbo. 2012. *Acoustic-tonetic Study of Pjang Zhuang: An undescribed Central Tai Var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Singapore.
- Svantesson, J. O. 1989. Tonogenetic mechanisms in northern Mon-Khmer. *Phonetica*, 46(1-3), 60-79.
- Thepboriruk, Kanjana. 2010. “Bangkok Thai Tones Revisited.”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Linguistic Society* 3(1): 86-105.
- Yim, Chi Sing. 2012. *A Phonetic Study of Syllabic Constituent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Ph.D.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Yu, A. C. L. 2010. Tonal effects on perceived vowel duration. In: Fougeron, C., Kühnert, B., D’Imperio, M., Vallée, N., (eds), *Laboratory Phonology 10*. Mouton de Gruyter 151–168.
- Yue Oi-Kan. 1972. Interplay of Vocalic Segements and Tones in the Yueh Dialects. in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 蔡榮男（2007）《傣語的聲調模式和元音模式》，四川大學出版社。
- 李行德（1985）廣州話元音的音值及長短對立，《方言》1: 28-38。
- 麥耘（2009）從粵語的產生和發展看漢語方言形成的模式，《方言》第3期。
- 王莉寧（2011）粵語中的元音分調現象，《中國語文》第1期。
- 嚴至誠（2011）從普遍音節角度解決粵語語音描寫與音系分析的糾葛，《語言研究集刊（第八輯）》，上海辭書出版社。
- 周學文（2010）紅水河壯語長短元音聲學分析，《中國語言學集刊（第四卷 第一期）》，中華書局。
- 朱曉農（2009）發聲態的語言學功能，《語言研究》3:1-19。
- 朱曉農（2010）《語音學》，商務印書館。
- 朱曉農（2011）語言語音學和音法學：理論新框架，《語言研究》第一期。
- 朱曉農、嚴至誠（2009）入聲唯閉韻尾的共時變異和歷時演化：香港粵語個案研究，《南方語言學》1: 34-44.
- 朱曉農、焦磊、張偲偲（2010）聲調四維度，《研究之樂：慶祝王士元先生 75 壽慶論文集》（潘悟雲、沈鐘偉編），415-430，上海教育出版社。

對外粵語教學與粵語語言學的互動: 以量詞的語法限制為例

Chan Kin Wing, Kev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傳統的方言研究多依靠研究人員對其母語的語感及觀察，從而描寫、分析某一方言在語音、詞彙、語法、語用等的特性。劉丹青(2006)提出，研究者除了利用內省的方法外，還可以透過搜集語篇等手段，等這些語料進行統計、研究，以及利用跨方言甚至跨語言的類型學比較以了解方言之間的共性與個性（如劉丹青(2003)的介詞研究；張敏(2011)的雙及物結構研究等）。我們認為，在對外粵語的課堂上，亦能為方言研究者提供不少寶貴的線索及研究的切入點。

粵語的二語學習者是一個多元化的群眾，他們的語言背景，閱歷，文化等方面各有差異。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偏誤往往天馬行空，是以粵語為母語的研究者難以想像的。故此，透過進行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可以讓研究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了解粵語或其他語言/方言在語音語法等的特徵。

以粵語[數量詞-名詞]的句法為例，前人對粵語與漢語的[數詞-量詞-名詞]結構(如「一個人」、「一本書」)進行研究，了解到粵語的特點是：當數為「一」時，數詞可以省略(張洪年 2007:333)。故此「我買咗一本書」(我買了一本書)可省略為「我買咗本書」。但是經過我們對粵語二語學習者的偏誤分析，發現部分(尤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時常誤用量詞，如並列式「我今朝買咗本書、個蘋果、抽提子...」。就語言本體而言，本文要解決的問題如下：(一)究竟「我買咗一本書」→「我買咗本書」是省略的現象，還是另有原因?(二)[量詞+名詞]的語法限制(如果有的話)是甚麼呢?就方法論而言：本文希望以「量詞的偏誤分析」→「數量詞省略式研究」為例，提出對外粵語教學有可能成為一種方言研究的新方法。

嘆詞之「極邊緣結構」的提出

陳冠健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傳統分析中，嘆詞是獨立語，如黃廖(2002)就將感嘆詞歸入獨立語之類，但這分析片面、不準確。劉丹青指出嘆詞是代句詞，而嘆詞可分為話語標記和非話語標記代句詞，前者不成句，後者成句，本文旨在指出，即使成句嘆詞也只能說在詞類獨立，其句法上仍與其他句子產生結構性關係，兩類嘆詞都處於一個「極邊緣結構」位置，而本文所謂「極」，是指嘆詞轄域可包含一個句子的邊緣結構，或者豐富邊緣結構內容，嘆詞處於的位置，就是句子前頭邊緣的位置。

話語標記嘆詞不能以獨立語視之，因為在欠缺後面句子的情況下，它根本不能成句，如「*喂(wai3)！」，這句包含了說話者、抽象／施行動詞、聽話人三者，說話人是「我」，抽象／施行動詞則是「現在呼喚……聽我說」，而聽話人便是「你」，但是它缺少了命題，因此它不能獨立成句；但如是「喂(wai3)，聽講今日落咗雨喎！」即合語法，後面一整句充當了「喂」作為話語標記欠缺的命題，「聽講今日落咗雨喎」雖然具體呈現了一個知域邊緣結構，但其不過是「喂」的代句「我現在呼喚你聽我說」的命題內容的一部分。「喂」呈現了一個不完整的調賓句式，其欠缺了賓語，需要由後面的小句補充，雖然話語標記嘆詞要依賴後面小句補足賓語方能成句，但在結構、層次高低論之，話語標記嘆詞的轄域甚至可覆蓋後面小句的邊緣結構，所以本文說它們有著「極邊緣結構」。

非話語標記嘆詞可獨立成句，代感嘆句如「唉！」，代祈使句如「噓！」，傳統語法文獻多集中討論其獨立地位，卻忽略了非話語標記嘆詞會與後句發生結構性關係，若應用三域理論說明，這種關係便會呈現出來。話語標記嘆詞之後的句子，只能是知域或言域理解，不會是行域，這種非話語標記雖有獨立地位，但它會豐富後句邊緣結構，行域句會被這種非話語標記嘆詞賦予知域或言域性質，例如「唉！落咗雨！」，「落咗雨」本身表示的僅僅是事態出現變化，即由沒有下雨到下雨，但「唉！」賦予它知域性質，「落咗雨」便不單純表示事態變化，而變成「（我得知、我感慨／不喜歡）落咗雨。」，如此即成為

行域加知域的句子，其以疊加作為傳導方式。當然，「落咗雨」能理解為知域，可以有另一個假設，即表示感情判斷的知態純粹由非話語標記嘆詞而來，而後句仍然只表示行域意義，當中沒有邊緣結構內容的傳導和疊加，但「?（知域）唉！（行域）落咗雨！」比較驚扭，因為前後句感覺割裂而不關連，若理解為「（知域）唉！（知域）（行域）落咗雨！」，語感就自然很多，這反映知態完全來自非話語標記嘆詞一說是不合理的。從以上論證可得出一個推論：非話語標記嘆詞在語法地位上是獨立的，但後句卻非完全獨立，因為非話語標記嘆詞會將知域或言域意義，疊加到後句邊緣結構，若欠缺這些疊加成分，後句語感就會變差，這反映疊加部分不是多餘的，故此本文提出非話語標記嘆詞與後句產生結構性關係，由於非話語標記嘆詞引伸出來的代句，可疊加和豐富後句的邊緣結構，因此本文稱其為「極邊緣結構」。

總括而言，兩類嘆詞都不應該如傳統分析般，單純視為獨立語，它們其實處於一個「極邊緣結構」位置，各自與嘆詞後句發生不顯然的結構性關係。

近年香港「潮語」研究綜述

鄒陳惠儀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潮語」，又稱潮流用語，屬「次文化」語言。所謂潮流，就帶有迅速流行、轉變快捷的意思。香港出現的「潮語」，其來源有其特定的時地人事，可說是既貼近生活而又富創造力的語言。「潮語」並非唯香港獨有，內地、台灣也有「潮語」。一些書籍認為國內的「潮語」，很多均與網落世界有關。然而香港的「潮語」卻來源豐富，不限於網落世界。香港「潮語」的影響力可謂不少，除了前特首曾蔭權在其《香港家書》（電台廣播節目）中曾使用「潮語」外，香港考評局於 2008 年的中文科會考試題，也出現「潮語」在考題中。有些學者以為「潮語」屬於俚語，也有學者以為屬於俗語，無論如何，每個「潮語」背後均反映其社會文化意義，屬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範疇。由於香港「潮語」愈來愈流行，於是相繼出現了不少解讀香港「潮語」的書籍，至於研究和分析香港「潮語」的文章則比較少。筆者愚昧，嘗試以有限之識，從有關香港「潮語」的解讀書籍、香港「潮語」的研究論文、互聯網上對香港「潮語」的討論文章等等有關香港「潮語」的種種，梳理出一些比較有系統的資料，作一膚淺的綜述。筆者期望拙著能夠起拋磚引玉之效，引起對香港「潮語」有興趣的專家學者，對這課題作深入的研究，為香港的本土語言、為香港的本土文化，作更深入的分析 and 論述。

賀州地名用字的語言學考察

陳才佳

賀州學院，南嶺民族走廊研究院

賀州是一個多語多方言地區，其族群對山川聚落的命名差異顯著。尤其是最早進入賀州的勾漏粵語族群，其命名帶有鮮明的族群邊界。

壹、山體局部的命名。

1. 斜坡：勾漏粵語用“界”，客家族群用“見”、“峴”。今勾漏粵語區分佈著大量帶“界”

的地名，如：魚盆界、雷公界、白藤界、大界等幾十個。“界”已成為了“坡”的通名。

2. 緩坡：勾漏粵語把“平緩的山脊”用“岐”命名，指稱整條山脊。如：黃河瑤族鄉三岐過山瑤新村。

3. 山谷：勾漏粵語“山谷”一般叫“山冲”或“冲埕”，中間低窪的條狀地帶也稱“埕”，民間譜牒記載的地名有：杉木埕、石排埕、屋地埕、水井埕等。

4. 塆：類似山谷到山脊的斜坡稱之為“塆”，如：田基塆較高田埂的垂面，冲塆、豬兒塆等。

貳、土堆的命名

1. 枹：勾漏粵語用“枹”指稱凸起長有樹木、方圓二三十畝不等的小土坡或矮嶺。如鐘山縣有：栗木枹、大枹、新塘枹、烏木枹等，桂嶺鎮民間譜牒文獻記載有：大木枹、老湯枹、木枹、水井枹等。

2. 璋：凸出土堆。鐘山地名有龍眼璋、油麻璋、銅鑼璋、大璋等。

3. 埕：凸出的、可耕種的小地塊。桂嶺民間譜牒記載而至今還用的有：鐵屎埕、笕頭埕、筆頭埕、水井埕、高良埕、白墳埕等。

4. 墩：土堆。鐘山地名有上墩、五星墩等。

叁、泉水及低窪田地的命名

1. 澗：泉眼、泉水。民間習慣寫成“汶”，如：大汶（2）、汶井等。

2. 澁：深泥；爛泥。勾漏粵語地名有：澁田（2）、澁洞（2）、澁塘、澁田寨、澁田村、小澁田、大澁、澁塍。

3. 塍：低窪之地。南鄉勾漏語的“澁田塍”、鐘山土話的“澁塍”都是指低窪冒水田。鐘山縣地名有菜塍、澁塍。榔：富川縣梧州人（屬勾漏語族群）用於地名，專指有樹木的矮嶺。如：木榔村。賀州沙田地名有：高浪，因地處矮嶺而得名。字形不同，其意義都是指高地。

4.湖洋：指常年有水的爛泥田。客家話地名有：湖洋沖、湖洋坪、湖洋口、田洋、湖洋、湖洋壩等。

5.那：水田。現南鄉保留的地名有：那遠、那旱。以“那”命名的地名極少，南鄉僮族主要以耕作山地、林地為主。稻作的萎縮可能引發以“那”命名地名的減少。

肆、以“荊棘”“棉花”冠名

1. 𣎵：刺；荊棘。勾漏粵語區以“𣎵”命名的地名有：勒山口、勒山、勒塘寨、𣎵塘、勒竹（2）、勒木、野勒、勒島（2）等。賀州客家管“𣎵”叫“net”，小地名有：大□net¹沖、□net¹竹坳等。

2. 培：近音借字，表“棉”義。勾漏語族群“棉”俗稱“培”，包括棉植株、棉花。地名有：培地、大培寨等。

地名作為區域族群特定的象徵符號，以其族群語言的聲音形象作為表達形式，體現了不同族群與地理實體的密切聯繫。地名的命名蘊涵著深刻的族群性，因此這些地名由口語轉寫為書面語時，必須充分考慮其族群的語言習慣和認同程度，最大限度地保護地名的歷史淵源、語言文化、地理認知等諸多資訊。在地名普查更名中，更要做深入、細緻的田野調查，不僅要瞭解其地名由來，還要考察其地理環境及其人文景觀，更要重視傳說口碑。其實，傳說口碑是當地人說當地的地名，當更為明確具體。其累代久居，對於當地自然環境的變遷、居住地區的伸縮、風俗習慣的差異，皆能耳聞目染，熟諳于心，其重要性有的不減于文字記載。只有文字記載和传说口碑互相取證，推本溯源，才能取得比較確實的結果。

粵語聽力水平測試標準評核之制定

陳雅莉, 白杰
美國國防語言學院

A handful of standardized Cantonese listening proficiency tests are available worldwide each with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This presentation presen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antonese listening t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Preliminary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Pre-CPT) and the Defen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DLPT) are norm-referenced standardized tests designed to measure proficiency in listening in Cantonese. Schools like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Tests - FLATS)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m) devise standardized placement tests for students preparing to advance their Chinese skills. Assessment for specific professional purposes are also available such as the Language and Literacy Assessment Rubric (LALAR) in California which is district-developed for Cantonese listening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proficiency and the New York State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NYSTCE) which assesses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antones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f teachers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This presentation also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s of the standard Language Skill Level Descriptions and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scale on which the Cantonese listening DLPT is based. The ILR scale is a set of descrip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proficiency to communicate in a language. It consists of descriptions of eleven levels (six “base levels”, from 0 to 5, and five “plus levels” in between every two level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is the standard grading scale for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Federal Services in the U.S. Through an authorized language examination, the DLPT, a skill level is assigned to a person. The Cantonese Listening DLPT is such an examination to evaluate a person’s language listening skill by the test performance. The assigned Cantonese listening proficiency level is a standard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rson’s language skill throughout the U.S.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ntonese Listening DLPT is discussed as an example of listening assessment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Aspectual Function of the Adverbial Modifier *ging6*(勁) in Colloquial Hong Kong Cantonese

Ken S.K. Che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ging6(勁) as an adverbial modifier in colloquial Hong Kong Cantonese usually denotes degree, i.e. “very” or “to a large extent”. Here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ging6* in this respect:

- (1) 我 勁 鍾意 呢 位 老師。
ngo5 ging6 zung1ji3 ni1 wai2 lou5si1
I very Like this CL teacher
“I like this teacher very much.”

In (1), *ging6* modifies the verb *zung1ji3*, and functions to denote the degree of liking. However, in certain cases, the denotation of *ging6* seems to extend from degree to aspect. Compare the following examples:

- (2) 我 琴晚 勁 講 電話。
ngo1 kam4maan5 ging6 gong2 din6waa2
I last night “very” talk telephone
“I had been talking on the phone for hours last night.”

- (3) 我 琴晚 講 電話。
ngo1 kam4maan5 gong2 din6waa2
I last night talk telephone
“I talked on the phone last night.”

In (2), *ging6* does not refer to talking on the phone, say, loudly (the dimension of degree). Rather, it indicates the case of talking on the phone continuously for a substantial period of time (progressive aspect). By contrast, when *ging6* is absent in (3), the aspectual meaning concerned is lost. This reveals clearly that *ging6* is the item bearing the aspectual function in (2).

Interestingly, in some cases, both the reading of degree and the reading of aspect are possible. For example:

- (4) 琴晚 勁 落雨。
kam4maan5 ging6 lok6jyu5
last night “very” rain
“It rained heavily last night.”/“It had been raining last night.”/“It had been raining heavily last nigh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spectual function of *ging6* by investigating its use in different types of aspectual situations including state, activity, accomplishment, semelfactive and achievement (Smith 1991). It is hoped that generalization can be made on conditions or factors that trigger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adverbial modifier *ging6*.

粵語「咋、啫」的焦點功能及其框式結構

鄭兆邦
香港中文大學

饒秉才等（1998：252）指出「咋」（zaa3）是語氣詞，「表示提醒或肯定、聲明。相當於普通話的『僅僅（只、才）……呢（啊）』：『得五個位咋（只有五個位子呢）』」。至於「啫」（ze1），梁仲森（2005：60）認為它的其中一個語法功能是「表示低限。句子中謂語前可能出現『只係』、『得』等共現成份」，並指出「啫」與「呀」（aa3）結合成為「咋」，如「啲細路講笑啫（那些小孩子說笑而已）」。從與「只、只係」共現這點看，「啫、咋」都具有限制焦點功能，就此，過去的論述已有所注意（如 Fung 2000、鄧思穎 2007 等）。

本文首先探討「啫」與「咋」的差異。語義上，「啫」表示「沒有過度」，「咋」則表「不足」（Kwok 1984：51）；Fung（2000：61）指出「啫」假設一低值，「咋」則假設一高值：「唔駛三百蚊咁多，一百蚊咋/*啫（不用三百塊那麼貴，一百塊而已）」。兩者在投放焦點同時發揮不同的語用功能。按梁仲森的思路，「咋」可理解成焦點詞和語氣詞「呀」的結合。我們認為，單獨的「啫」拉長，也可能與語氣成份結合，也是「焦點—語氣結合詞」。本文擬進一步論證之。

其次是「啫、咋」的句法位置。句法上，「啫、咋」的焦點都只能投放在謂語的成份之上，主語不能被焦點投射，如「*啲細路講笑啫，啲大人冇講笑（那些小孩子說笑而已，那些成年人沒有說笑）」。如果要使原來的的主語成為焦點，便要使它進入謂語之中，做法之一是在前面加上「得」（只有）：「得啲細路講笑啫，啲大人冇講笑」。可以看到，「啫、咋」的轄域在謂語，不包含主語。作為焦點詞，它的轄域包含了 T'，以往被視為 T 的成份（如助詞「嚟」，見 Tang 1998）都在焦點範圍內，如「個天落雨嚟啫」（天下雨來著而已）。本文將審視這一假設。「啫、咋」的焦點範圍只能在謂語，但又具備語氣功能（如聲明），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它在謂語層次投放焦點後，移往更高的層次表示語氣。

鄧思穎（2007 等）提出了粵語的動詞前置成份和後置成份組成了「框式結構」，即兩者具有語義的「冗餘」性和句法的局部性，與後置「咋」組成框式結構的成份是「齋」（鄧思穎 2007）。粵語中「齋」也有「只」的意思，「張三齋睇書咋（只是看書）」合法，「得張三齋睇書（只有張三只看書）」也成話，但是「??得張三齋睇書咋」卻顯得非常蹩扭，甚至不成話，這很可能與「咋」的焦點功能和句法有關。本文擬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探討「咋」在框式結構中的位置及與不同前置成份的關係。

鄧思穎. 2007. 粵語框式虛詞的局部性和多重性. 張洪年、張雙慶、陳雄根主編《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62–276.

梁仲森. 2005. 《當代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 1998. 《廣州話方言詞典（修訂版）》. 香港：商務印書館.

Fung, Roxana Suk-Yee.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Kwok, Helen.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ng, Sze-Wing. 1998.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四個競爭性音變：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聲調合併現象的啟示

馮淑儀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粵語聲調系統向以複雜稱著，它一共有九個調類：平上去入各分陰陽，陰入按元音長短再分為二。不過，作者根據對香港話和廣州話在不同年齡層所進行的一系列實驗研究和聲學分析，發現能夠維持這個系統的人口遠比預期中少。當代粵語聲調系統的共時差異相當大、情況相當複雜，顯示該系統現正進行重組。語言系統的共時差異往往跟歷時音變平行。本文試圖透過對共時差異的觀察，對粵語聲調系統的重組模式和演變方向所反映的歷時蘊涵作出初步探討。

就我們觀察所得，香港話與廣州話在聲調重組上基本方向相同但步伐有別。兩地粵語的共時差異主要涉及四個音變：陽上與陰去相混；陽上與陰上相混；陽去與陽平相混；以及陽去與陰去相混。

陽上合於陰去，在香港話中主要表現為字音的換讀或一字兩讀，但兩個調位的對立卻非常清晰。然而，陽上卻跟陰上在老中青三代的聽辨和發音上都呈合流現象。廣州話方面的情況則相反，陽上跟陰去在發音上仍然相混，而陽上與陰上只在青年人的發音中剛剛出現相混跡象。

至於陽去與陽平，在廣州話的老中兩代呈現近似合併（near-merger），即聽辨合流而發音對立。但在青年人中兩調完全對立，顯示這個音變已經停止。再者，陽去和陰去在老中青三代的聽辨和發音都呈合流現象。香港話方面的情況則相反，陽去與陽平在老中青三代都仍然處於近似合併狀態。而陽去跟陰去在聽辨上對立，只在發音上出現相混跡象。

我們根據聲學實驗結果推測粵語聲調的重組由陽上和陽去啟動，並進一步提出陽上合於陰去與陽上合於陰上是兩個競爭音變，在香港話中，前者已被後者所取代；陽平合於陽去與陽去合於陰去是兩個競爭音變，在廣州話中，前者已被後者所取代。我們沒法從調型調值角度很好地解釋這些演變方向；但是，從調類的古今演變角度看，陽上併陰去與陽去併陽平都見於東南方言，而陽上併陰上和陽去併陰去則是官話系統的重組模式。可見粵語的聲調系統一直因語言接觸而受着不同方言的不同合併模式的影響。這些不同的合併方向在相互競爭，此消彼長，因而形成現在共時平面上的複雜情況。按目前情況，廣港粵語的聲調系統正從東南方言格局走向官話格局，有趣的是香港的聲調重組趨勢向官話靠攏的程度比廣州還要深一些。本文將詳細論證香港廣州兩地的官話型合併都不是直接受普通話影響，而是透過客閩方言中的通語成分導致的。文內並會討論在音變過程中，語音感知和產出的不對稱與不同性質音變的關係，以及近似合併的發展方向等問題。

在粵語、桂南平話方言史中存在的兩種介音

濱田武志

東京大學 日本學術振興會

雖然被人視為粵語代表的廣州方言沒有介音，但粵語及桂南平話的以往某個階段曾擁有介音，很多方言仍保留其痕跡。分布在粵桂湘三省界域的一些方言有緊密的系統發生學關係(拙論(2012))，這些方言的共同特徵如下: 1. 見、群母在流攝開口三等、深攝開口三等和臻攝開口三等發生顎化; 2. 宕攝開口三等有-i-介音。它們的共同原始語言，只有*ə 帶有*-i-介音，並且*ə 只有帶有*-i-介音才能夠出現在音系裡面(流開三*iəu、深開三*iəm/p、臻開三*iən/t、宕開三*iəŋ/k、假開三*iə)。流攝開口三等、深攝開口三等和臻攝開口三等引起見、群母的顎化，宕攝開口三等和假攝開口三等卻沒有發生顎化。據此可見，這個差異起因於-i-介音的音值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前三者-i-介音的音值是[j]，而後兩者的-i-介音不引起顎化，也沒有前三者的-i-介音那麼偏前，音長也要長一些，音值應是[ɪ:]。[ɪ:əŋ/k、ɪ:ə]這樣的韻母正好符合廣西賀州八都話擁有的“先長閉元音”(麥耘(2008))。

存在兩種音值不同的介音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各種粵語及桂南平話同樣表示過去曾存在介音音值之別。雲、以母在很多桂南平話和粵語讀 h 聲母，但雲、以母並不是像匣母那樣一直讀 h，而是 j 聲母後來發生音變的結果(覃遠雄(2005))。觀察叫做“蔗園話”的一些有可能有系統發生學關係的方言來說，雲、以母讀 h 的韻母並不完全相同(梁偉華(2007)、覃世貞(2007))，這個事實意味著: 1. j>h 這個音變不是各地同時發生的; 2. 各個韻母從-i-[ɪ:]介音的音值變到[j](≡[j])的時期並不一致。

-u-介音也同樣存在這個現象。合口匣母字根據韻母的不同有的讀 h 聲母，有的讀 w 聲母，h 變為 w 也是後起的音變(覃遠雄(2005))。這個現象也表示合口介音也有兩種，即-u-[u]和-u-[ɔ:]。

這些介音是怎麼形成的呢？中古音三等韻也有兩種介音，但是粵語及桂南平話一般不分三四等，“先長閉元音”不是來源於中古音。另一方面，東南亞語言及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壯侗語族，擁有“先長閉元音”(韋慶穩 et al.(1980)等)。根據這個事實來判斷，擴展到華南的漢語受到壯侗語族語言的影響發生音變，形成“先長閉元音”。

參考文獻

濱田武志(2012) 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的梧州話の粵語に於ける系統論的位置付け，碩士論文，東京大學。(中文名: 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梧州話在粵語中的系統發生學地位)。／梁偉華(2007) 崇左新和蔗園話音系特點 《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4, 1: 101-104。／麥耘(2008) 廣西八步鵝塘“八都話”音系 《方言》 1: 18-33。／覃世貞(2007) 田東蔗園話語音系統 《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1: 1-7。／覃遠雄(2005) 桂南平話古曉、匣、云、以母字的讀音，《方言》 3: 209-218。／韋慶穩; 覃國生(1980) 《壯語簡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廣州話述賓式動詞的離合特點與漢語動後限制

何兩殷
北京大學中文系

除了主語位置，論元在句法表層還有三種實現位置：最常見的是在動詞後，如“送禮物、成交三億元、吃食堂”；第二種是在動詞前形成介賓結構，如“在郵局寄信、跟他結婚、給客人理髮”；最後一種僅限於一部分雙音節動詞，是“離合詞”內部的一個集合，語素結合並不緊密，其性質介於詞與片語之間，能夠在動詞語素之間插入體詞性成分，該體詞性成分多為對象論元，往往有相應的介賓結構形式。如“請老太太的安、造領導的謠、幫朋友的忙”，同時也有“向老太太請安、對領導造謠、為朋友幫忙”的相應介賓結構。

普通話的離合詞有著深厚的研究基礎，但粵語的離合詞前人關注得很少。相較而言，粵語雙音節動詞的離合情況要比普通話簡單，離析形式種類更少。在王海峰（2011）總結的13種離析形式中，“插入‘的’”、“A（位置在前的語素）重疊”這兩種離析形式在廣州話中比較缺乏。廣州話也沒有“插入動詞結構（或‘動詞結構+的’）”的形式，“插入‘名詞’（或‘名詞+的’）/代詞（或‘代詞+的’）”這一離析形式所受的限制嚴於普通話的離合詞。試以占離合詞大多數的述賓式動詞為例：

普通話	廣州話
a. 請老太太的安	a' . * 請老太嘅安
b. 丟了我的臉	b' . 丟咗我嘅賈* / 落晒我嘅面
c. 幫朋友的忙	c' . 幫朋友嘅忙 / 幫朋友嘅手

普通話述賓式離合詞AB若存在指向性²⁵，事件中涉及的對象論元傾向於能夠插入離合詞中，如a-c。廣州話不僅要求動詞語義中的事件具有指向性，而且要求只有B和對象論元之間存在領屬關係時才能夠有這種形式。“老太”與“安”、“領導”與“謠”不存在領屬關係，因此廣州話不能像普通話一樣形成“*請老太嘅安”、“*造領導嘅謠”的說法。此外，普通話的對象論元插入述賓式離合詞中時，往往需要帶“的”，而廣州話以不帶相應於“的”的“嘅”為常：“幫朋友手、落我面”。

²⁵“指向性”是指離合詞所表示的行為動作是由一方指向另一方，且此關係並不可逆

本文認為，普通話與廣州話在離合現象上的差異，原因之一在於漢語的“動後限制（postverbal constraint）”。所謂“動後限制”，“指的是‘在一個漢語句子裡，動詞之後最多只能接一個成分’。”²⁶張敏（2010）研究指出，“動後限制”所排斥的動詞後雙成分形成一個序列，對於動詞後兩個賓語或看起來像賓語的成分，南方話和“新中原”的北方話（河北、河南、山東、北京、東北等地）都不排斥；“舊中原”的北方話（大致以太行山為界，陝甘寧青的蘭銀官話和中原官話，山西陝西內蒙的晉語）裡要麼不可接受，要麼可接受但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離合詞本身帶有詞組的性質，具有不及物性，因此當對象論元出於話語表達的需要出現在句法結構中時，不能常規地進入補足語位置，只能前置於動詞或通過拷貝等一系列操作“出現在離合動詞內部”。然而，普通話這種看似“插入”動詞內部的方式，卻違反了北方話的“動後限制”。作為彌補，以加“的”的形式把對象論元“包裝”成偽定語滿足“動後限制”，同時“的”還能使結構合乎韻律上的需要。而廣州話本身就不排斥動詞後存在兩個賓語成分，因此對象論元如果插入離合動詞內部，並不需要“包裝策略”，因此以不帶“嘅”為常。

²⁶ 參看張敏（2010）《“動後限制”的區域推移及其實質》，中國語言的比較與類型學研究國際研討會，香港科技大學

关于粤方言异体字的整理问题

侯兴泉，吴南开

暨南大学中文系/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粤方言用字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大量的方言异体字。粤方言异体字的大量存在不仅给粤语学习和使用者带来较多的障碍，也给粤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及信息化处理带来很大的麻烦。本文在广泛收集粤方言字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跟粤方言异体字相关的几个问题：1.粤方言异体字的成因；2.粤方言异体字的整理原则；3.粤方言异体字的整理方法；4.粤方言异体字整理例释。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1.粤方言之所以会形成众多的异体字，其主要原因乃粤方言用字一直以来都缺乏规范。具体而言，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繁简混用而形成的异体字，如“𦉳” - “係”；（2）造字理据不同形成的异体字，如“𦉳” - “春”；（3）假借不同同音字而形成的异体字，如“𦉳” - “搵”。

2.粤方言异体字的整理应遵循以下原则：（1）通用性原则；（2）理据性原则；（3）形声性原则；（4）系统性原则；（5）去繁就简原则；（6）字库字优先原则。

3.粤语异体字整理的几条原则在实际运用中会碰到相互矛盾的情况，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作出权衡。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在整理粤方言异体字的过程中我们不赞成对这些原则进行分级加权。我们认为这些原则都很重要，它们的地位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主张对6项原则进行平等加权，如每项原则1分，分数最高者将被列粤方言异体字的推荐用字。

4.这部分我们将会以附表的形式列出我们的分析过程，并给出每一组粤方言异体字推荐用字。

粵語句末助詞 ge2 的語義功能及功能擴張現象

飯田真紀

北海道大學 傳媒研究院

粵語裡有很多用法特殊的句末助詞。其中一個較為常用的是[ge]帶短促、昇調的 ge2 (一般寫成“嘅”)。

關於 ge2 的語義功能分析，以往的研究裡存在著較多問題與看法上的分歧。甚至連它最基本的句末助詞種類界定問題上也因學者研究方法不同而有些出入。例如，Kwok1984 指出，上述的 ge2 表達“困惑”(puzzlement)，但對它的各種用法並沒有詳加分類。另一方面，梁仲森 1992 則把 ge2 分成三種用法，即“埋怨”，“辯白”，以及“問原因”，但梁文沒有提及這三種用法之間的聯繫。此外，Fung2000 也討論到 ge2，但主要集中在其疑問用法(即相當於梁文的“問原因”用法)。至於陳述用法，Fung 文把 ge2 和元音較長些的 gee2 混為一談，對 ge2 固有的陳述用法並沒有做詳細的討論。

有鑑於此，本文首先界定清楚 ge2 本身，接著討論它的語義功能，認為 ge2 的基本功能是用於表達說話者對事件 P 感到不合理。此功能以“P+ge2”的句式實現，如：咁耐 ge2？除此之外，ge2 還有第二種功能，用於表達說話者對他人的言行感到不合理，用命題 Q 來進行反駁。而此功能則以“Q+ge2”的句式實現，如：邊係喎！我都唔介意 ge2。

至於上述兩種功能之間的聯繫，本文認為第二種功能是從基本功能透過主觀化作用發展出來的。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an existential expression in news reporting

Kuong, Joaquim
University of Macau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n existential phrase *jau5jan4* 有人 being used in written news reports as a referential expression. Based on a small corpus of written reports on criminal offenses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in Macau and Hong Kong, it is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customary "someone" interpretation, *jau5jan4* 有人 is sometimes used as a third person singular referential pronoun, a practice adopted by editors to maintain neutrality and objectivity in reporting alleged offenses.

It is known that the Cantonese existential expression *jau5jan4* 有人 and its Mandarin counterpart, used in introducing new discourse participant(s) in narratives, are grammatically unmarked for number,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denote either singularity or duality depending on the discourse context. However, the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jau5jan4* 有人 in the criminal offense reports tends to be singular, as shown in (1):

(1) 昨日凌晨約二時，四十八歲黃姓女子駕駛 CM 三〇XXX 電單車

'Around 2:00 a.m. yesterday, a 48-year-old woman named Wong drove a motorcycle with the license no. CM30XXX.

行駛至東方拱門位置，前面的一架 ML 七一 XX 的士疑轉彎時急煞，

At the Oriental Arch area, a taxi, license no. ML71XX, at the front [of the motorcycle] was suspected to stop suddenly while making the turn.

有人收掣不及撞到的士尾部，女子連人帶車倒地，

Someone was too late to apply the brake and hit the back of the taxi.

The woman fell off the motorcycle and to the ground.

肇事電單車車頭損毀，有人報警求助。

The front of the motorcycle in the accident was damaged.

Someone called the police for help.'

At first sight, the first instance of *jau5jan4* 有人 in (1) introduces a new discourse participant that is neither the taxi driver nor the motorcycle driver. Nevertheless, to make sense of this report, the first existential expression in fact functions as a personal pronoun referring to the female motorcycle driver in the accident.

This study finds that *jau5jan4* 有人 in similar reports appears to assume the role of a disclaimer as found in legal writing. Although such a journalistic practice of subtle attribution of alleged authorship to a defendant (or a suspect) in an accident or a criminal offense is at present only limited in usage, it shows that editorial policies and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may be powerful enough to supersede the inherent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a linguistic form or to introduce new meanings to existing forms, at the expense of discourse coheren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ous potential factors in language change.

粵語方言小稱變音的類型

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在粵語中，小稱 (diminutive) 普遍用後綴 (如「仔、兒、子」) 和變音的形式表現出來。前人對廣州/香港粵語的小稱變音已有非常精彩和深入的研究 (Whitaker 1955-6; 張日昇 1968; Kam 1977; 高華年 1980; Matthews & Yip 1994; Tsou 1994; 李新魁等 1995; 麥耘 1995; Bauer & Benedict 1997; 張洪年 2001; 陳忠敏 2001 等)。本文在他們的基礎上，把鏡頭擴大到其他粵語方言，試圖 (a) 劃分各種小稱變音的音韻類型、(b) 說明其地理分布、以及 (c) 通過釐清變音跟小稱後綴的關係，指出不同類型變音的歷史來源。

區分粵語的小稱變音有兩個參項，分別是 (a) 「聲調的高低」和 (b) 「跟小稱後綴的關係」。前一項可以分為兩個大類，即 [-低] 和 [+低]。[-低] 一類可進一步劃分為：(i) 高升/中升：如廣州 (廣府片) 「魚 jy²¹⁻³⁵」、新會荷塘 (四邑片) 「磚頭 ts^u ɔ²⁴ tɔy²¹⁻³⁵」、封開開建 (勾漏片) 「單眼 tan⁵⁵⁻³³ ŋan²⁴²⁻³⁵」；(ii) 高平：如寶安沙井 (廣府片) 「桃 t^hou²¹⁻⁵⁵」、廉江 (高陽片) 「男子仔 nam²¹ tsi³⁵⁻⁵⁵ tsei³⁵」、北海 (欽廉片) 「出膿 ts^het⁵ nuŋ²¹⁻⁵⁵」；(iii) 高降：如化州長岐 (吳化片) 「天鵝 t^hin⁵³ ŋɔ²⁴⁻⁵³」、賀州桂嶺 (勾漏片) 「賊兒 θak²¹⁴ ŋi¹³²⁻⁵²」。其中高平變音和高降變音在地理上呈互補分布。[+低] 一類在四邑片中非常普遍，但似乎不見於其他方言片，例子有台山台城的「衫 sam³³⁻¹¹」、開平赤坎的「鰂魚 tak⁵ ŋui²²⁻¹¹」。小稱變音和小稱後綴則有三種關係：(i) 變音出現在小稱後綴「兒」中，如化州良光 (吳化片) ŋɔ²³⁻⁵³、玉林 (勾漏片) ŋi³²⁻⁵⁵；(ii) 變音伴隨著鼻音韻尾依附在詞根中，如信宜 (高陽片) 「車兒 t^hɛ⁵³ > t^hɛ⁷ en」，「屋兒 ʔuk⁵⁵ > ʔuŋ⁷」、化州良光「腳兒 kiek³ > kieŋ³⁵ ŋ³⁵⁻⁵³」；(iii) 變音獨立出現，和小稱後綴無關，如廣州「糖 t^hɔŋ^{h21-35}」、台山台城「房 fɔŋ²²⁻¹¹」、玉林「路 lu¹¹⁻³⁴」。這三種關係可以理解為小稱變音發展的三個階段，即 (i) > (ii) > (iii) (參看張敏、周烈婷 1993; 麥耘 1995)。

本文發現：粵語方言的兒綴只有高平和高降兩種唸法。高平變音和高降變音很可能是由兒綴變音類推而成的。雖然現在用高平變音的粵語方言有些已不用兒綴 (如廣州粵語)，但有理由相信兒綴以前在粵語區分布的範圍比現在的要廣 (麥耘 1995:276)。至於高升變音，可以視為用伴隨性音高來補償兒綴脫落的結果。這也解釋了高升變音為何常常出現在本調為 [+低] 的詞中：詞根聲調低，兒綴聲調高，兩者音高差距大，容易形成高升變音。上段「關係 (ii)」化州良光的例子便很能說明這一點。每種方言變音出現的環境容有不同。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採用了不同的規律去補償兒綴的丟失。至於四邑片低調變音，和其他粵語方言的變音格外不同。其本質到底是什麼？還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香港粵語雙音節後附狀貌詞的音韻特色

黎奕葆

香港教育學院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狀貌詞」(ideophone)是一種生動地以語音直接表義的詞類(a vivid representation of an idea in sound) (Doke 1935: 118)。在香港粵語中，狀貌詞的例子有後附「花」的「luk1luk1」、前附「陷」的「tap1tap1」、後附「黑」的「gu2lak6gwak6」等，先行研究一般視為詞綴(陳慧英 1979; 高華年 1980: 64-69; 1994; 植符蘭 1994; 鄧少君 1994; 李新魁等 1995: 443-452)。本文以香港粵語雙音節後附狀貌詞(即如「花 luk1luk1」)為研究對象，收集了 137 項詞條，從(1)兩個音節間的關係、(2)聲調和聲母使用上的傾向，以及(3)語音象徵性共三方面作出分析。

香港粵語狀貌詞的兩個音節間存在聯繫：80%以上為完全重疊；少數為雙聲兼同調(變韻)、疊韻兼同調(變聲)或音素全同而不同調(變調)；絕少數例外者亦在聲韻調其中一方面相同。所有變韻式，部分變聲式、變調式以至例外式狀貌詞，都存在等義的重疊式，相信各式都是由重疊式演變過來，是重疊式的變體。我們發現於此演變中存在一定規律，例如由重疊式演變成變韻式，若韻母改變發生於前一個音節，就必然是變成 *i*。透過掌握這些演變的規律，並輔以來自其他漢語方言和古漢語的資料為佐證，可以推想出一些以前存在但現在已經被變體取代而不復通用的重疊式狀貌詞。

在聲調使用上，統計顯示香港粵語狀貌詞明顯傾向使用高平調和低降調。高平調帶高音頻可聯繫到親密以至輕蔑的暗示(Ohala 1983; 1984; 1994; 朱曉農 2004)，與狀貌詞常用於非正式場合的特性相配，故此最為常見。至於低降調的大量使用，則因為聲調由詞根過渡到狀貌詞傾向不作大幅起伏，故低降調狀貌詞常見於低降調、低上調和低平調詞根後。在聲母使用上，統計顯示香港粵語狀貌詞大多選擇不送氣輔音。在 *b* 與 *p*、*d* 與 *t*、*g* 與 *k*、*z* 與 *c* 之間，前者於狀貌詞聲母佔絕對優勢。在香港或廣州粵語中，一般音節基本上不以不送氣聲母配搭低降調(李新魁等 1995: 44)，但狀貌詞音節卻不乏這類例子，如「黃 gam4gam4」、「臉 zi4zi4」，由此可見狀貌詞對低降調和不送氣聲母的偏好強烈，其音韻規律並不同於一般字詞的音節。

香港粵語狀貌詞亦表現出語音象徵性。我們發現在意義上與小有聯繫的詞根多附上高平調狀貌詞，與大有聯繫的詞根則多附上低降調狀貌詞，可見狀貌詞以高音頻暗示體積小，以低音頻暗示體積大。這被認為是一個跨語言的音義聯繫(Ohala 1983; 1984; 1994)。此外，我們發現附於相同詞根的不同狀貌詞中，表褒義者往往用高平調與高至半高韻腹元音，表貶義者則往往用低降調與低至半低韻腹元音，可見狀貌詞以高音頻聯繫褒義，以低音頻聯繫貶義。

The semantics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i4* in Cantonese

Yin-yee Lai, Peppina Po-lu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mantic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FP) *lei4* ‘come’. When used in simplex sentences,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lei4* conveys four kinds of temporal and aspectual information, namely perfectivity (Yiu 2001), discontinuity (Yiu 2001), anteriority (Lee and Yiu 1999, Tang 1999), and recency (Tang 1999, Lee and Yiu 1999, Yiu 2001, Leung 2005, Cheung 1972/2007). Along these lines, *lei4* is analyzed as i) a recent past tense marker (Tang 1999); ii) a perfective marker (Yiu 2001), iii) an anteriority marker (Lee and Yiu 1999), or iv) a present perfect marker, on a par with Mandarin SFP *laizhe* (c.f. Chen 2005, 2006).

In this paper, we will argue that none of the above analyses can adequately account for the semantics of *lei4*, and sentences below reveal their limitations.

(1) *Hoeng1gong1 soeng6-go3-lai5baai3 lok6jyu5 lei4, (?gam1-go3-lai5baai3 dou1 jau5 lok6.)*

‘It rained last week in Hong Kong and it also rained this week.’

(2) *Keoi5 se2-?(-gwo/-zo/- jyun) saam1-pin1 man4 lei4.*

‘S/he has written three essays.’

(3) *Keoi5 kam4maan5 faan6-hau6, daa2-gwo3 din6waa6 bei2 nei5 lei4.*

‘Last night after the dinner, s/he phoned you.’

(4) *Zik6zi3-kam4jat6/*muk6cin4-wai4zi2 keoi5 jam2(-zo2) saam1 bui1 gaa3fe1 lei4.*

‘Until yesterday/*now, s/he has drunk three cups of coffee.’

- As a past tense marker, *lei4* would simply require the event to occur prior to the speech time. However, sentence (1) shows that if *lei4* is used in the first clause with ‘last week’, one cannot continue the sentence by assuming that another event of the same token occurred after “last week”. This would be failed to be accounted for if *lei4* is merely a past tense marker.
- If *lei4* is a perfective marker, its occurrence alone would be able to present the situation in its entirety. However, sentence (2) shows that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a perfective marker or a RVC, the relevant sentence fails to mark the completion/termination of the situation.
- If *lei4* is an anteriority marker, the event time has to be prior to the reference time. However, sentence (3) shows that this is in fact not necessary. While both events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 event associated with *lei4* does not precede the reference time, i.e. the dinner, presenting a temporal order of [RT < ET < ST].
- Claiming that *lei4* is a present perfect marker would mean a temporal order of [ET < RT,ST] (c.f. Reichenbach 1947), i.e. the reference time is simultaneous with the speech time. However, sentence (4) shows that *lei4* requires the reference time to be totally preceding ST.

Based on the above, we instead propose that the basic semantics of *lei4* is a temporal modifier which marks ‘recency’ in simplex sentences, formally termed as “recency marker” in our analysis. As a recency marker, *lei4* requires that (1)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the event time (ET) and the reference time (RT)/the speech time (ST) has to be relatively short,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objective judgment of the speaker, and (2) in terms of event occurrence, a second occurrence of the same event (defined as events of the same token) is not allowe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ET and ST/RT specified. Our analysis is supported in the following way.

- Sentence (2) shows that since *lei4* is to measure the temporal distance and such measurement starts from the boundary of an entity, the entirety of the eventuality including the final endpoint (cf. Smith 1997) is therefore needed.
- Sentence (4) further supports that *lei4* is a distance marker and thus a distance between ET and ST must be involved.
- Sentence (1) shows that the second occurrence of the event by the speech time is prohibited.
- Sentence (3) can be accounted for in this way: since *lei4* simply measures the distance between ET and RT or ET and ST, it can naturally measure the distance between ET and ST in the case of (3).

References

- Chen, Qian-Rui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rticle *laizhe* and subjectivization. *Zhongguo Yuwen*. 4: 308 – 319.
- Chen, Qian-Rui (2006). Complementary discussion on Chinese particle ‘Laiz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 pp. 22 – 27.
- Cheung, Samuel Hung-Nin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Klein, Wolfgang (1994). *Time in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Lee, Thomas Hun-Tak and Yiu, Carine (1999). Temporal marking, verbal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the Cantonese particles *lei4* and *ge3*.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Research Forum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December 11-12, 1999,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ang, Sze-Wing (1999).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Reichenbach, Hans (1947). The tenses of verbs, In H. Reichenbach,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 1947,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Smith, Carlota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Yiu, Carine Yuk-Man (2001). *Cantonese final particles ‘LEI’, ‘ZYU’ and ‘LAA’: an aspectual study*.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从老中青的差异看广州方言词类的演变情况

林茵茵

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的《中文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41) 为基础, 考察十九世纪的词汇演变情况, 从而探讨广州方言的演变规律与特点。

本文从一般词汇与常用基本词汇的角度出发, 以老中青为调查对象, 调查了分属三个年代于香港土生土长的男性, 尝试利用历史文献以及语言使用者的具体情况作一个纵向的比较, 以揭示几十年来广州方言词汇的演变情况与特点。文中所使用的《中文读本》保留了丰富而大量清代(1841年)的广州话方言词汇资料, 有助于了解广州话词汇演变的全貌。考察范围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代词五类, 合共 4477 个词。

调查结果显示:

- 一、现代广州话常用基本词汇的变动小, 一般词汇的变化大。
- 二、各类词汇以名词的变化最快、最大, 代词的变化最慢、最小。
- 三、老中青之间的词汇使用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但即使是变化最大的名词, 老青之间的差距也少于 25%。

而广州方言词汇发生变化原因, 主要由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变、词汇系统的竞争发展以及语言接触引起。

本文主要有以下的创新点:

- 一、运用词汇层次的理论, 把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区别开来, 分别探讨其不同的演变情况, 为广州方言词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结论。
- 二、根据《中文读本》对老中青三派语言使用者的调查, 考察了广州方言几个主要词类的常用词的变化情况, 初步确定了变化程度较大的词类和词目, 以及变化速度较快的年代。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by Deaf Children in Hong Kong

Scholastica Wai-sze LA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oral form and written form of Chinese used by Hong Kong people basically follow two different grammar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hen 1999). Hong Kong children face a challenging task when they learn Chinese because they need to handle two different grammars in two different forms. The task for deaf children is even more difficult because their Cantonese is still developing when they start to attend schools. Therefore, it would be most intriguing to examine their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and Mandarin grammar together.

Relative clauses could be a window through which we explore such development.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by typically-developing children has been studied for decades (Hamburger & Crain 1982, Sheldon 1974, Tavakolian 1981, among others). Studies on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including Cantonese and Mandarin relative clauses, are relatively limited and focus is largely on the order of difficul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ve clauses (Hsu et al 2009, Ning and Liu 2009 on Mandarin, Lau 2006, Chan et al 2007 on Cantonese). Research on deaf children generally report that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relative clauses in oral form (Friedmann & Szterman 2006) and in written form (Berent 2009, Lillo-Martin 1998).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order of difficul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ve clauses.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re is subject-object asymmetry in 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in both oral form and written form by the same group of deaf children.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is question. Study 1 was an elicited production task on Cantonese modified from Zukowski's (2001) experiment. Study 2 was a written test adopting similar methodology used in Study 1. In both studies, subject-gapped and object-gapped relative clauses were elicited via subject which questions and object which questions. A total of 23 deaf children having 5 to 10 years of Cantonese exposure were tested.

In Study 1, 16 out of 23 children produced 222 intelligible relative clauses. 144/222 (64.86%) are grammatical relative clauses and 78/222 (35.14%) are ungrammatical relative clauses. No subject or object advantage is observed with the deaf children group ($t(15)=0.000$, $p = 1.0$). But the hearing children reference group shows significantly better performance with subject relatives ($t(48)=6.589$, $p = .000$). Some common errors observed from both hearing and deaf children are (i) wrong head error (i.e. *maa5lau4 tek3 dou2 ge3 hung4zai2* 'the bear that the monkey kick' instead of *tek3hung4zai2 go2 zek3 maa5lau4* 'the monkey that the bear kick.'), (ii)

resumptive NP error (e.g. *hung4 naau6 zyul go2 jat1 zek3 zyul* ‘the pig that the bear scolded’) and (iii) absence of syntactic movement of the head noun (e.g. *zyulzai2 pou5 zyul6 maau1maau1 go2 go3* ‘the cat that the pig held’). But these errors constitute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all errors produced. 77.94% of the erroneous responses are the use of simple declaratives.

In Study 2, only 7 students produced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in written form and these 7 students also produced grammatical Cantonese relative clauses in Study 1. 94.87% of these relative clauses are grammatical. Similar to the results observed in Study 1, the accuracies of subject-gapped versus object-gapped relative clauses, when produced, are close. The non-target answers may be in the form of determiner phrase (e.g. 一隻小馬), verb phrase (e.g. 背小丑 instead of 背小丑的男孩) or simple declaratives ([一個妹妹在推姐姐] 不開心 instead of [妹妹推的姐姐] 不開心). The use of simple declaratives is also the biggest error.

Taken together, deaf children generally have difficulties in producing the relative clauses in both oral form and written form. Though limited by hearing loss, more deaf children produced relative clauses in oral form than in written form. Nonetheless, the high frequency of simple declaratives suggests the lack of syntactic movement for relative clauses in deaf children’s grammar.

***Ge3*-inser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 view from *de*-insertion in Mandarin**

Thomas Hun-tak Lee and Margaret Ka-yan Lei
Language Acquisition Laborator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ge3*-inser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in light of recent analyses of Mandarin nominal structure. Previous studies of *ge3*-inser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Luke and Lancarrow 1993, C. Tsang 1995, W. Tsang 1997, Wong 1999, Lee 2002, 2006, 2007) saw the phenomenon as a syntactic change involving violation of the constraint on nominalizer insertion in a sortal-classifier context (e.g. *saam1 bun2 (*ge3) syu1* "three books"), as opposed to the optionality of *ge3* in a non-sortal one (e.g. *saam1 wun2 (ge3) tong1* "three bowls of soup") (Cheung 2007), resulting in an erosion of the putative count/mass distinction in Cantonese (Lee 2007).

Based on naturalistic speech in Hong Kong Cantonese us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recordings, *ge3*-insertion was found to occur at a rate of 1.1% in the 1980s and 1.8% in the 1990s respectively of noun phrases with pre-modification in a sortal-classifier context (W. Tsang 1997); whereas *ge3*-insertion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1% of occurrence when all instances of noun phrases were considered (Wong 1999). While these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urnished quantitative data documenting the change, the data do not show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percentage of *ge3*-insertion in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ir occurrence (Wong 1999) or how the figures were calculated (W. Tsang 1997). Using 30 hours of interview data produced by adult Cantonese speakers in the 1990s, Lee (2007) identified three types of linguistic contexts that are conducive to *ge3*-insertion: (a) when the noun is preceded by a non-sortal classifier; (b) when the noun phrase is quasi-referential in nature; and (c) when there is stacking of determiner or modifier phrases in prenominal position. In adopting a uniform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antonese nominal for both sortal and non-sortal classifiers based on Cheng and Sybesma (1999)'s account for Mandarin nominals, Lee's analysis fails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s in permissibility of *ge3*-inser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lassifiers.

Recently, a number of studies on Mandarin nominal structure (Tang 1990, 2005, Hsieh 2008, Her and Hsieh 2010, X. Li 2011, Her 2012, X. Li and Rothstein 2012, A. Li 2013, Zhang 2011, 2013)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nominalizer *de* in Mandarin can also be inserted after a

sortal classifier when the nominal receives a quantity-denoting interpretation or when the quantity is being emphasized, a phenomenon which Li and Rothstein (2012) analyzed in terms of a left-branching structure with the [Num-CL] forming a constituent with the quantity information in focus. The fact that a nominal's interpretation might affect the permissibility of *de*-insertion in Mandarin calls for the need to examine the semantic contexts under which *ge3*-insertion occur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especially since previous studies did not provide details of contexts relevant to the quantity reading.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naturalistic data from Hong Kong Cantonese using 4 hours of radio broadcasts from the 2010s as well as a mini-corpus on spontaneous occurrence of *ge3*-insertion structures we have collected, examining the semantic contexts under which *ge3*-insertion occur and adopting a consistent methodology for estimating the frequency of *ge3*-insertion in spoken Cantonese today.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addressed: (i) Does the quantity-reading environment facilitate *ge3*-insertion in Cantonese on a par with *de*-insertion in Mandarin? (ii) To what extent can the quantity-reading environment cover the *ge3*-insertion violations in Cantonese? If not, what are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that distinguish Cantonese from Mandarin with respect to the permissibility of nominalizer insertion? (iii)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proposals on Mandarin nominal structur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ntonese nominals, in particular the left-branching account on Mandarin nominals with *de* under the quantity-reading?

Our preliminary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Cantonese resembles Mandarin in permitting *ge3*-insertion to occur in the quantity-reading environment with a sortal classifier, Cantonese shows a higher tolerance of *ge3*-insertion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including referential as well as the predicative environments. For instance, while *ge3*-insertion can occur in the presence of a demonstrative in Cantonese, the corresponding *de*-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is not possible as the presence of a demonstrative would make an individual rather than a quantity-reading to be more prominent (Zhang 2011, 2013).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missibility of nominalizer insertion betwee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that the two languages bear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nominal structures (Sio 2006).

粵語「畀」字被動句的結構特點試探

羅奇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粵語的「畀」可以表被動標記 (passive marker) 用法，與普通話的被動標記「給」大致相當。不過，「畀」後必須出現施事者 (例 1)，否則，便不合法 (例 2)，而「給」的施事者則可以省略不現 (例 3)，顯然兩者的結構特點有所不同。例如：

- (1) 本書畀佢偷咗
- (2) *本書畀偷咗
- (3) 那本書給 (他) 偷了

「給」和「畀」本來皆為「給予」義動詞，所以「給」和「畀」皆表被動標記用法，可謂同出一源。然則，為什麼「給」字被動句的施事者可以省略不現，而粵語「畀」字被動句的施事者卻必須出現？

另一方面，例 (1) 施事者「佢」出現在被動標記「畀」之後，受事者「本書」則出現在「畀」前面主語的位置，這與例 (3) 普通話「給」字被動句的結構無異。不過，粵語的「畀」字被動句，其受事者還可以出現在動詞之後 (例 4a、5a)，這是普通話「給」字被動句所不容許的 (例 4b、5b)。例如：

- (4) a. 今日畀你激死我啦
b. *今天給你氣死我了 (要說：今天我給你氣死了)
- (5) a. 畀你錫咗我一啖添
b. *給你親了我一下 (要說：我給你親了一下)

這種「畀+施事+動詞+受事」結構並不是近年才出現的，早於 1989 年，香港無線電視台的電視劇《他來自江湖》中司徒佩芝 (由梅小惠飾演) 與何鑫淼 (由周星馳飾演，即例 6 中的「水哥」) 的對話，就已用到此結構：

- (6) 司徒佩芝：咪係你呀，水哥！差啲畀你嚇死我呀！
何鑫淼：我嚇死你？
司徒佩芝：你差啲嚇死我呀！
[……]
何鑫淼：識著你都係代表作喇

這種「被動標記+施事+動詞+受事」結構，近代漢語也曾出現過。例如，馮春田 (2000：590) 就引用過以下的例子：

(7) 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朱子語類》)

(8) 不被人心勝了道心。(《朱子語類》)

然則，「畀+施事+動詞+受事」結構的被動句是如何產生的？與近代漢語的「被動標記+施事+動詞+受事」結構是否同出一源？其用法與「受事+畀+施事+動詞」結構的被動句又有何分別？這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本文會結合歷史及當代語料對以上幾個問題試加探討，以就教於專家學者。

參考書目

馮春田(2000)：《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呂叔湘主編(199)：《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洪年(2007(1972))：《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中山話兩百年來的語音發展

羅言發
澳門大學 中文系

本文用 6 種材料來印證中山話二百年來的語音變化，使用的材料有：1840 年的《伊索寓言》，1856 年的《英華分韻撮要》前言，1888 年的《英語不求人》，1897 年的《香山或澳門方言》，1948(1939)年的《中山方言》和 1987 年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發現兩百年來的中山話的變化如下：

	1840 /1856	1888	1897	1939	1987
瓜		k	→	k	
光					
關		kw	→	kw	
寫				ia	→ ε
來			ui	→	ɔi
罪				ui	
水				øi	
真		en	→	en	
津					
春		un	→	øn	
生					
請			eŋ	→	eŋ
正					
			iŋ	→	iŋ

其中：除了 i-介音消失外，一直保持不變的特色音類是 ŋ-（二）、k^h-（犬）、h-（父）、i（幾）、u（做）、y（居）、om（甘）。發生無條件分化的是 k→kw（光）、oi 三分→ɔi（來）/ui（罪）/øi（水）、en→un（津）、eŋ→iŋ（正）。經研究，無條件分化均是向廣州話靠攏的結果，這些變化均發生在 1897 年到 1939 年間。

Metaphorical Extensions of the Localizer “-*cyu3* (處)” as Reflect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ntonese Narrative Data

Shin KATAOKA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y using newly found early Cantonese narrative dat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taphorical extensions of the localizer *-cyu3*. We have decided to use narrative stories in hope that we can examine our data in natural contexts. In Mandarin Chinese, localizers such as *-li*, *-shang* are attached to make a noun locative, e.g. *fangjian-li* (in the room), *shan-shang* (on the mountain), etc. These localizers are suffixes as they cannot be used on their own. In contemporary Cantonese, *-dou6* is used to serve a similar function, as in *fong2-dou6* (in the room). However, in written Cantonese materials produc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erm used to serve a similar function is not *-dou6*, but *-cyu3*. *Cyu3*, or its phonetically simplified form *syu3*, is a bound morpheme denoting ‘place’ (equivalent to *chù* in Mandarin). To put it simple, locative nouns in Cantonese consist of a noun followed by ‘place’ in Cantonese.

When *-cyu3* is used with the existential verb *hai2* in early Cantonese, it becomes an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meaning *to be present, to be here/there*, etc. The metaphorical shift from space to aspect can be observed when it is used as a pre-verbal adverb, or post-verbal complement, signaling progressive and durative aspects respectively. Kataoka (2010) claims that *-cyu3*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ntonese progressive marker *gan2* in its early stage.

One of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cyu3* in the narrative data was that there are tokens where *-cyu3* appear at the sentence final position, following a verb phrase or an adjectival phrase. It is of our interest in two points: firstly the contemporary counterpart *-dou6* does not share this function; and secondly this grammatical phenomenon could be compared with other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Min or Wu, in which localizers are used to serve non-spatial meanings (Liu 1996, Shi 1996). By combing through early Cantonese data, we claim that in early Cantonese, the sentence-final *-cyu3* had metaphorically evolved to denote current state such as degree or size while preserving the locative construction.

第一本粵語羅馬字聖經（1867）所採用的拼音方案：Lepsius 方案

片岡新
香港教育學院

李燕萍
香港城市大學

19 世紀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傳教，首要任務是將聖經翻譯成中文。在 1810 - 1860 期間已有 10 個中文文理譯本，由於這些譯本未能通用，各地方言聖經譯本因應需求相繼出版。在廣州、香港、澳門的傳教士先後把聖經翻譯成粵語字及羅馬字。1862 年 Charles Finney Preston 首先用方言字來翻譯《馬太福音》及《約翰福音》，1867 年 Wilhelm Louis 用 Lepsius 拼音方案來翻譯《路加福音》。

我們看到在粵語拼音發展史中，Williams（1842）、Chalmers（1859）等傳教士為粵語教科書及工具書上所制定出來的拼音方案都被用家肯定。為甚麼羅馬字聖經不採用這些方案呢？

鄒嘉彥、遊汝傑（2001）指出 Lepsius 是 19 世紀的權威，中國很多方言羅馬字聖經的拼音方案也是在 Lepsius 方案的基礎上制定的。第一本粵語羅馬字聖經（1867）採用 Lepsius 方案是否說明了它真的比當時其他方案優勝？

我們發現該方案在往後的粵語羅馬拼音版聖經沒有再出現過。如果這個方案這麼好，為甚麼它只出現一次呢？其實，從 1892 年開始粵語羅馬拼音版聖經採用「Standard Romanization（標準羅馬方案）」。為甚麼 Lepsius 方案在兩年後即被另一個方案取而代之呢？

為了探討以上這些問題，我們將會分五部分進行研究：1）追查第一本粵語羅馬字聖經採用 Lepsius 方案的原因、2）了解該方案的特徵、3）拿幾個早期粵拼方案與 Lepsius 方案作比較分析、4）深入探討該方案曇花一現的原因。

Classification of Yue and Pinghua: A Lexicostatistical Approach

Szeto Pui Y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ince being recognized as a major dialect group by the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1987), Pinghua has attract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attention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e and Pinghua remains controversial nowadays, and most Chinese Dialectology textbooks (e.g. Li & Xiang 2009) only consider Pinghua a subgroup of Yue.

This study aim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of Yue and Pinghua by mean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Unlike most previous works on 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lexical comparison instead of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which may reflect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more accurately (Deng & Wang 2009). Based on the data in the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Cao 2008), this study identified 180 lexical items appropriate for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nd carried out lexico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the MEGA 5 software package (Tamura et al. 2011).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outhern Pinghua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me Yue dialects in Guangxi, while Northern Pinghua is neither closely related to Southern Pinghua nor the various Yue dialect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view that Southern Pinghua and Northern Pinghua should be treated separately – the former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subgroup of Yue, while the latter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separate group.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Northern Pinghua may have shifted away from the Yue group because of its contact with Xiang and Southwest Mandari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an complement the phonology-based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schemes.

References:

- Cao, Z.-Y. (Ed.). (2008).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1987).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Far East).
Deng, X.-H., & Wang, W. S.-Y. (2009). *Zhongguo de Yuyan ji Fangyan de Fenlei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Li, X.-F., & Xiang, M.-B. (2009). *Hanyu Fangyanxue Jichu Jiaocheng [A Foundation Course on Chinese Dialect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amura, K., Peterson, D., Peterson, N., Stecher, G., Nei, M., & Kumar, S. (2011). MEGA 5: 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 Evolutionary Distance, and Maximum Parsimony Methods.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8, pp. 2731-39.

粵語語氣詞「啱」的嵌套地位

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啱」[k^wa³³] 是粵語的語氣詞，例如(1)。很多粵語語法專書曾有專門的分析，一般認為「啱」表示揣測(張洪年 2007, 梁仲森 2005 等)。在這篇文章裏，我們考察「啱」的語法特點，肯定了「啱」的揣測作用與知域的關係，並從共時和歷時的角度，論證「啱」應該位處嵌套句。

「啱」表示了說話人的揣測，不是別人的揣測。(1)的意思基本上跟(2)的一樣，而「啱」跟句首「我估」(我猜)的作用好像差不多，都表示說話人的猜想，跟「知域」有關(沈家煊 2003、肖治野、沈家煊 2009)。我們假設有「啱」的句子包含表示知域的抽象動詞「猜」，傳達猜測、猜想的意思，而抽象動詞的主語指向說話人「我」。我們根據移位測試和框式結構的虛詞分布，論證「啱」應該在嵌套句之內，而並非位處根句的層面，例句(2)應該有(3)這樣的句法結構：表示知域的成分位於根句，選擇一個包含語氣詞的嵌套小句。「我猜」位於根句層次，屬於知域的範疇。如果讀出來，在粵語可以說成「我估」、「我諗」(我想)等；如果維持抽象的形式，「我猜」就不會說出來。小句是猜想的内容，以嵌套句形式出現，「啱」位於嵌套句內。根據(3)這樣的結構，語氣詞並非處於句子最高的層次，語氣詞之上還可以有更高的層次，表示較為抽象的知域。「啱」不可以進入嵌套句，要考慮特定的句法結構(如(3))。本文認為語氣詞並非一定呈現根句現象，也有進入嵌套句的可能性。

從歷時的角度來考慮，「啱」和「估」的密切關係也並非無中生有。「啱」應該來自粵語動詞「估」(Chao 1947)。由「估」變為「啱」，聲母不變，只是元音改變了。由「估」變為「啱」的過程說明了「啱」來自動詞，表示說話人的主觀認識，跟知域有密切的關係。有「啱」的句子隱含了「我猜」這個抽象成分，而抽象動詞「猜」往往體現為粵語動詞「估」。「啱」的演變路徑可以給我們一個饒有意義的啟示，那就是我們推測有些語氣詞來源自指向說話人的動詞(如知域)，經過拷貝而後置，處於句末，繼而虛化成為語氣詞。由於這種語氣詞跟句首的動詞有歷時的關係，語氣詞大致上都能承繼原來動詞的意義和功能，表面上形成互相呼應的格局，就好像「啱」和「我估」的關係。

我們通過粵語語氣詞「啱」的討論，探索語氣詞的句法位置，並企盼由「啱」推行出來的假設可以套用到別的語氣詞甚至是其他方言語氣詞的研究，對漢語語氣詞的形成和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 (1) 聽日好天啱。明天天氣好吧。
- (2) 我估聽日好天啱。我猜明天天氣好吧。
- (3) 我 猜〔小句 啱〕

吴川（梅菪）话与苍梧（大坡）话的元音韵尾消失现象比较

翁砺锋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

吴川市位于粤西南，是湛江管辖的县级市，梅菪街道是吴川市市治所在地，该地方言属于粤语高阳片；苍梧县位于广西东部，是梧州下辖县，大坡镇是该县南部靠近粤桂边界的乡镇，该地方言属于粤语勾漏片。相对于广州话或中古音而言，**两地方言均存在元音韵尾消失的现象，其中吴川（梅菪）话消失的是 i 韵尾**，苍梧（大坡）话则 i、u 韵尾均有消失的现象。如广州话的 ai、ɔi、ui、øy（来自止蟹二摄的字）韵母在梅菪话中分别作 a、ɔ、u、u；而苍梧（大坡）话真正有元音韵尾的韵母只剩下了 au 和 iu，广州话其余带元音韵尾的韵母该方言全不带元音韵尾。举例如下（为求简便，暂不标调值）：

吴川（梅菪）话与广州话的比较

	街	台	杯	吹	岁
吴川	ka	tʰɔ	bu	tʰu	tu
广州	kai	tʰɔi	pui	tʰøy	ʃøy

苍梧（大坡）话与广州话的比较

	该	街	艺	鸡	归	岁	吹	杯	高	狗	交	小
苍梧	kua	ka	ŋɛ	kɛ	kuɛ	tʰ	tʰø	bu	ko	kɔ ^u	kau	tiu
广州	kɔi	kai	ŋei	kei	kuei	ʃøy	tʰøy	pui	kou	keu	kau	ʃiu

注：流摄字有时还有微弱的 u 韵尾出现，不稳定，音位归纳可以将流摄字归为 ɔ 韵母。

一般说来，元音韵尾消失，双元音转为单元音较常见于吴语与湘语，比如上海话中没有元音韵尾。除此之外，部分官话和闽语的部分韵母也有一些反映，勾漏片粤语豪韵（举平以赅上去）多读 o 韵母，也是一例。不过在粤语中，像本文两个方言点这样大规模消失元音韵尾的现象则不太常见。本文将详细说明两个方言点元音韵尾消失的现象，具体包括列举各韵母例字（同时列入广州话读音），列举其他方言少见的同音字（如吴川：家=街；苍梧：该=瓜）现象等。本文还将以两方言为中心，搜集其他粤语的元音韵尾丢失现象（比如云浮话老派有与吴川类似的现象），并与闽、湘、吴、官话诸方言作简单比较。本文也将探讨两方言与湘语吴语蟹假果遇摄元音连锁变化的关系，认为蟹摄二等字韵母丢失韵尾变为单元音并不能导致假摄韵母元音后高化。

粵語謂詞性語氣詞「喺啦」的句法分析

黃卓琳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喺啦」(hai2laa1)是粵語中少有的複合助詞之一(張洪年 2007)。「喺啦」的「喺」原來應該是動詞「係」(hai6)(是),即「喺啦」是由動詞「係」加上語氣詞「啦」複合而成的,由於它具有鮮明的動詞性,故又稱為謂詞性語氣詞(鄧思穎 2012)。根據文獻的描述,「喺啦」主要用於陳述句句末(方小燕 2003),表示一種確認、肯定的語氣(方小燕 2003;麥耘、譚步雲 2011)。它既可以表示斷然如此,不用猶豫,不必懷疑的意思,如例(1);也可以表示「只好如此」的意思,帶有無可奈何的口氣,如例(2)(李新魁等 1995;方小燕 2003;梁仲森 2005;張洪年 2007;麥耘、譚步雲 2011等)。以往有關「喺啦」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語義、功能方面,缺乏句法方面的分析,因此,本文嘗試探討「喺啦」的語法特點,包括它對謂語、句類、人稱等的限制,並進而分析其句法地位。

首先,本文發現能與「喺啦」共現的謂語既可以是動態的,如例(1)和(2),也可以是靜態的,如例(3)和(4)。句類方面,「喺啦」能出現在陳述句(1-4),但不能出現在典型的祈使句(5)、疑問句(6)和感嘆句(7)。此外,在包含「喺啦」的句子中,主語一般是第一人稱或省略不說,如例(8);在少數情況下主語可以是第二人稱,也含有祈使的意味,如例(9)。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有時候包含「喺啦」的句子會帶有歧義,既可以表示確定、不用猶豫與懷疑;也可以表示無可奈何的選擇,視乎語境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如例(10)。這時候,加上「總之」或「唯有」就能把意義區分開來,加上「總之」可以表示確定、不用猶豫與懷疑,如例(11);加上「唯有」則表示無可奈何的選擇,如例(12)。

粵語的「係」(hai6)本身是繫詞,如「我係中國人」;也可用於加強語氣,如「我係唔去」;又或者表示「只有」的意思,如「係你佢至服」。「啦」是語氣詞,能表示確認、肯定的語氣。顯然,「喺啦」的意義與「係」和「啦」都有密切的關係,似乎是兩者意義的相加。本文將會探討「喺啦」與「係」和「啦」的句法、語義關係,特別是「係」的聯繫意義和焦點意義與「喺啦」的關係,希望能藉此進一步揭示粵語謂詞性語氣詞的句法結構,豐富現有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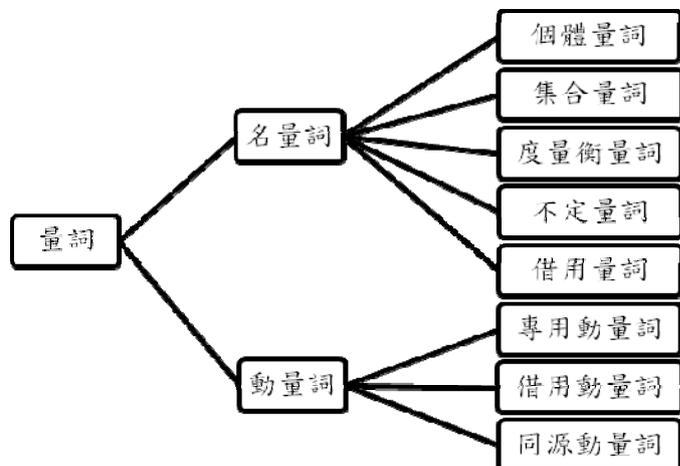
(1) 我做得晒喺啦。(我能全部做完就是了。)(動詞謂語;陳述句)

- (2) 無人要我要嚟啦。(沒人只好我要就是了。)(動詞謂語；陳述句)
- (3) 今次麻煩嚟啦。(這次麻煩就是了。)(形容詞謂語；陳述句)
- (4) 今次大件事嚟啦。(這次出大事就是了。)(名詞謂語；陳述句)
- (5) *你咪郁嚟去嚟啦！(你別亂動就是了！)(祈使句)
- (6) *邊個去嚟啦？(誰去就是了？)(疑問句)
- (7) *今日天氣真係好嚟啦！(今天天氣真好就是了！)(感嘆句)
- (8) 老闆叫到，我/*你/*佢照做嚟啦。(老闆吩咐了，我/你/他只好照著辦就是了！)
- (9) 你放心嚟啦，我唔會亂嚟嘅。(你放心就是了，我不會胡來的。)
- (10) 我去嚟啦。(我去就是了。)
- (11) A: 你係咪真係去架？記得啫！(你是不是真的去呀？記得啊！)
B: (總之 / *唯有) 我去嚟啦。(總之我去就是了。)
- (12) A: 無人肯去啫，咁點算？(沒人願意去，那怎麼辦？)
B: (*總之 / 唯有) 我去嚟啦。(只好我去就是了。)

粵語及普通話量詞通用分類體系初探

黃阡薇、李輝
香港大學

量詞是漢藏語系中獨有且爭議較大的詞類。關於其英文命名及分類等問題，漢語言學界也一直是眾說紛紜。本文（1）探討漢語量詞的性質及其英文名稱，分析"Classifier"及"Measure Word"兩種翻譯的不足之處，建議以"Quantifier"作為量詞的英文名稱；（2）透過粵語及普通話兒童語料庫，對前人的經典量詞分類系統詳加分析，指出其在分類指標、覆蓋面和排他性方面存在的利弊；（3）根據粵語及普通話兒童語料庫中所見量詞進行對比分析和歸類，並根據歸類結果建議一個粵語及普通話共用的量詞分類體系；（4）建議的新體系是以朱德熙的《語法講義》作基礎，根據漢語量詞的語法特性仔細分為兩大類八小類：名量詞(個體量詞、集合量詞、度量衡量詞、不定量詞、借用量詞、專用量詞)及動量詞(專用動量詞、借用動量詞、同源動量詞)(詳見圖一)。(5)使用該新體系將粵普雙語兒童語料庫中的量詞成功地進行了編碼與分類，結果發現重碼率極低，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兒童早期量詞及語法獲得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圖一：普通話和粵語量詞通用分類體系

Reference:

-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 J. (2000). *Xian dai Han yu liang ci yan jiu*. Beijing : Min zu chu ban she.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2011).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Tse, S.K., Li, H., & Leung, S.O. (2007). The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 Classifiers by Preschool Childr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4(2), 495-517.
- Zhu, D.X. (2008). *Yu fa jiang yi*. Hong Ko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香港粵語親屬稱謂的變調規律

黃炳蔚[#], 李深紅[†], 左靄雲[†]

東華學院語言及通識教育中心[#],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粵語的變調有三種，均可以出現於舒聲和入聲中，分別為：(a)高平變調(調值 55)、(b)高升變調(調值 35 或 25)、(c)低變調(調值 21) (麥耘 2000)。三者的調值，分別跟陰平、陰上、陽平相若，因此本文用「粵拼」調號「1、2、4」表示。

前人研究已羅列了豐富的變調詞例，義類劃分也很細緻 (例如 Bauer & Benedict 1997)。就名詞類來說，高升變調出現的機會較多，其次是高平變調 (張勵妍 1986)，而低變調較少出現。一般認為低變調只限於疊音的親屬稱謂語的第一個音節。例如：姐姐(ze²⁴ ze²⁻¹)、弟弟(dai⁶⁴ dai⁶⁻²)、妹妹(mui⁶⁴ mui⁶⁻²)、爸爸(baa¹⁴ baa¹)、媽媽(maa¹⁴ maa¹)，口語稱謂讀變調，而讀書音仍唸原調 (Matthews and Yip 2011)。這類變調跟兒語有關，一般歸類為小稱標誌 (麥耘 2000)。不過，還有些低變調的詞例是前人較少提及的，例如「阿爸」(aa³ baa¹⁴)中的「爸」讀陽平調；又如「叻哥」(lek¹ go¹⁴)的「哥」可讀陰平調或低變調；「菊姐」(guk¹ ze²⁴)的「姐」可讀原調陰上，也可讀高平變調或低變調。「叻哥」、「菊姐」一類稱謂叫「擬親屬稱謂」。我們往往比照對方的年齡、輩分，借用親屬稱謂作稱呼，可使對方感到受尊重。本文研究的親屬稱謂，也包括這一類。有些稱謂語是原調、變調皆可而詞義沒變，而少部分是以變調區分詞義的，本文會用優選論(Optimality Theory)，分析其採用原調或變調的規律。

參考文獻：

- 麥耘：〈廣州話的聲調系統與語素變調〉，《開篇》，總 20 期 (2000 年 12 月)，頁 1-21。
- 張勵妍：〈廣州話高升變調規律初探〉，《語文雜誌》，總 13 期 (1986 年 9 月)，頁 41-48。
- Bauer, R.S., Benedict, P.K. (1997). *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atthews, S. and Yip, V. (2011).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試論廣州話 a¹¹ 系列疑問語氣詞之語源——從上古漢語之疑問語氣詞談起

黃得森

香港理工大學 英文系

廣州話之疑問語氣詞主要有三個系列：

m-系列：嘛 ma³³、咩 me⁵⁵、呀馬 a²²ma¹³

n-系列：呢 ne⁵⁵

a¹¹-系列：呀 a¹¹、喺 la¹¹、㗎 ka¹¹

m-系列與 n-系列為漢語諸方言所共有，故應為同源詞，或透過相似機制產生。至於 a¹¹-系列之語源則未見於文獻，本研究試圖論證 [a¹¹] 與古漢語之疑問語氣詞“邪/耶/歟”同源。

放諸四海，以上昇之語調表疑惑極為普遍，英語如是，漢語諸方言如是，故以音高而論，“咩”、“呢”等屬無標記之疑問語助詞，然 [a¹¹] 系列之助詞竟屬廣州話音系中最低者，這個完全違反一般疑問助詞之特點，故頓成一個大疑惑。低語調一般表陳述、堅決，故很明顯[a¹¹]並非由助詞 [a³³] 加上語調而形成。

上古漢語之疑問語助詞主要有四個：乎、邪、耶、歟，皆屬魚部字。無獨有偶，四者皆屬濁聲母，且都是中古之平聲字。魚部字主元音，各家皆擬作 [a]，配上濁聲母本質為低音，平聲字上古無韻尾之特點，上古漢語之疑問語助詞正正與廣州話之 a¹¹-系列疑問語助詞暗合！

“邪/耶”屬中古以母麻韻開口三等字，到中古仍保留 [a] 主元音，相同音韻地位者今廣州音一般讀 [yɛ]，可是亦有例外，而例外者正是同屬語氣詞之“也”[ja]。語氣詞語音特變之例子並不罕見，如“嘅”[gɛ] 來源於量詞“個”[gɔ]；另一方面，[j] 介音從中古到現代廣州話不斷脫落。由此可見，中古同義之“邪/耶”[ja] 介音弱化脫落後，不按規律地特變成現代廣州話的 [a] 是完全可以合理地解釋的 (ja > ⁱa > a)。

有研究指出廣州話之語氣詞音調系統超出傳統所描述之九調以外（胡永利 2010），故語氣詞之音高，並非純粹是詞彙聲調 (lexical tone)。低聲調之疑問語氣詞 [a] 實際上亦見於其他聲調系統迥異之方言，如鬱林話，此等方言之低調 [a] 亦可能同出一轍。

參攷文獻

- 梁仲森 2005：《當代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陳順成 2011：〈疑問語氣詞“邪”、“耶”的歷時考察〉，《古漢語研究》第四期，第八十六至九十頁。
胡永利 2010：〈香港粵語句末語氣詞及語調的聲學語音初探〉，《粵語研究》第六、七期，第六十六至七十四頁。

《英语集全》与《英华分韵撮要》

矢放昭文
京都产业大学

作为研究 19 世纪粤语的资料之一，唐廷枢（1832-1892）在 1862 年由广州纬经堂出版的《英语集全》（六卷）也有不可忽略的价值。《英语集全》是当时华人编辑的英语参考书之中，收词最丰富、例句最多的一部词句汇集之作，也是唐廷枢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了六年的英语的成就的彰显，《英语集全》中的语言信息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根据本人的调查研究，《英语集全》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英华分韵撮要》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卫三畏是在 19 世纪深入研究粤语的传教士之一。他的粤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著作有《拾级大成》1842、《英华韵府历阶》1844、《英华分韵撮要》1856、《汉英韵府》1874 等。其中《英华分韵撮要》给后来的有关粤语音韵系统研究以深刻的影响。

《英语集全》所收录的两种语音信息，第一类是用拉丁字母标记的粤语音，第二类是用汉字标记的英语音。根据本人的观察，第一类的声韵因素和《英华分韵撮要》的声韵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和对应关系，比如粤音声系认定 23 个声母、/a/元音的长短用/a/跟/a/的对比来标记等，两书内容基本一致。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说：《英语集全》日母字在细元音/i-/之前保持鼻音/ng-/成分，如“染 Ngim”等，在《英华分韵撮要》里找不出来。

那么，《英语集全》的第一类字音资料跟《英华分韵撮要》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对不同之处，能否用“基础方言”不同来解释，是本人在这届研讨会上要进行阐述的。对《英语集全》和《英华分韵撮要》两本书在声韵系统上表现的相同与不同的现象，可以从“基础方言”的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粤语句末语气助词“定喇”刍议

颜耀良
美国国防语言学院

本文拟讨论粤方言中的句末语气助词“定(dɪŋ²)喇”(如“佢无来定喇。”)的含义、使用情况、句法特点、历史来源以及与普通话句末语气助词“吧”的主要不同。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讨论其语义和句法特点,“定喇”接于各种谓语句形式的陈述句句末,表示推测的语气,推测者通常是第一人称,该人称多取隐含的形式,但也可采取有标记的形式:

1. 你梗係好餓定喇。(网上)
2. 我諗,佢哋梗係賺到盤滿鉢滿定喇。(网上)

如果使用其他人称则需要使用人称标记或引语的形式:

3. 佢讲你一定係北京人定喇!
4. 佢讲佢諗你一定係北京人定喇!

虽然很多由一个肯定和一个否定陈述句组成的差异对都可以接上此语气助词、形成新的差异对,但也有一些接上了“定(dɪŋ²)喇”后就变得拗口或难以接受,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动作或状态未然的场合。

第二部分将从语法化的角度探讨此语气助词的产生,我们认为“定(dɪŋ²)喇”源于粤方言“将来认识情态”用法的“V定(dɪŋ⁶)喇”结构(如“赢定喇。”),而“V定(dɪŋ⁶)喇”结构则来自于官话系统的“V定了”(如“赢定了。”)。“定(dɪŋ²)喇”这一句末语气助词的产生经历了一个“V定(dɪŋ⁶)喇”结构中的附着成分“定”和句末语气助词“喇”词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定”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原“V定(dɪŋ⁶)喇”所具有的、说话人对某事件/状态必然发生这一近乎于肯定的推测的确定性也明显弱化。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把普通话所有的句末语气助词中最为接近于“定(dɪŋ²)喇”的“吧”与“定(dɪŋ²)喇”作一个比较,探讨二者的主要不同。我们将用“三域(行域、知域、言域)”的理论框架、从句子种类和主观性等角度去探索。我们发现与“吧”的使用可涉及到“三域”中的“行域”、“知域”和“言域”这一情况不同,“定(dɪŋ²)喇”的使用只限于“知域”。我们还观察到“吧”可使用的句式种类要比“定(dɪŋ²)喇”多:它既可用于陈述句也可用于疑问句和祈使句,而“定(dɪŋ²)喇”只限于陈述句。此外虽然“吧”和“定(dɪŋ²)喇”都明显地带有说话人推测的主观性,但是与“定(dɪŋ²)喇”不同,“吧”的使用还常常带有比“定(dɪŋ²)喇”明显得多的交互性主观性。

懷集上坊與下坊話聲調重探

嚴至誠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一) 懷集縣地理與語言概況

懷集縣位處廣東省西北部，綏江上游，屬肇慶市所轄。東與廣寧縣、清遠陽山縣為鄰，南接德慶縣，西與封開縣、廣西相靠，北則接於清遠連山、連南兩縣。

懷集縣通行粵語（「白話」），但也有零星地方說客家話、壯語、標話（與壯侗語密切相關的一種方言）。至於懷集方言於粵方言的歸屬，由於詹伯慧（2002）沒有為粵語劃分出勾漏片，故把懷集方言歸入粵海片（廣府片）；楊璧苑（2012）則歸入勾漏片，與《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1989）同。

懷集方言主要有兩種口音——上坊話與下坊話。上坊話通行於藍鍾、冷坑、馬寧、崗坪、梁村、大崗等鎮，冷坑白話為代表方言；下坊話則流行於中洲、連麥、洽水、懷城、鳳崗、汶朗、甘灑、閩崗、坳仔諸鎮，而以縣城懷城白話為代表。除了上坊下坊話，楊璧苑（2012）稱橋頭鎮、詩洞鎮另外流行一種白崖話，與上坊下坊話分別較大，而與封開蓮都粵話較為接近。

又據本文兩位發音人所述，縣城原通行下坊話，後城內上坊人漸多，城內遂也以習上坊話為常；下坊話較為難明，上坊話則基本通行於縣內各鄉鎮。若觀察上坊與下坊話兩種口音的分佈，可見其與地理位置上的南北無關，而呈現出東西的分野——上坊話諸鎮處於縣內西面，下坊話眾地則位於縣境東面一帶。

(二) 懷集粵方言——上坊話與下坊話——的聲調特點

對懷集方言聲韻調系統的描寫，較早的有《懷集縣志》（1993），當中上坊話跟下坊話兩種口音都包括了。可是後來的報導與研究，如《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1998）、林倫倫等（2008）、楊璧苑（2012），大都集中在下坊話。此外，彼此的描寫也存在差別。

	本文（{四度制}）			《懷集縣志》（1993）（[五度制]）		
	調類	調值	例字	調類	調值	例字
舒聲調	陰平	{53}	波 pɔ、之 tsi	1	[55]	遮 tsia、碑 pi
	陽平	{21}	麻 ma、羅 lɔ	2	[21]	蛇 tsia、皮 pi
	陰上	{35}	啞 a、朵 tɔe	3	[35]	舍 sia、比 pi
	陽上	{242 ~ 24}	馬 ma、老 law	4	[242]	社 tsia、被 pi
	陰去	{44}	霸 pa、借 tsja	5	[33]	借 tsia、痹 pi
	陽去	{33}	罷 pa、謝 tsja			
入聲調	短陰入	{55}	接 tsip、逼 pek	9	[55]	足 tsok、缺 khyt
	長陰入	{44}	百 pet、答 tap	8	[33]	俗 tsok、日 jyt
	短陽入	{33 ~ 35}	別 pit、律 let	7	[35]	熟 tsok、活 wyt
	長陽入	{53}	白 pek、拔 pat	6	[21]	鑿 tsok、月 njyt

表 1：懷集上坊話聲調

上坊話聲調的特點，在於有四類入聲調，亦即陰入與陽入各兩分。根據《懷集縣志》（1993），上坊話舒聲調只有五個，所以跟四種入聲調合起來，共得九類。若據本文所用的錄音材料，則舒聲多出一調，見表 1（當中值得留意之分歧，以陰影標示）。至於下坊

話聲調的特點，則在陰上降調{51}音節末的嘎裂聲，以及陽上升調{24□}音節末的喉塞音；陰上因嘎裂聲所以與同是降調的陰平互相區別，陽上則因音節末之喉塞音而與同是升調的陽去彼此不同。這兩點前人未予指出，值得留意。茲將諸家與本文之調值描寫，列於表 2。

		本文（{四度制}）			《懷集縣志》（1993）（[五度制]）			
		調類	調值	例字	調類	調值	例字	
舒聲調	陰平	{53}	波 pɔ、之 tsi	1	[51]	詩 θi、燈 tang		
	陽平	{242}	麻 ma、羅 lɔ	2	[242]	時 θi、藤 tang		
	陰上	{51}	啞 a、阻 tso	3	[53]	史 θi、等 tang		
	陽上	{24□}	馬 ma、老 low	4	[13]	是 θi、鄧 tang		
	陰去	{44}	霸 pa、借 tsjɛ	5	[435]	試 θi、凳 tang		
	陽去	{24}	罷 pa、謝 tsjɛ	6				
入聲調	短陰入	{55}	接 tsip、逼 pek	9	[55]	粒 nap、尺 tshiek		
	長陰入	{44}	百 pət、答 tap	8	[435]	鴿 kaap、積 tsiek		
	短陽入	{24}	別 pit、律 let	7	[13]	急 kap、席 tsiek		
	長陽入	{24}	白 pek、拔 pat					
		詹伯慧、張日昇 （1998）（[五度制]）			林倫倫等（2008） （[五度制]）		楊璧苑（2012） （[五度制]）	
		調類	調值	例字	調值	例字	調值	例字
舒聲調	陰平	[42]	高豬初三	[42]	高豬初三	[42]	高三豬初	
	陽平	[231]	鵝窮才人	[231]	鵝窮才人	[231]	窮婆鵝人	
	陰上	[53]	古口走短	[53]	古口走短	[53]	古口走桶	
	陽上	[13]	五女老有	[13]	五女老有	[13]	女有舅旱	
	陰去	[33]	抗菜放唱	[324]	抗菜放唱	[33]	菜怕唱放	
	陽去	[325]	共樹飯用	[24]	共樹飯用	[325]	部共飯稻	
入聲調	上陰入	[55]	急竹鐵福	[55]	急竹鐵福	[5]	急筆德竹	
	下陰入	[33]	尺百拍發	[34]	尺百拍發	[33]	拍發客尺	
	陽入	[325]	月六麥舌	[23]	月六麥舌	[325]	落月辣舌	

表 2：懷集下坊話聲調

以往的研究，主要以聽感為基礎；加上舊日所用五度制而引起多種可能的調值描寫，使得調查結果各異。為此，本文根據第一手聲學材料，並利用分域四度制，重新描寫懷集上坊話與下坊話的聲調系統。新的描寫除了跟舊的描寫有所不同外，也指出了舊有研究所忽略的一些現象——除了證明下坊話存在特殊發聲態，也指出了這些發聲態作為聲調參數的作用；並嘗試為不同描寫的分歧提供解決辦法。

（三）主要參考資料

1. 懷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懷集縣志》，佛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林倫倫、林春雨、洪英：〈懷集粵語（下坊話）音系及其與廣州粵語比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5 期。
3. 楊璧苑：〈廣東懷集下坊話同音字匯〉，《方言》2012 年第 4 期。
4.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年。
5.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6.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1989 年。

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個莞寶片方言——通過德文資料試探其詞彙特徵

吉川雅之
東京大學

Isis 是一份帶有百科全書色彩的學術雜誌，創辦人為德國的著名博物學家奧肯 (Lorenz Oken)。他在該誌第 11 卷 (刊於 1822 年) 中僅用拉丁字母便記錄了 950 多個漢字音。雖然這些字音大致符合現代粵語的基本特徵，但是與以《英華分韻撮要》(刊於 1856 年) 為代表的十九世紀中期的廣州方音之間仍存在著根本性差別，如下：

	該資料	《英華分韻撮要》
去 (遇合三去御溪)	hy/*hi	hü/*hy
順 (臻合三去稇船)	san/*san	shun/*ʃun
百 (梗開二入陌幫)	ba/*pa	pák/*pak

(註：斜線號前為該資料中的標音，後為筆者的擬音。)

關於這份語料，已有研究指出奧肯的語音合作人 Aho 來自香山縣黃圃，並且該資料中的一些具有較強排他性特徵的漢字音僅在現代莞寶片的方言中可見，從而推斷其基礎方言與香山縣的三角方言極為接近。本研究擬對該資料中的詞彙加以分析，並和其它十九世紀資料以及現代語中所見到的形式進行對比。

該資料在前半部分按照數目、時令、身體部位等詞義範疇羅列詞語，在後半部分羅列含有「飲」、「打」等動詞的句子 (搭配不同主語或賓語)，在篇末兩頁則列出中國的省名和廣東的地名 (以珠江三角洲境內的為主)。每個項目都先用拉丁字母標音，隨後配以德文翻譯及注釋，如下：

Tzong Jong Gutt, September; weicht ab.
Sap Gutt, zehnter Monat, October; also nach der Zahl.
Go jam, ich trinke.
Ni jam, du trinkest.

(註：由於德文部份均以哥德式字體 (Fraktur) 寫出，由筆者轉寫成拉丁字母。)

該資料中偶見非常用詞彙形式。例如，表示月份的詞語中，「九月」標以「Tzong Jong Gutt」(重陽月)，「十一月」標以「Tong Tzi Gutt」(冬至月)。此外，就幾個詞項而言，在該資料中見到的是單音詞，不同於在現代方言中普遍見到的複音詞。還有，由該資料中的地名可以窺知 Aho 所具有的地理知識範圍。

該資料刊於 1822 年，與刊於 1828 年而長期以來被視為粵語歐文資料之嚆矢的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的《廣東省土話字彙》相比還早數年，所記錄之詞形對反映十九世紀初期之粵語方言的面貌應有非常寶貴的價值。目前學界習慣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漢語冠以「早期」之名，筆者視本研究為探究早期粵語的一個環節，為今後有關其各種地理變體間的比較研究打下基礎。

廣州話韻腹[ɐ]的兩個來源

尤盛

香港理工大學

學者們對中古音音值的構擬，其韻腹都可以按攝歸納為兩類——高元音韻腹和低元音韻腹。發展到現代廣州話，這種自然類（Natural Class）對立除了體現在舌位的高低外，也體現為音色的長短，形成了今日看到的長短（同時亦為低高）元音配對的格局²⁷。

現代廣州話眾多的長短元音配對的韻腹中，以[a:]和[ɐ]的配對是具系統的，並且在整個廣府片中都有同樣整齊的表現（詹伯慧 2002）。對此，李新魁（1994）和千島英一（2002）指出粵語和壯語有一定關係，因為在壯侗語族的龍州土話（李方桂 1940）、白土壯語（藍慶元 1999）和武鳴壯語（韋慶穩、覃國生 1980，轉引自千島英一），都存在類似的/a:/和/a/韻腹的配對格局。

對於廣州話[ɐ]韻腹的來源，李新魁歸納為四個（來自[e]、[ə]、[o]、[ø]韻腹），而陳衛強（2011）則認為其來源共有三至四個（來自[a]、[i]、[ə]、[ɐ]）。其實現代廣州話[ɐ]韻腹大都出現在中古的高（或稍後高化）元音韻腹型攝，可見它們應該有相同的來源，Chen & Newman（1984）以簡化中古音（Simplified Middle Chinese）（Chen 1976）為框架，並以「內外互轉（The realignment of inner and outer）」來交代了*[a]>[ə]和*[ə]>[a]（即[ɐ]）的音變，即歸納為單一來源——中古的[ə]韻腹的低化。這的確解決了不少問題，但又過份簡化了所有[ɐ]韻腹的出現，如咸開一配牙喉音的韻腹[ɐ]化就在近代才出現，並和[ə]沒有關係。

本文利用簡化中古音作為中古音系的框架，及利用記錄了早期粵語的文獻作分析，歸納出廣州話韻腹[ɐ]化的來源只有兩個，一個是來自中古音的[ə]韻腹，另一個是來自近代的[o]韻腹。

參考文獻：

- Matthew Y. Chen.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Peking.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6, 4(2/3), 113-277.
- Matthew Y. Chen and John Newman.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Cantonese (Part 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4, 12(2), 334-388.
- Kwan-Hin Cheung. The phonology of present-day Cantonese. Ph.D. Thesi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986.
- 陳衛強：《廣州地區粵方言語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 藍慶元：〈桂北壯語後中古層次漢語關係詞與平話的淵源關係〉，《桂林市教育學院學報》，第13卷，第4期（總第40期），1999，44-48。
- 李方桂：《龍州土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六，1940。
-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千島英一：《粵語雜俎》，東京：好文出版，2002。
-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²⁷ 四套長短配對的元音同時亦為低高配對，分別為[a:]~[ɐ]、[e:]~[e]、[ɔ:]~[o]、[œ:]~[ø]（Cheung 1986）。

Utterance-final intonation and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ZHANG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previous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utterance-final intonation of Cantonese, investigators tended to use content word as the final syllable and avoided to u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SFP henceforth) in their designed utterances. No previous work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the utterances with and without an SFP. The systematic acoustic experiment conduc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filled this gap.

Two cross-cutting dichotomies were analyzed here: one is declarative versus question; the other is absence versus presence of an SFP. Thus, there are four sentence types: declarative without an SFP (DN henceforth), question without an SFP (QN henceforth), declarative with an SFP (DP henceforth), and question with an SFP (QP henceforth).

Six trunks were designed to be composed of same-tone syllables and in the format of “Subject (3 syllables) + Adverbial Modifier (2 syllables) + Verb (2 syllables) + Object (2 syllables)”, e.g. the trunk of Tone 1 is: “張新輝今朝裝修餐廳”. The four sentence types were realized by adding the required SFP to the trunks or telling the informants (twelve native speakers of Cantonese) what kind of intonation we intended to obtai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all four sentence types, the utterance-body intonation is declining, and all the non-final syllables of level/falling tones show descending pitch contours. At the syllable level and in the utterance-body part, the four sentence types only show minor differences in pitch register and even smaller differences in pitch slope.

The most remarkable distinction among the four sentence types happens at the end of the utterances. The final syllable of DN is affected by the final declination,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lower pitch register and slightly more declining pitch contour compared with non-final syllables. The final syllable of QN shows an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sharp-rising pitch shape, which even overrides the force of the original lexical tone, i.e., the tonal distinction may be neutralized. For utterances with an SFP, the SFP itself carries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ng whether an utterance is a declarative or a question. The trunk-final syllable of DP and QP does not show extraordinary behavior as DN-final and QN-final. Thus, adding an SFP after the trunk can discharge the intonation burden on the trunk-final syllable.

Here we propose that all the utterances have an SFP, either in the segmental or segmentless form. The segmental form is the traditionally observed form, which lies on at least one independent segment. Utterance-final inton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segmentless SFP, which is a floating contour superimposing at the final syllable of the utterance. In this way, the concepts of SFP and utterance-final intonation can be connected.

廉江粤语的重叠短语

张庆文，林华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

廉江粤语与粤语其他分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大量而系统的重叠形式来表示特定的语法意义（林华勇 2011）。本文拟将廉江粤语的重叠短语作为研究对象，来重新观察不同重叠短语的语法表现，尝试发掘这些重叠短语之间的共性，并以此探讨重叠在语法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廉江粤语中与语法意义相关的重叠短语，不包括通常所讲的词汇内部的语素重叠形式。这些重叠短语包括动词短语、方位名词短语、以及级差（scale）结构中的极性成分（polarity item）。具体如下所示：

- (1) a. 嗰只天好似爱落水爱落水噉/噉式/噉势/噉做到。这几天好像要下雨的样子。
b. 我如今想呕想呕噉做到。 我现在好像要吐的样子。
c. 佢好似识行识行紧[tɛ 21]。 他好像快要走了。
d. 老妹有啲想去想去哇。 妹妹有点想去。
e. 使牛使牛[nu⁵⁵]只系我大伯。 正犁田的那个人是我大伯。
f. 我大伯使牛使牛在。 我大伯在那犁田呢。
g. 苹果放走箱底箱底呢。 苹果放在靠近箱底那儿。
h. 最前最前嗰几日好紧张。 最靠前的这几天很紧张。

从语义上来说，动词重叠短语表示临界发生的状态（1a-b）、状态轻说（1c-d）和动作持续（1e-f）的意义，方位名词短语重叠表示“接近某处/时”（1g-h）的语义（林华勇 2011），重叠之后的短语都具有有界意义。林华勇（2011）对这几种重叠短语的描写以及语义归纳应该是详细而正确的，不过通过对这几组重叠短语的重新观察，我们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现象：

首先，不论这些重叠短语的语义如何，重叠成分（reduplicant）的词性或类别如何，重叠后的短语语法意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的语义比重叠之前更加具体，例如：表临界发生状态和状态轻说的动词重叠短语，重叠之前只是通过附加能愿动词或心理动词来简单地表达某种将要发生或现实的状态，重叠之后表达的是即将发生体（prospective aspect），而方位名词短语在重叠之后也表示接近某个地方或者时间的意义，上述重叠短语语义上表

示的都是“接近某个特定的目标（包括状态/地点/时间）”；至于表示持续意义的重叠短语，虽然动词“使牛（犁田）”是无界的（telic）动作动词，但是重叠后的短语“使牛使牛”在语法上具有了进行体的意义，这相当于从无界的事件当中截取一个特定的片段，使其定格，这个特定的片段在语义上来说应该是有定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种重叠短语表达的语法意义都是与有定相关的。

另外，这几组重叠短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都不能独立使用，大部分重叠短语之后都必须有一个指代性短语与其共现(1a-c, 1e-h) 例如：噉/噉式/噉势/噉做到、紧□[tɛ21]、□[nu55]只、在、呢、啲几日等；还有个别重叠短语要求必须在其之前出现程度修饰语“有啲”等成分(1d)。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廉江粤语的重叠短语虽然貌似语法表现不同，但它们应该具有相同的低层结构，即“表有定意义的重叠短语+指示性短语”，重叠短语类似于指示性短语的先行词，它必须有明确的语义所指，因此在语义上必须是有定的。

可以看出，廉江粤语中的重叠短语实际上表达有定意义的一种形态手段。

粵閩方言的類形聲字

鍾 奇

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

形聲字由形聲兩部分組成。形符標識詞彙關聯義、聲符標識語音者為傳統形聲字。此之外貌似形聲者為類形聲字。

1 傳統形聲字

1.1 形符標詞彙關聯義、聲符只標（本）音（𦉳[tʃiu²²]{嚼}廣州，妘[muo³¹]{妻}福州）。

1.2 形符標詞彙關聯義、聲符（本）音義兼標（檯[thoi³⁵]{桌子}廣，跲[kian⁵³]{走}福）。

2 類形聲字

2.1 形符標語用關聯義、聲符標（本）音。

2.1.1 “口”旁類形聲字

“口”表示該字為方言口語所用。即“口”不表語素的詞彙關聯義，而表示語素書寫形式的語用關聯義。書寫形式是一種語用，故可歸為語用的語用關聯義。語用的語用仍是語用，故最終可歸為語用關聯義。

2.1.1.1 聲符只標（本）音（嘢[jɛ¹³]{東西}廣，啫[tɕia³¹]{這}福）。

2.1.1.2 聲符（本）音義兼標（吓[ha¹³]{“下”讀 ha¹³ 時的分化字}廣）。

2.1.2 “亻”旁類形聲字

多見於閩方言尤其是閩東方言。“亻”表示該字為本地人所用。與“口”旁類似，“亻”表示的不是語素的詞彙關聯義，而是語素語用的語用關聯義。最終也可歸為語用關聯義。

2.1.2.1 聲符只標（本）音（伋[paik²³]{知道}福，俚[na²⁴²]{副詞，只}福）。

2.1.2.2 聲符（本）音義兼標（個[muon²¹³]{問}福，俚[tshia⁴⁴]{車，轉動}福）。

2.1.3 形符只標語境關聯義

廣州地名“濂泉路”中“濂”本為“廉”。“廉”與“水”無關，但受“泉”的感染，寫成“濂”。

2.2 形符標詞彙關聯義、聲符標訓讀音（預[mɛ⁵⁵]{負}廣，𦉳[la³³]{語氣詞}廣，擧[kia⁵⁵/gia⁵⁵]{舉}廈門）。

2.3 形符標語用關聯義、聲符標訓讀音。

2.3.1 “口”旁類形聲字（吼[lun⁵⁵]{孔}廣，𦉳[m¹¹]{不}廈）。

2.3.2 “亻”旁類形聲字（𦉳[n²⁴²]{不}福，𦉳[taŋ⁴⁴]{現在}福）。

深圳坪山占米话概述

周佳凡，刘镇发

厦门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深圳有着非常丰富的语言资源，但其研究比起周边市镇来说十分不发达，这源于人们对于深圳地区方言复杂性的低估。除宝安粤语、龙岗客语外，深圳还有大鹏话、占米话、蛋家话等小方言土语。这次我们带着好奇走进了龙岗区坪山、坑梓、坪地一带，调查了当地正面临消逝的占米话。

占米话，在坪山又被称作“祖公话”，原因是说这种话的人以前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方言，拜祭祖宗时不讲占米话就不能与族人同桌吃饭。事实上，客家话在龙岗一带占据绝对优势，占米话只有极少数人会讲，由于后继无人，这种方言正快速走向消亡。

从语音、词汇方面说，它粤、客色彩混杂，骤看难分系属。语音方面，全浊声母清化后全部读为送气音，溪母大多读[kh]，匣母合口多读[f]，缺少撮口韵，上声不分阴阳，与当地客家话相似。但微母读同明母，非组文白较少，[a、ɐ]对立，梗摄三四等文白读都是[ŋ、k]尾等，又都是粤语特点。词汇方面，与客家话也有很多相同点，但基本词汇比较接近粤语。连声调也在两者之间，平声和去声与客家话相似，上声和入声则是粤语的类型。

我们的研究并非要急着争论它究竟客还是姓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种混合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将占米话与广州话、香港新界围头话以及客家话进行了比较，初步的结论是，在语音上，占米话在与宝安本土粤语（围头话）最相似，且对应明显，客家话则由于长期相互接触，已经并且仍然在向占米话“输出”其语音特征。词汇方面，占米话显示出不断靠近客家话的趋势。

因此，我们认为，深圳坪山一带的占米话是以粤语为基础，在长期的接触中不断接受客家话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方言土语。另外，坪山一带的占米话与邻近的海丰、惠东占米话也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我们也将其进行了对比，考察他们不同的发展方向。

Translation for the Stage—A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King Lear* and its Cantonese Translation

周肖儿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Abstrac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hereafter SFL) is primarily designed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 Although the theory is constructed preliminarily for analysis on discourse in English, recent years have seen researches in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flourish.

Such developments have made possible the applications of SFL t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t offers a linguis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n translation works. Instead of making an empirical or impressionist approach adopted by scholars of literary studies,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eatures in provid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riterions and in seeking solid evidence in the language when being used to account for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carrying out a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play *King Lear* by Shakespeare and its Cantonese translation by Jane Lai, which is a play script for stage performance. Through this analysi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ion of dramatic texts has been provide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dramatic texts are directed by their usage—for the page or for the stage. One could easily understand that the language of dramatic texts of both kind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However, one might not have a clear picture in mind that even if the source text itself is for stage performance, a literal or honest translation of it does not guarantee a theatre-oriented play scrip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lso, the same stage effect in the Source Text might not be guaranteed to achieve in the target text. Necessary adjustments have to be made to fit in a foreign stag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provide better insigh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FL proposed by Halliday. The corresponding objectives are to discover and highlight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performance-oriented play scripts, to give descriptions and explanations to such phenomena through the execution of a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o finally find out the ways stage effects are realized through choice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system. In this analysis, detailed observations on the data have been made based on the three Metafunctions of language and their realizations, which are the Experiential Metafunction, the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and the Textual Metafunc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outlines some features of Canto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FL.

通 訊 錄

<u>與會者姓名</u>	<u>與會者電郵地址</u>	<u>單位</u>
1. Bauer, Robert	包睿舜 rsbao@yahoo.com	香港理工大學
2. Chan Kin Wing, Kevin	陳健榮 ec.ckwab@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
3. Chan Kwun Kin	陳冠健 godfingerg@yahoo.com.hk	香港中文大學
4. Chau, Joan	鄒陳惠儀 joan.chau@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5. Chen Caijia	陳才佳 13507842533@163.com	賀州學院 (廣西 542899)
6. Chen Shih-an	陳世安 phonology007@yahoo.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 Chen Yali, Yally	陳雅莉 yally_chen@yahoo.com	美國國防語言學院
8. Cheng Siu Kei, Ken	鄭紹基 ken.cheng@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9. Cheng Siu Pong	鄭兆邦 spcheng@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10.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hnscheung@gmail.com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11. Cheung Kwan Hin	張群顯 kwan.hin.cheung@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12. Chin Chi On, Andy	錢志安 andychin@ied.edu.hk	香港教育學院
13. Chor Oi Wan, Winnie	左靄雲 wowchor@ouhk.edu.hk	香港公開大學
14. Chow Bun Ching, Esther	周晶晶 cbcchui@hku.hk	香港大學
15. Fung Suk-ye, Roxana	馮淑儀 roxana.fung@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16. Hamada, Takeshi	濱田武志 thatmatda@hotmail.com	東京大學
17. He Yuyin	何雨殷 heyuyin.pku@gmail.com	北京大學
18. Hou Xingquan	侯興泉 thouxingquan@jnu.edu.cn	暨南大學
19. Iida, Maki	飯田真紀 maki_i@df7.so-net.ne.jp	北海道大學
20. Kataoka, Shin	片岡新 kataoka@ied.edu.hk	香港教育學院
21. Kuong lo-kei, Joaquim	鄺耀基 kuongik@umac.mo	澳門大學
22. Kwok Bit-chee	郭必之 kwok.bc@gmail.com	香港城市大學
23. Lai Yik Po	黎奕葆 yplai@ied.edu.hk	香港教育學院
24. Lai Yin-ye, Nikko	黎燕儀 yinyeelai2-c@my.cityu.edu.hk	香港城市大學
25. Lam Yan Yan	林茵茵 yan.yan.lam@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26. Lam Wai-sze, Scholastica	林慧思 schola_cslds@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27. Lau Chun Fat	劉鎮發 chunfat.lau@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28. Lau Wan Yee, Cindy	劉蘊怡 cindylau@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29. Lee Hun-tak, Thomas	李行德 huntakle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30. Lee Po-lun, Peppina	李寶倫 ctpllee@cityu.edu.hk	香港城市大學
31. Lee Yin-ping, Cream	李燕萍 leecream@gmail.com	香港城市大學
32. Lei Ka-yan, Margaret	李嘉欣 margare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33. Li Hui	李 輝 huili@hku.hk	香港大學

34.	Li Sum Hung, Eden	李深紅	shli@ouhk.edu.hk	香港公開大學
35.	Li Xiaoming	李曉明		賀州學院 (廣西 542899)
36.	Lin Huayong	林華勇	limhuayong@gmail.com	中山大學
37.	Lo Ki-wai	羅奇偉	kwailo@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38.	Luo, Terry	羅言發	terryluo@gmail.com	澳門大學
39.	Mai Yun	麥耘	maiyun@cass.org.cn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40.	Pai Kit, Raymond	白杰	kitpai@hotmail.com	美國國防語言學院
41.	Shen Ruiqing	沈瑞清	shenruiqings@hotmail.com	香港科技大學
42.	Szeto Pui Yiu	司徒沛嶢	pyszeto@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
43.	Tang Sze-wing	鄧思穎	swtang@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44.	T'sou Ka Yin, Benjamin	鄒嘉彥	btsou99@gmail.com	香港城市大學
45.	Weng Lifeng	翁礪鋒	lz200262@hotmail.com	廣東第二師範學院
46.	Wong Cheuk Lam, Cherie	黃卓琳	cheriewong@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47.	Wong Chin-mei, Eileen	黃阡薇	chinmeiwong@gmail.com	香港大學
48.	Wong Ping Wai, Percy	黃炳蔚	percywong@twc.edu.hk	東華學院
49.	Wong Tak-sum, Sam	黃得森	wong_taksum@hotmail.com	香港理工大學
50.	Wu Nankai	吳南開	1219583487@qq.com	暨南大學
51.	Yahanashi, Akifumi	矢放昭文	zhaowen88@gaia.eonet.ne.jp	京都產業大學
52.	Yan Yaoliang	顏耀良	yyan80@hotmail.com	美國國防語言學院
53.	Yim Chi Sing	嚴至誠	alexycs@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
54.	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katchuen@aa.isas.ne.jp	東京大學
55.	Yu Shing, Roy	尤盛	roy.yu.s@gmail.com	香港理工大學
56.	Zhan Bohui	詹伯慧	tzbh@jnu.edu.cn	暨南大學
57.	Zhang Ling	張凌	zhanglingcbs@gmail.com	香港理工大學
58.	Zhang Qingwen	張慶文	zhangqw@gdufs.edu.cn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59.	Zhong Qi	鍾奇	tzhongqi@gmail.com	暨南大學
60.	Zhou Fanjia	周佳凡	18655680@qq.com	廈門大學
61.	Zhou Xiaoer	周肖兒	zhouxe@gcu.edu.cn	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學院

香港科技大學 第 18 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會場示意圖



1504 教室和 1505 教室位於 G 演講廳旁邊。